



炎黄春秋

YANHUANGCHUNQIU

1930·毛泽东为何批林彪
1959·胡志明秘访毛泽东

风靡全球的

《毛主席语录》

编发寻踪

今日中国陆军“窗口”
都市新画商如何发迹
秦代徐福东渡史迹新证
国民党理论家——
戴季陶的扭曲人生



(总第17期)
1988.10



炎黄春秋

YANHUANGCHUNQIU

1930·毛泽东为何批林彪
1959·胡志明秘访毛泽东

风靡全球的

《毛主席语录》

编发寻踪

今日中国陆军“窗口”
都市新画卷如何发迹
新时代徐福东渡史迹新证
胡民党理论家——
数季陶的扭曲人生



顾问:

伍修权 楚图南 费孝通
谢冰心 杨静仁 冯文彬
王朝闻 赵朴初 胡絮青

特邀编委:

王俊义 冯其庸 张 锲
张国琦 李学勤 李 普
刘颖南 苏双碧 常 征
温济泽 廖盖隆 戴 逸
韩劲草 魏久明 魏 巍

社长(法人代表):杜导正

副社长:方 实 丁洪章 宋文茂

总编辑:洪 炉

副总编辑:刘家驹 杜卫东

总经理:徐 孔

理事长:杜导正

副理事长:贝兆汉 李广尧

理事:白亚南 蔡道峰 林春露

秘书长:徐 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1003—1170

社址: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北京图书馆分馆内

邮码:100802

本刊特稿

南昌起义亲历记

/萧克 2

春秋笔

1930·毛泽东为何批林彪

/萧克 25

我给毛主席当秘书

/张玉凤 6

风靡全国全球的 《毛主席语录》编发全程 寻踪

/韦梅雅 10

红军战将 林彪战友

陈光功“罪”录

/历秋 47

殒星篇

1959·胡志明

庐山秘访毛泽东

/王凡 晓流 43

周恩来和他的“能干之臣”

/朱清泽 王建丰 53

惨遭谋杀的
报业巨子史量才

/耿云志 61

人海浪

一个诗人的欢歌
与恋曲

/顾工 32

“文革”小品：

“四类分子”生活记

“趣”

/鲁甸 28

国民党理论家
戴季陶的扭曲人
生

/李占才 39

画家傅小石的

“二重奏”

/赵绍龙 秦继东 64

古镜台

徐福东渡史迹新证

/左录 79

赤子心

东方“神仙”

西方“显灵”记

/胡智锋 85

时代风

今日中国陆军“窗
口”

/顾亦兵 70

都市新画商发迹记

/李程骅 74

古今谈

从“大款”斗富说起

/霜晓 88

争鸣录

中华几多“黄帝陵”？

/兰草 89

何为庐山会议的

“庐山真面目”

/党军 92

萧 克

南昌起义亲历记

1927年7月，我们从武昌乘船到了九江。这时，九江里里外外住满了军队，除了我们24师，还有黄琪翔的第4军、贺龙的第20军以及朱培德的部队。

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彻底背叛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从此国共分裂，汪精卫同蒋介石一样，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

我们在九江，虽不清楚国民党上层发生的这些变化，但已感到形势严峻。不久，党内开始批判汪精卫，政治部也半公开地进行反汪宣传。那里，多数连队有党员，但没有基层组织，只在营一级设党小组，团一级设党支部。党员身份不公开，党内职务也是保密的。二营营长廖快虎可能是我们营的党小组长，因为总是他召集我们开会。到九江以后，廖营长经常找我们谈当时的政治形势，讲到汪精卫时，他的情绪特别激动，挥舞拳头说：“汪精卫不好，他不是总理的真正信徒。现在国共已经分家，汪精卫背叛三大政策，同蒋介石一样，是我们的敌人。”

廖快虎营长是个很好的同志，在那段复杂艰难的日子，他隔一两天就找我们谈一次话，做了大量细致和有效的思想动员工作，使一批象我这样有革命热情但没有多少政治经验的青年党员，在革命的转变关头，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明确的方向。

快要离开九江的那几天，团里也开会，公开反对汪精卫。我们71团团长沙震不是党员，会议由共产党员参谋长刘明厦主持，大家争先恐后地发言，表示对汪精卫反革命的义愤。

有个连指导员是个中间派，他发言说：“汪精卫一路跟孙先生走，还是好的嘛！”

话音未落，大家群起反驳说：“汪精卫现在反共反人民，没有一点革命的气味，好什么？”

我也在会上发言道：“过去对汪先生非常崇拜，因为他革命，现在他反革命，反动了，我们就要打倒他。”

有人插话说：“汪精卫反动了，国民党是不是都动摇了？”

我说：“不管是谁，他不好就不再拥护他。”

刘明厦说：“蒋介石、汪精卫不好，不等于国民党不好。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是好的，孙夫人也是好的嘛！”

我那时年轻气盛，政策懂得不多，又处于基层，对上面的情况不很清楚，以为汪精卫分共后，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曾在武汉发表声明，抗议汪精卫集团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革命政策，宣布不再参加国民党所谓“新政策”的执行。

南昌起义前后，我们党还没有完全放弃国民党这面旗帜，对国民党上层人物，也还是区别对待的，比如象张发奎就采取争取政策。张是第二方面军总指挥，握有兵权，当时他想把二方面军拉回广东另立“山头”。我党利用他的这一心理，欲将左派掌握的部队带回广东，重新聚集和组织革命力量，同蒋汪两派国民党反动派斗争。我记得，从武昌到九江，军、师政治部贴的大标语，都还是“拥护张总指挥。”

在离开九江前的一天，欧震团长把全团集合起来，说是叶挺师长要来训话。我们穿戴整齐，打着绑腿，精神抖擞地立正站好。一会儿，叶挺师长来了，他没带卫兵，只有一个马夫牵了匹马，跟在他身后。叶挺师长也打着绑腿，显得很威武。他讲话要我们继续执行总理的三大政策，坚持革命。又说，我们很快就要出发，铁军是有光荣传统的，要发扬传统，遵守纪律，爱护百姓。他还讲了几句赞扬张发奎的话，说相信张总指挥能继续领导我们干下去。

七月下旬，我们从九江出发。向南昌开进。先坐了一段火车，又步行了一段路，在涂家埠还住了一夜，途

中共走了三四天。

一路上，党内又开了几次会，这时已明确动员要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廖营长在动员中说：“蒋介石、汪精卫屠杀我们共产党人，断送了国民党革命，我们要重新干，打回广东，再度北伐。”

后来我听说，党中央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就是我们在九江这个期间。当时，我们党发现张发奎亲近汪精卫，也开始实行“分共政策”。7月20日，中央一些负责人在九江开了碰头会，决定“抛弃依张（发奎）之政策……，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20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这个意见由瞿秋白带回武汉交中央。中央接到报告后，立即开会，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并确定起义后，部队南下广东，占领海口，求得共产国际的援助，再举行二次北伐。中央还决定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4人组成党的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负责领导这次起义。

我们到南昌大约是七月二十六、七日。31日下午，一营营长共产党员魏权（广东兴宁人，过去是中校团指导员，后改为少校营长）通知我团连以上党员干部上街看地形。

吃过晚饭，我们在魏营长的带领下，以走街为名，转了几个地方，把敌人的位置都搞清楚了。9点以后，开始做战斗准备。那晚，我们都没有睡觉，心情十分激动。虽然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次行动对中国历史将发生具有转折意义的影响，但我们觉得，能够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继续高举革命旗帜，说明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地肩负起了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

凌晨两点钟，战斗打响了。我团驻在城南松柏巷天主堂附近。天主堂内和距此不远的匡庐中学，驻扎着归附汪精卫集团的第6军57团，我们的任务就是消灭这股敌人。三营攻打天主堂，我们攻打匡庐中学。在营长廖快虎的率领下，我们一下子冲进学校，敌人撑不住，仓惶爬上城墙，企图逃跑。城墙上早已布置好了工人纠察队和公安局的警士，他们一阻击，敌人又退回原地。这时，我们把敌人紧紧围住。天快亮时，敌人全部缴械了。

战斗结束后，我们把俘虏集合在匡庐中学的操场上。我根据革命委员会印发的宣传材料，向俘虏们讲了南昌起义的意义。我说：“汪精卫他们不坚持总理的三大政策，派兵来镇压二方面军，我们在南昌举义，就是在继续坚持总理的三大政策。”我还讲了愿意留下就留下，不愿留的可以走，云云。

话刚讲完，队列中站出一个人，喊我的名字。我一看，是一个叫李韶九的同乡。他是衡阳某中学学生。我在嘉禾师范读书时，他曾到我们学校来演戏，闲暇时也来玩。同我便认识了，但彼此交往不多。以后听说他参

加了李国柱的军队。李国柱也是嘉禾人，老同盟会会员，同程潜很熟，他的部队编入了程潜的第6军。

在这里碰到李韶九，真是巧了。

李韶九拉住我，急切地说：“我要找林伯渠。”林伯渠是第6军的党代表，由旧民主主义的积极分子转为共产党人，是当时公开的左派，这时也在南昌。

我说：“你要找就找去吧。”

他说：“我不知道去哪里找啊！”

我问他：“与林党代表过去有联系吗？”

他说：“有联系。”

我思忖了一下，感到他说的不会有假。这个时候，多一个人加入革命队伍，就多一份力量。于是我告诉了他怎样去找林伯渠。因为我已知道林是革命委员会属的财政委员会主席。李韶九后来也加入了红军，1929年3月在东固苏区任第二团团。1931年初我在中央苏区又见到他。那时他已成为总前委肃反委员会的成员。可惜他擅权邀宠，在肃反中大搞逼供信，直接导致了遗患数十年的“富田事件”，这是后话。

我讲话不久，又有一个人跑来找我。他叫李昌化，也是嘉禾人，是我师范的同学。以后我出来当兵，联系断了，没想到他后来参加北伐军，现在又被起义军俘虏。

李昌化对我说他想回家。

我说：“回家干什么？还是随我们南下吧，打回广东去。”

在我的动员下，他同意留下。我们营恰好缺一个文书，我就介绍他去当文书。南昌起义失败后，他终于回家了。后来我为寻找党的关系，回到家乡，他知道我很困难，还给了我四块钱。这位朋友是中间分子，以后长期在家当教员。解放以后我回嘉禾，还见到了他，前几年才去世。

南昌起义后，我们就住在离匡庐中学约两里路的一条小街上，25师75团与我们相邻，饭后在街上散步，我们常碰面，就在一起聊天。据他们讲，起义前，他们与25师师部一起住在马回岭，25师师长李汉魂是张发奎的亲信，而75团团团长又是李汉魂的人。但部队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党组织比较健全。一营营长孙一中就是党员，当他接到党关于发动南昌起义的指示时，就找了几个党员干部和左派军官商量，决定以打野外的名义把部队拉出去。为了减少目标，按当时军队习惯打野外不带背包、行李、伙食担子，只拿武器弹药。另外，卫生队、辎重队、特务连、机关枪连、侦察连是团部直接指挥的，也不便行动。八月一日凌晨，我们在南昌打响后，他们即按预先约定，向德安集中，然后开往南昌。这时，张发奎和李汉魂乘火车追来，但部队已向南昌走了，李接近我军后卫营，要队伍停止，营长周子昆回答：

团长命令我们出发，我服团长命令。这种层层命令是当时军队的指挥习惯。其实这是革命军官借这种习惯势力来抵制反动军官的指挥。周子昆以后长期在红军工作，对党忠诚，战功卓著。抗战时任新四军参谋长，皖南事变不幸牺牲了。

75团拉出12个连，基本部队都出来了，这显示了党组织的作用。师长、团长都不是我们的人，部队却能带出来。一营营长孙一中以营长职务，带出了三个营，就是因为其他连队有党员。

住在南昌时，我曾见过孙一中。那时，我们每人胸前都挂了一个长方形的胸章，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职务和部队番号。有一天，一个身体健壮的人从我面前走过，我看他胸章上写着：“25师75团1营少校营长孙一中”。我已听75团的人讲了他的事迹，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起义后，孙一中升任75团团长。

我们在南昌又住了几天，主要是作政治动员。起义胜利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发了不少文件，象《革命委员会联席会议宣言》、《农民解放条例》、《劳动保护暂行条例》等等，我们都看到了，便组织部队学习。南下广东的战略目标，我们都很清楚，起义前说过要打回广东去，这时提的更明确，政治动员也主要解释南昌起义和南下广东的意义。

那时对张发奎还是采取争取政策。起义的第二天，贺龙、叶挺分别电告张发奎，表示欢迎他到南昌来。公布的革命委员会名单中，张发奎是7个主席团成员之一。《叶挺致张发奎书》发到部队，其内容就是劝张发奎过来的，我还记得这样的话：现在到湖南扩兵也没有什么办法了，张总指挥还是指挥我们一起南下云云。

现在看来，当时对张发奎争取的政策是必要的，因为张在二方面军中有一定威信，拉他可以争取一部分军官，保持部队的战斗力；另外，张发奎与蒋介石特别是广东的李济深、黄绍雄等有矛盾，拉他也是利用矛盾，分化敌人。后来事实证明，拉张发奎的政策起了一定作用。1932年在江西时，我听张云逸说过，当时他任张发奎部第四军参谋长。张发奎到广州后还派人到潮汕同起义军联系，走到惠州，得悉起义军已失败，便作罢了。如果我们打胜了，他还有可能与我们联合，至少要迟一些分化。

从南昌出发。20军走前面，11军跟进。

盛夏季节，赤日炎炎，天气热得透不过气。好在开始路还比较好走，路两边有很多老百姓摆摊，卖西瓜和其它水果，也有卖茶水的。北伐军在这一带多次来往，老百姓对北伐军的纪律非常赞赏。我们走过时，不断有老乡向我们关切地问候几句，有的还主动递上瓜果和茶水。尽管行军十分辛苦，这时部队的士气还好。

但两三天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天气太热，走了两天，人已非常疲惫。当时部队中大部分是湖南、湖北人，而且多为农民，让他们远离家乡，艰难跋涉到广东，不是一件容易事。出发前虽然做了一些宣传和动员工作，但时间有限，工作做得粗，特别是部队中的各级党组织还来不及建立或健全，因此，快到抚州的时候，两湖籍士兵不少开了小差，我团甚至有三个连指导员也走了。

到抚州后，部队停下来休息。这期间，又做了一些整顿，主要是把政治上不大可靠的军官调整下来，我们71团团长欧震在抚州调到24师任副师长，团长由参谋长刘明厦接任。1营营长吕承文调到师参谋处任处长。

当时，起义军刚由旧军队转变为新军队，成分和情况都很复杂。虽然从总体上说，这支部队是由我们党掌握的，但士兵中的党员很少，干部党员也不多。比如我们71团，只有参谋长刘明厦是党员，三个营长中，除了2营长廖快虎是坚定的共产党员外，那两个营长也仅是左派军官。但有一点很重要，部队中对叶挺的信仰高，军官都服从叶指挥。非党军官多数有战场经验，指挥打仗有一套，因此，不能也不应把他们全部掉换下来。只是换一些掌握指挥权的军官，而且是在南昌起义以后逐步调整的。这样就团结争取了不少人，也保持了部队的稳定。

但也有不足，比如对10师师长蔡廷锴，当时已发现他态度暧昧，但前委却继续让他带兵，并让他单独做前卫，又不采取防范措施，结果该师3日从南昌出发，4日走到进贤李家渡，他就率队脱离起义军。转向赣东入闽，投奔他的老上司陈铭枢去了。本来这支部队中我党的力量占有很大优势，其中第30团军官多数是共产党员。在河南战场上，这个团打得好，很有名气。蔡廷锴一转向，就解除了共产党员的职务，并逐出部队，使我们一下子损失了一个师，特别是损失了那么好的第30团，真是可惜。

在抚州，我从8连调回4连当连长（即我代理连长的那个连）。这个连队是从广东出征北伐以来保持最完整的连队之一。3个排长都长都是广东人，司务长和三个班长也是广东人，通信员中也还有两个广东人。这在经过了多次恶战的叶挺部队中是不多见的。这些从珠江打到长江，又从河南打到江西的“老广”们，久经沙战，战争经验非常丰富，称得上是部队的“财富”。特别是南昌起义后南下广东，他们往老家打，斗志更加旺盛，开小差的很少。从南昌出发到抚州，又从抚州出发到潮汕，这个连队减员并不太多。

我到4连没几天，就赶上全军开大会。记得会址在抚州一座石桥旁边的沙滩上。吃过晚饭，太阳快要落

了,天还不太黑,地面虽然散发着热气,但已不那么灼人。我们的队列排列在夕阳映红了的沙滩上,叶挺军长(南昌起义后升11军军长)站在队前,他依然军容严整,讲了几句话后,就把一位头戴博士帽,年约50岁的老人,请到队前,说:“请彭泽民先生为我们演讲。”

彭泽民讲话了,队列中没有拿步枪的人,热烈地鼓掌。我也使劲鼓着掌。彭老是我心中久仰的人物。早在1926年我刚刚到广东投身革命时,就听说他是一位华侨革命家。北伐军打到武汉后,他任武汉国民政府的海外部长,到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过华侨革命运动。南昌起义后,我在一张布告上看到有彭泽民和徐特立的名字,就生出一种奇特而又崇敬的心情,因为那时我们都20来岁,而彭老和徐老已年过半百。虽然现在看来50岁还不能算老,但那时我们年青,就觉得他们很“老”了。老年而赴险,令我们这些年青人既惊奇又敬佩。

彭老在讲演时,情绪很激动。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痛斥蒋介石、汪精卫之徒叛变革命进行所谓“清党”,把共产党和坚持革命的党员清除出去。他气愤地说:“清党,清党,清他们的狐群狗党!”彭老还痛骂徐谦,说:“在武昌时徐谦还讲要东征北伐,不打胜仗不回来,余下一颗子弹也不回来。现在他干什么去了?他去做蒋介石、汪精卫的狐群狗党了!”

他的讲话,对我们影响很大。我们感到,彭老先生那么大年纪,革命精神如此昂扬,同我们年青人一样,三伏天千里跋涉,不辞劳苦,我们还有什么了不得的事呢?

以后在瑞金,我又听过彭泽民的讲演。当时我们刚在会昌打了胜仗,他神采飞扬地说:“听说你们打败了钱大钧和黄绍雄,我也不觉得老了。”

南昌起义失败后,不知他去了哪里。后来听人说,他留寓香港,当中医,而且是个医术很高的医生。他一直坚持抗日反蒋,同我党也保持联系。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到北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以后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并兼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在50年代,我又见到他,并到他家里拜访。这时,他确实老了,但精神并不见老,依然乐观爽朗,谈笑风生。

在抚州住了几天,我们向宜黄前进。

还是顺着烈日行军。各部队不断有人开小差,有的连队几乎走了五分之一。

到宜黄后,总指挥部召集连以上军官开会,印象最深的是郭沫若在会上讲话说:

“现在我们很困难,天气热,又要长途行军,前面还有敌人。但是,我们要打破这个困难!”他边说,边挥着拳头,声音很高,连讲了两遍。

会场上的气氛顿时活跃了。接着,贺龙讲话,他

说:“有人讲,贺龙、叶挺造反不对,我们革命有什么不对?”

恽代英马上接着他的这番话作文章,高声说:“造反有什么不对?造反革命的反!造蒋介石的反!造汪精卫的反!这个反造得有理,造得好!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孙中山,背叛三民主义,可是他们却喊拥护孙中山,拥护三民主义。他们拥护的是什么三民主义?是投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屠杀工人、农民的民权主义,饿死老百姓的民生主义。蒋介石一民,汪精卫一民,冯玉祥一民,恰恰是他们三人主义。”

他的话博得大家欢笑和掌声,恽代英长期负责党的宣传工作,有讲话的才华。他讲话通俗、生动,大家都听。

廖乾五、张曙时(当时为国民党左派,以后成为共产党员)等也先后讲话,主要讲如何克服困难,顽强奋斗。团结一心打回广东……。

军官会议结束后,过了一会儿,有人通知我到师部开会。这个会好像是党内会议,记得欧阳继修说,从广东出发以来,北伐军都作“总理纪念周”,以缅怀已逝世的孙中山。但最近有人提出:“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还搞什么‘总理纪念周’?”他接着说:“孙中山是个伟大的人物,‘总理纪念周’还要作的,这是政策问题。纪念孙中山,一方面是坚持他的革命精神,一方面也是为了团结更多的人。”

宜黄的两次会,对于鼓舞士气,统一思想,稳定军心,起了一定的作用。也是从这时,就公开召开党的会议了。

我们稍微休整后,又出发继续南下。

快到宁都的时候,一天,在路边十分显眼的地方,贴着一张革命委员会保卫处的布告,上面写着:“离×里路的××地方,有一个大土豪,你们可以去挑谷。”布告落款处签着革命委员会保卫处处长李立三的名字。

这张布告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这是我入党后,特别是参加南昌起义以后,第一次看到党公开号召打土豪的布告。在这之前,我们都是花钱买粮吃。

那天看到布告,我们精神极为振奋,大家兴高采烈地议论:“这下好了,可以不交钱就去土豪家挑谷子了。这些谷子本来就是搜刮穷人的,早就该挑。”

我觉得革命一下子变得离我那样近。

参加北伐战争,参加南昌起义,革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和蒋介石、汪精卫的命,与打倒我家乡的恶霸地主有着密切联系,但毕竟不直接。而今天,党号召我们打土豪,我从心底拥护革命。心想,无论怎样,我都要革命到底。我认为,那些象我一样来自农村和还生活在农村的穷苦人,一定也会象我这样发自内心地拥护革命,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

(张东霞 整理)

我给毛主席当秘书

张玉凤

她曾经给伟人当过秘书,那时她默默无闻;现在她是一个普通公民,仍然默默无闻。属于她的,只有那些埋在心底的珍贵记忆……

——编者手记

我是1970年夏天到毛主席处做机要秘书的。顾名思义,也就是为毛主席掌管文书。

说到秘书,有人往往认为这是“通天”的差事,好象可以身价倍增,令人风光。那是不了解内情而人为地罩上的神秘色彩。殊不知,这其中还有很多外人所不可知的甘苦,以至风险。大名鼎鼎的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江青……

他们有的曾经风云一时,一生有名节;有的走向反面,身败名裂。

当然,历史是自己写的,劫数在人不在天。但那毕竟是一个特殊环境,要当好秘书,也实在不容易。

我刚到毛主席那里,是代理机要秘书。我的前任秘书徐业夫同志,13岁就参加了红军,是我十分敬重的老前辈。他因患不治之症住医院,所以秘书一职暂由我代理。他跟随毛主席多年,工作配合默契,毛主席很满意他的工作,一直盼他再回来。可是他终于没有回来,留下了很多遗憾。

我是一个工人家庭出身的孩子,没有进过高等学府,能担当得起秘书工作吗?我对这付尚不知轻重的担子,心中着实不安。按能力,论知识水平,当毛主席的机要秘书,是我做梦也未料到的。人生的机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当领袖的秘书自然也不是个人可以选择的。所以,能够进中南海工作,得到毛主席的信任,我始终觉得是幸运。仅此,也足以激起我拼命工作的热情了。

掌管文书工作,说起来很



毛泽东晚年在南海工作和生活的几个地方

重要,但它毕竟不是决策帷幄、风云际会之举。它是一项繁杂琐碎的工作,要求一丝不苟,不允许出差错。所以从进中南海那天起,我就是小心翼翼地办事,谨谨慎慎地工作,唯恐细微不慎,铸成大错。也许由于我头脑特别简单幼稚,也许是我工作周密细心,要么就是由于我坦诚直率,经过一段工作之后,毛主席对我的评价是:“为人厚道,工作尽职。”

我很荣幸能得到老人家的这个评价。这也许就是我优势不多的优势,也是我能在毛主席身边继续工作的条件。当然,这丝毫不意味着我的工作是在尽善尽美的了。恰恰相反,在我的几年机要秘书工作中,还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我总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秘书。工作中有失误,也有苦恼,甚至有无法诉说的委屈。

当我来到毛主席身边的时候,他老人家已经是七十六岁的高龄了。尽管公开宣传上还说他“满面红光”、“神采奕奕”,给人们造成一个非常健康的形象,但他毕竟是一位老人了。自然规律不可抗拒;他和普通老人一样,也无法避免各种老年病的纠缠。从1971年春天起,他老人家每到开春和入冬总要生病,而且都是比较严重的老年病。这时,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除了要分配的具体工作外,还要同护士长吴旭君同志一道,照顾和护理经常生病的毛主席。由此,我也学会了一些护理病人的常识,特别是护理老年病人的知识。

为毛主席服务,这是我们工作人员的职责,也是心甘情愿的。但是,这毕竟是一项责任很大的工作。那时,我们国家领导人的身体状况是严格保密的,对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保密更严,一般

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主席身体不好,但病到什么程度知者就更少了。人为地“神化”,普天之下的崇拜,使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也在神秘中背上了沉重的精神负担。

记得1971年春,毛主席因为感冒引起支气管炎,昼夜咳嗽。由于久拖不愈,转化为“大叶性肺炎”。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由于医生的努力,病情终于转好。看到老人家逐渐康复,我们工作人员久久悬而不安的心终于如释重负,高兴异常。

当时,江青并不知道主席病了,主席病情好转以后,她却不相信主席真的病了。她毫无根由地说:“主席的体质是好的,怎么可能病得这么厉害!你们‘流报军情’!”她指着汪东兴、张耀祠同志和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是“反革命”、“特务集团”!江青说话就是这样,可以随意给人扣上一顶帽子,不管合适不合适,不管后果。当时,汪东兴、张耀祠同志是负责毛主席医护工作的。江青这样无端地指责,令在场的人毛骨悚然,不知所措。大家在主席生病期间昼夜辛苦地服侍,不但未得到她一丝一毫的鼓励,反而被扣上了足可置人于死地的罪名,能不令人心寒?事后,汪东兴同志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毛主席。

毛主席是了解人、理解人的。一天,周总理有意陪江青探望康复不久的毛主席,汪东兴同志也来了。此时,毛主席对江青说:“你说这些人是‘反革命’、‘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那就是我。”老人家的几句话,保护了我们这些人,也使一直为此不安的周总理心里顿觉释然。

江青挨了毛主席的批评,心中自然不快,一股愤怒之火无处发泄。在她出门时,又借机向我发火:“你不是医生,不是护士,走路这么重,一阵风吹着我了。”江青的无名指责,我毫无准备,只好向她解释:“主席有规定,走路要响一些,好让他知道有人进来了,免得他不知道吓着。”然而,我的解释,在江青看来这无异是个软钉



作者和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冯征(右)及作家周而复(中)

子,不但没有消释她胸中的怒气,反而更触怒了
她。她厉声斥责道:“你狡辩!”

大家顿时陷入了一种难以收场的窘迫局面。
还是周总理明智,他对我说:“你也不对,认
个错吧。”认真一想,我也有点后悔,为什么在她
生气时去顶她呢?我刚来不久,对江青并不了
解,只能作为教训吧。

秘书工作就是服务。所以工作中既要任劳,
也要任怨。不能有任何计较,不能讲价钱,要勤
勤恳恳、默默无闻一辈子,不思闻达于何人,但
求无过于任内。

1974年10月22日,中央办公厅发出文件,
正式任命我为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尽管我已经
代理机要秘书工作几年了,一旦正式的红头文
件下来,心里还是忐忑忐忑的。是激动,还是不
安,一时也说不清。过去毕竟是借调,是代理,心
理上的承受不一样。

此时我正随毛主席在长沙。他老人家如今
已不象过去那样“万里长江横渡”了,他行动极
为不便,连散步也困难了。这天,他正躺在床上,
我把收到的所有的文件送给他。我说:“今天收
到的文件里,有一份是关于我的任命的通知。”

“我知道,那是我同意的。”

我捧着文件,等待老人家继续说下去。可我
惊奇地发现,他好象随随便便地说了一句,之后
什么也不说了。我却一直不安,鼓足了勇气说:

“我怕干不好。还是找一个比我高明的人来
好。”

毛主席说:“你怎么干不好?徐秘书生病这
段时间,不是你代替他吗?”

我知道,他老人家对我的工
作还是满意的,不然这红头文件
也不会发下来。但是我心里清
楚,这几年的工作所以还能应
付,一方面是自己刻苦努力,另
一方面同主席的教育也分不开。
但自己总觉得工作并不是很适
应,心里总怕干不好,出纰漏,说
不定哪一天由于自己的不慎,给
工作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毛主席大概看出了我的心

思,接着说:“其实做我的秘书也难也不难。不难
的是,我不需要你们这些人写东西,只管收收发
发。难的是要守纪律。你做秘书,可以看中央给
我的文件,而汪东兴、张耀祠他们不能看,包括
我的家人江青、李讷、毛远新他们,我不让看的,
他们也不能看。还有,你不要以为当了我的秘书
就可以指挥一切了。过去我身边有个卫士,我让
他给总理打个电话,他打电话时可神气了,我看
了就不舒服。不要得意忘形,要知道自己为谁工
作,代表谁办事。还有,做秘书工作要谦虚谨慎,
要多学习。每天除了收发文件,还要看材料。特
别要看那两大本(指新华社编的《参考资料》),
还有那张《参考消息》。通过这个窗口,了解世
界上发生的事,就能看出些问题……”

毛主席当时谈话已经很困难了。他操着浓
重的湖南口音,断断续续说的这些话,我都默
记在心。严守纪律、谦虚谨慎、努力学习,我体
会,这是老人家对我这个新秘书的约法三章;也
是对我的希望。

毛主席的话给了我勇气和信心。我是一个
共产党员,服从组织的安排是自己的天职。面对
多病的老人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有努力做好
工作的责任,不能有任何推辞了。

1974年春,毛主席又添了老年性白内障
病,视力模糊,看东西很吃力。对于领袖来说,
一天有多少文件需要他看,特别是象主席这样
一生手不释卷、历来亲自批文件、写文章的人,
一旦视力不好,其痛苦是可以想象的。就是从这
时开始,我又多了一项工作,天天为主席读文件、
读书、读信、读报。

这可是一件难以胜任的工作。象
我这样的文化水平,读文件、读报、读
信,还觉得能够应付。而读书,特别是
读古书,困难就大了。很多古书,不但
词意难懂,还有很多生字,这就增加
了读书的难度。我记得最难读的是几
篇赋。如《别赋》、《恨赋》、《月赋》、《枯
树赋》等。读起来实在力不从心,既没
有铿锵有致的韵味,也无激荡肺腑的
感情。所幸的是毛主席的文学功底深
厚,很多诗赋他都能背下来,读错的



字和音他随时予以纠正。毛主席告诉我：“读诗和读赋不同。诗有五言、七言，还有平声支韵，去声径韵……你按韵律来读，基本上就可以了。而赋则不同，要抑、扬、顿、挫，要读出感情才行。你这样平平地念，象寺庙里的和尚念经。”

毛主席非常幽默，就是在病中，同你谈论那些枯燥的古书时，也会让你感到情趣横生。

为了把书读好，我一方面注意把读的书先看一遍，熟悉内容，解决不认识的生字，另一方面注意听广播，学习播音员如何读稿子。渐渐地也有所提高，勉为其难了。

一次，我给主席读白居易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读着读着，毛主席自己也跟着背诵起来。他用低沉的声调，一字一句地缓缓吟诵，那声调，那韵致，入情入景。令我措手不及而又惊奇的是，读到后边，他竟激动得泪如泉涌。

“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
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我意识到，主席此时此刻一定是进入诗的意境了。他那浓重的情感，透视着对诗意的某种相通。主席是非常喜欢这首诗的，他曾在书上这样批注：“江州司马，青衫泪湿。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同等的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其然岂其然乎？”

1976年，因总理、朱总司令先后去世，毛主席也在重病中，他的心境，他的精力，都处在几近坍塌的危急中。两位共事多年的老战友的去世，使重病中的老人无法平复内心的悲痛，昔日乐观的心境也不复再存。在一天，他让我拿来庾信（南北朝时的文学家）的《枯树赋》读给他听。这首赋主席早已熟读，并能背诵，即使在病魔缠身的晚年仍能背出。这是一首以树喻人、以物托志的赋，词调惨切，读来令人伤感。

在他的床边，我缓慢地读着这首赋。他则微

闭双目，凝神遐思，仿佛是在体味赋的意蕴，又好象是在回顾自己的一生……



其实，他老人家究竟在想什么我也不知道。但从他那凝然神思的表情，我猜想，他此时一定想得很多，也很遥远。

当我念了两遍之后，他意犹未尽，自己开始背诵。此时他已不能象以前那样抑扬顿挫、声音洪亮地吟诵了，发音极为费力，声音非常微弱，但听来还是富有感情。“……前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凄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这位辩证法大师，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一代巨人，从庾信的赋中体味出了什么，寄托了一种怎样的情意，在我心里至今还是个谜。

这首赋，是主席一生中所学的最后一首，也是我最后一次为他读诗读赋。因为，后来他的视力，他的听力，他说话的能力，都不及了。自然规律和可怕的病魔使老人家即将结束他的生命之旅了。

今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大家都在纪念我们中华民族这位伟人。作为曾经在老人家身边工作的人员，我把埋在心中的点滴记忆整理出来，献给读者，也算对老人家的纪念。

风靡全国全球

《毛主席语录》

猛涨急落的红色海洋

六十年代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图书是中国的一本小红书——《毛主席语录》。据报载，仅“文革”几年之内，国内外就出版了用50多种文字印成的500多种版本，总印数为50余亿册。在当时，全世界30多亿人口，男女老幼人均1.5册有余，被国际上公认为：“是二十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是世界上读者最多的书”。

曾记否，二十多年前，似乎在一夜之间，“红宝书”忽然在中国大地掀起了红色海洋，呼啸澎湃，浩瀚无边。《毛主席语录》在人们手中飞扬，口里传诵；“最高指示”响彻云霄，语录歌声昼夜不断。大街小巷所有的建筑物，里里外外都敬书高悬语录牌，全中国成了一个“红彤彤的世界”。

那时，全国除毛泽东本人以外，上自“副统帅”林彪，下至每一个学

……
么？

——这本书的猛涨急落到底反映和说明了什么？
——剧和悲剧惨剧？

——由此书又生发演变出了什么样的喜剧闹来的？

——这本搅得周天红彻的书当初是怎么搞出全球的？

——一本「小红书」是怎样复盖全国又流向二十世纪世界发行量最大的是什么书？

请问，您知道不知道：

发行50余亿册

编发全程寻踪

○韦梅雅

龄儿童，无不每天随身携带这本小红书，早早晚晚必须高擎于头顶，三呼“万寿无疆”，三呼“永远健康”，那时称此举曰“早请示”，“晚汇报”，大小集会，乃至随时随地，都可能需要朗读或背诵毛主席语录。那时，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毛主席语录》不可不带。“顶礼膜拜”程度胜过历代王朝，成了新的宗教仪式。

有段时间在人际交往中，也要象对口令一样用毛主席语录互相呼应。老太太上街买菜，要对售货员说：“节约闹革命”，请给我拿二斤菠菜。”售货员要答：“‘为人民服务’，这是找你的钱。”否则买卖不能成交。

打电话也如此，在接通电话后，第一句必须说毛主席语录，否则，电话员可以拒绝接电话。据说1969年中苏关系紧张到达白热化程度时，苏联总理柯西金曾试图通过两国友好年代架设的热线与毛泽东、周恩来通话，被电话员断然回绝。如果他

们知道当时中国的时尚，中国特殊的交际方式，先咏诵一段毛主席关于中苏友好方面的语录，没准还有希望接通电话，或许中苏关系上还是一次转机呢！

军队亦如此，有的部队队列训练曾一度以毛主席语录代替口令，避免天天重复“向右转”的“反动”口号。在中苏边境，我边防部队与苏方发生武装冲突，战士手持“红宝书”，振臂高呼：“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毛主席语录，直到倒入血泊中。

人们拿着《毛主席语录》就象拿到了“尚方宝剑”，可以攻击别人，也可以防卫自己，但《毛主席语录》的防卫性远不及进攻性强。巴金在劫后的日子里，对此曾有过一段形象的描述：

“有一个时期我们每天要举行几次‘请示’、‘汇报’、‘祝万寿无疆’的仪式。别人在我们面前念一句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

不倒’，于是我们就成了该打倒的‘反动的东西’。他们又念一句：‘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于是我们就成了‘极端反动的人’。他们再念一句：‘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要进行批判’，于是我们就被当作‘牛’给关进了‘牛棚’……”（引自巴金《要有个艺术民主的局面》）

而作为“牛鬼蛇神”要为自己辩护，“语录”就显得苍白无力了。



原解放军报社编辑田晓光

据说在批判陈毅同志的大会上，陈毅曾对造反派们说：“请同志们将《毛主席语录》翻到273页（《语录》只有272页）。”然后高声朗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陈毅是个好同志’。周总理可以作证。”但他还是被“打翻在地”了。

如果“牛鬼蛇神”们敢用毛主席语录向造反派反唇，则更要遭灭顶之灾了。

1968年，我亲眼所见，在解放军总政治部某直属机关，一个造反派殴打老干部，老干部只说了一句毛主席的话：“要文斗，不要武斗”，造反派便变本加利，一边打还一边问：“是文斗是武斗？！……”一直打到那老干部不得不含恨屈辱地说：“是文斗”，那人方肯罢手。

文革中，毛主席语录又更多地作为个人与个人、派别与派别之间互相攻击的常规武器被投来掷去，漫天飞舞。好象谁使用的“语录”多，真理就在谁手里。

作为软武器，毛主席语录也曾直接用于“反帝、反修”的战场。请看下面发生在1966、1967年间的事件记录：

我驻×国使馆造反派，在大街上散发印有“造反有理”语录的传单，东道国提出抗议；

我驻×国使馆造反派要在使馆屋顶上用霓虹灯制成语录牌，宣称要让这里的人民看到金光四射的毛泽东思想；

去×国援建的工程人员中的造反派，要在工地上竖起一块“社会主义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的巨幅毛

主席语录标语牌，当局不同意，他们集合抗议，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流血事件；

我驻非洲×国使馆的造反派，在公共汽车里朗读毛主席语录，在街头向来往行人硬塞“红宝书”和毛主席像章，对拒绝接受的群众挥拳辱骂，引起群众愤怒；

我驻×国使馆造反派，拦住蒙黑色面纱的伊斯兰妇女，宣传毛主席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遭到臭骂；

1967年，我国500多名留学生回国，途经苏联，其中留法学生到红场高声朗读毛主席关于反修防修的语录，与苏联警方发生冲突。其他留学生义愤填膺，成立了留学生总指挥部，准备组织汇集在莫斯科的百十名留学生，再次去红场“血战到底”！如不是接到了陈毅签发的特急电报，真要在“苏修叛徒集团老窝”中心开花了；

留在巴黎的留法学生听说第一批回国的留学生在红场挨了打，立刻带上了刷子，提上了油漆桶，排着队准备到苏联驻法大使馆去写标语。走到半路就被法国警察截住了，也挨了打，又被拘留了一批。我驻法大使亲自连夜给法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打电话，同时又派人到法外交部交涉。次日，法方才用囚车把被扣留学生押送飞机场，让他们立刻登机回国。

1966年，我国派出一个青年文艺小组到与我国友好的法国访问演出，他们在每个节目表演前，都要先念一通毛主席语录。观众对此很反感，头两三个节目，还能忍受，以后

每念一次毛语录，台下就发出一片嘘声，越嘘声越厉害。大使馆的同志们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很难过，建议他们不必每一节目前都念语录。但文艺小组领导坚决不肯，说节目前念语录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创举。台下喝倒采，他们说观众大多是资产阶级，敌人反对正说明我们是正确的。大使馆黄镇同志和宋之光同志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为了维护毛主席的威信，为了中法友谊不受伤害，只好对他们说，如果不接受使馆意见，就不要再演出了。这才使他们不得不做了让步。但1967年，当宋之光回到祖国时，却为此被扣上了“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帽子，坐了“喷气式飞机”。

在六十年代中期，“毛主席语录”成了中国人民生活中的不可缺少之物，六七十岁的老太太和咿呀学语的娃娃也都要背会它几条。在中国，人们念的是语录辞，做的是语录操，唱的是语录歌，跳的是语录舞，小学生课本是《毛主席语录》本。毛主席语录与人们生活、交往如此密不可分的现象，也成了当时中国的一大文化景观了。

但最时兴的往往不是最持久的。1971年蒙古温都尔汗一架中国飞机的坠毁，使红色海洋狂热的波涛戛然而止，“红宝书”也从亿万人民高擎的手中纷纷落下，最后在人民生活中逐渐地消失。而今，时光才逝去二十年，发行50亿之巨的《毛主席语录》竟成了为数寥寥的收藏家搜寻的“文物”，在文物市场，由于稀



全国工农兵到处学“语录”

毛泽东的语录怎样变成《毛主席语录》



△毛泽东和高举《语录》的林彪在一起

少，一本《语录》竟能以高出原价百倍以上的价格出售。

时过境迁，当年热衷于红色海洋的人们又开始以异样的热情，汇成了奔小康的潮流，再也没有人探究《毛主席语录》的来源、出版过程和其间的一些是非、隐秘。

不过在芸芸众生中，有一位年逾花甲的女士，她对《毛主席语录》仍怀有极特殊的感情，在《毛主席语录》最流行的年代，她默默地享受其中的荣耀与甘甜；在《毛主席语录》遭冷落的时候，又默默地承受她不能理解的痛苦。是她最早提议并亲手编辑出版后来风靡全国乃至世界的《毛主席语录》，这本小红书记载着她的辉煌，她的艰辛与苦涩。她就是解放军报社已经离休了的一位编

辑——田晓光。

她向我讲述了自己参与编辑出版《毛主席语录》的全过程。谈起往事，她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年代，有时谈到得意之处，脸上泛着兴奋的光泽，忘情地闪烁着骄傲的目光。她永远也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她用她生命的精华编辑出来的这本至今受人爱戴的伟人的语录，竟被人利用来当作一个作恶的工具，而且运用这个工具导演出了那么多的人间悲喜剧。我尊重她的这种感情，理解她与我谈话所站的角度，因此，我决定将她对我谈话的内容及提供的资料仅作简单的整理，坦陈于此，给后人了解和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一个佐证材料。

“你们怎么想起要编一本《毛主席语录》呢？”

“这说来话就长了。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

“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我们党早在延安时期就开始了。

“后来在全党又开展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

“建国以后，1951—1953年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1960年出版了第四卷。几十年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认真学习毛泽东著作，已经成为我党、我军和我国的政治风尚。学习毛主席著作真正形成高潮，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同志以后，林彪兼任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开始。

“1960年9月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了扩大会议，根据林彪提议，会议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为议题。会议对建国后我军政治工作作了总结，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并提出把学毛著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这个决议曾得到了毛主席的批准，中央批转全国各省、市，得到了全国、全军上下的拥护，六十年代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毛主席语录》又是在全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中产生的。

“我们之所以萌发编辑一本《毛主席语录》的想法，这首先还要从《解放军报》刊登毛主席语录说起。

“林彪接替彭德怀的工作以后，首先在全军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1960年3月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提出：‘毛主席有许多警句你们要把它背下来……我主张就是要背一点东西，首先是把毛

泽东同志的著作中最精辟最重要的话背下来，脑子里就是要记住那么几条……’

“61年4月，林彪在部队视察时，更明确地指示：‘为了使战士在各个时期、各种情况下都能及时得到毛主席思想指导，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毛主席的有关语录。’

“我当时在军报资料室负责马、恩、列、斯、毛语录卡片资料工作，为报纸选编毛主席语录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了我头上。在社里每天下午的编前会上，了解第二天报纸的宣传中心，负责提供有针对性的毛主席语录。

“说来也是很巧的。一次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唐平铸同志，带领人马到几家报社参观取经。在《天津日报》社，唐平铸发现他们资料室的同志将《毛主席语录》中可以独立使用的文字，即后来说的‘语录’，作成卡片，分门别类地排成专题目录，为编辑部门查找、引用、校对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这对我们军报刊登毛主席语录来说，太用得着了！唐平铸指示我们派人去用最快的速度全部抄回来。由我负责重新整理，按我们设的专题重新排列，并把以前积累的充实进去。最后又作了校订。

“有了这套专题目录，为报纸提供毛主席语录的工作开始得心应手了。后来的《毛主席语录》，就是在这套目录基础上选编的。

“毛主席语录天天见报后，部队里反应热烈。当时军队文化程度不高，战士多数是从农村招来的，有初中文化的就算是知识分子了，让他们直接学习毛主席的原著有困难。而我们当时摘编的毛主席语录均是毛主席著作中，最简洁、最通俗、最精辟地讲出道理的语言，战士们一看就懂，一讲就明白，这样，学习毛主席语录，战士们既学习了政治，又学习了文化，对部队进行思想教育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风靡全球的“小红书”



△在非洲



△在非洲



△在印度尼西亚



△在越南



△在阿尔巴尼亚

“林彪对他提出的语录登报的事也是很得意的。1961年，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他说：‘……解放

军报上天天有毛主席的语录，编必要的基本教材，免得指导员难解决问题，不过不要多，而要好。’到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又讲：‘解放军报经常按照当时的需要，把毛主席的语言摘出一部分登出来，底下也表示欢迎。’

“部队当时情况也确实象林彪说的那样，许多干部战士把报上的毛主席语录剪下来，分门别类地汇集成册，有的战士甚至用小本子天天抄录，自制成语录本。连里的记事黑板改成了抄录毛主席语录的小黑板，有的部队把毛主席语录制成语录牌，走到哪里带到哪里，行军、拉练，背在背包后面，战术训练挂在训练场上，学习挂在宿舍里，劳动挂在工地上。

“军报资料室在为报纸选登毛主席语录的基础上，又时常结合当时全党全军中心任务，汇编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大篇幅地在报纸上集中发表。如1961年的《毛泽东论调查研究》、《毛泽东论政策》和《毛泽东同志理论联系实际》等的专题语录汇编。后来又发表了《毛泽东同志论领导作用和工作方法》等等。

“1962年2月3日，当时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同志在《解放军报》毛主席语录宣传小结上曾批示：‘大型辑录形式好，以后还可以用。’鼓励了这种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方式。

“鉴于当时这种情况，我向报社领导提出了要为部队编一本《毛主席语录》的想法。领导上十分赞成，但说要请示一下。”

1964年第一个黎明，第一本《毛主席语录》问世

“1963年12月20日，唐平铸去参加总政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把我们建议编一本《毛主席语录》的意见带了上去。

“一天，唐平铸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总政领导要我们编一本《毛主席语录》，作为会议文件下发。并要求在会议结束前，征求各位代表对《毛主席语录》的意见。”

“我接受了这项任务。时间如此紧迫，必须争分夺秒。我一放下电话，立即拟定了编选计划，送报社领导批准后，马上投入了工作。”

“为了保证如期完成任务，领导上又调了一位大学刚毕业不久的年轻同志帮助我一块儿干。我那时虽也才30多岁，但已经是4个孩子的妈妈了，我的家不在报社，为了工作方便，我住到了报社，夜以继日地苦干了一个星期。我们采取编一个专题，发排一个专题；排一个专题，校一个专题的办法搞突击，但仍觉得速度慢，最后我们索性搬到了印刷厂里办公，一边编，一边排，一边校，一边印。”

“1963年，我国经济开始复苏，餐桌上也能见到点油腥了。这年除夕也显得比前两年诱人，我的四个孩子，两个在学校住校，两个在幼儿园住托，平时很少能在一起，快过年了，都盼望着能和爸爸妈妈一起过

个好年。也就是在这年的除夕之夜，正赶上《毛主席语录》总校、付印。那天，我们在印刷厂整整干了一个通宵。当新的一年第一个黎明到来的时候，我手捧着散发着墨香的第一本《毛主席语录》的印张，心里感到无限的快慰，至今回想起来，都令人振奋。”

“1964年1月5日，《毛主席语录》征求意见本出版了。16开本，其中共设23个专题，选编语录200条。题名为《毛主席语录200条》。”

“《语录》按期发到了与会代表手里。经过讨论，代表们除了提出增补意见外，还建议迅速印发部队。”

“我们根据代表们的意见，又花了5天的时间，对《语录》进行了增补。题名改为《毛主席语录》，仍为16开本。设25个专题，收语录267条。1月10日，《语录》重新印发给与会代表，并同时下发给部队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等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分子和先进单位征求意见。”

“就这样，从接受任务到第一本《毛主席语录》问世，总共不到一个月时间。”

《毛主席语录》由总政治部正式通过定稿

“64年7月，毛泽东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反对本本主义》、《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四篇文章公开发表。为使《语录》中有这部分内容，并改进过去编排和所选内容的不足，我们提出了再版意见。正值这时，康生和毛主席秘书田家英也分别打来电话，提出《语录》中有三条语录虽是毛的指示，但摘选的文章不是以毛泽东名义发表的，希望再版时删去。”

“我们的意见得到批准。再版

林彪写错“听”字的题词

△林彪写错“听”字的题词

《语录》编选，主要是内容的增减，原有的30个专题，没作大的改动，只是新增增了三个专题。

“当时《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发表，我们认为《毛选》第四卷主要反映了中国人民在解放战争时期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和我人民解放军所向披靡的革命气势，《语录》没有反映出来。而这种精神不仅在革命斗争中需要，在和平环境里以及一切工作中也都适用。所以决定增设‘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专题。”

“当时我们党强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认为没有一个正确的学习态度和方法是学不好的，因此，又增设了一个‘学习’专题。”

“我们又采纳邓颖超同志提出设‘妇女’专题的意见，增设了‘妇女’专题。”

“这样，再版的《语录》由30个专题增加到33个专题，所收语录也由355条增到433条。”

“65年5月，决定《语录》再版本命运的时刻到来了。”

“那天，总政领导和各部部长们在三座门开会，会议结束后，临时决



△陈永贵等在学习《语录》



△解放军战士背包上的“语录”

定在军委办公厅小会议室集体讨论审定再版本《语录》。

“报社领导通知我马上到会。当我赶到会场时，总政各部领导都已落座等待了。没等我喘过气来，已在会场的唐平铸就说：‘你快点介绍一下选编《语录》的原则、指导思想，以及‘前言’的修改，内容的调整、增减和存在的问题。’听了他的话，开始我真有点蒙头了，我原是准备来听会的，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但又意识到，这次会将决定再版本《语录》的命运，我想：这么多领导，意见不会少。再说，《语录》内容多少本来意见不一致，真担心通不过。已经到这份上了，我顾不了那么多，只想把理由说得充分一些。我迅速地调整了自己，把这些天来脑子里装的问题一般脑儿地抖了出来，把拿不准的问题提交会上讨论。”

“最后会议对《前言》和全书的33个专题的设立一致通过，内容仅删去了六条语录，定为427条，共8800字。”

“这本再版本《语录》能这样如此顺利地通过，我是没想到的。当时我愉快、激动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

语录本“前言”与林彪的题词及“再版前言”

“早在1964年5月，总政领导决定，将这本修改后的《毛主席语录》在部队内部发行，干部每人一本，战士每班一本，军报为此还发了消息。”

“为了部队指战员携带方便，还决定将《语录》改52开本，这也是最早的小开本《语录》。”

“在这本语录出版前，因为林彪当时主持军委工作，我们建议请他为《语录》题词。并且提出最好写雷锋自勉用的几句话：‘读毛主席的

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军报领导接受了建议，让我们将这四句话抄转给林彪。林很快写好，转了下来，当我拿到题词后，发现林彪只写了前三句，最后一句‘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没写。我当即找到军报办公室秘书，请他给林办打电话询问。电话是叶群接的，叶回答说：‘林总写的时候，有人提醒他少了一句，他没吭气，想必他有他的考虑，不必再问他了，就用三句话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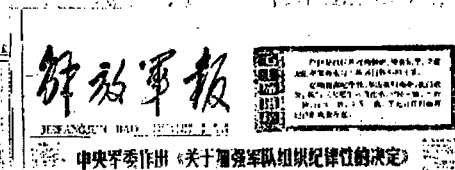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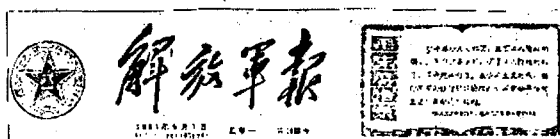
“我拿着题词感到为难，总觉得不够完满，请示唐平铸，唐沉默了一会儿说：‘就这样制版算了！’我这才发送工厂制版。”

“林彪题词除了少写了一句话外，‘听’字还多了一点儿，写成了‘斥’。《语录》发到部队以后，群众多次来信提意见，在1965年《语录》再版时才作了技术处理。”

“1964年版的《毛主席语录》，按出版惯例有个前言。由我起草后，经过唐平铸副总编审定，在64年版的《语录》上，以总政治部的名义发表了。”

“1964年下半年，《语录》决定再版后，为了进一步改进《语录》选编内容，切合部队的需要，报社领导指示我们下部队征求意见。”

“我到了北京卫戍区某师八连。当时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副指导员孔祥秀说，《语录》是宣传毛主席思想的，‘前言’应该有对毛主席思想的论述，如感到不好把握，可以把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一段论述



△最早一次和最后一次出现在军报报眼上的“语录”

加进去。

“回来后，我综合了部队干部、战士的意见，并专门将孔祥秀同志对前言的意见写了一条。报社领导同意，把军委扩大会议决议中的这段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论述加在了‘前言’的开头：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同志不但规定了我军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而且规定了我军建设唯一正确的路线。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后来被罗瑞卿同志删去——作者注）。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的经验，我们党的理论，都概括地集中到了毛泽东思想里。……

“这个‘前言’经过总政和罗瑞卿的修改定稿，便成了1965年8月

1日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的‘前言’。署名仍是‘总政治部’。

“《毛主席语录》再版本在全国发行后，特别是‘文革’开始以后，又陆续收到许多不同意见，认为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应该根据1966年8月1日——12日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提法重新改写。

“我们据此给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写了报告，并建议语录内容不动，‘前言’修改好后，先登报，然后印成活页发给读者。

“总政领导很快就批准了我们的报告，并认为我们的建议可行。我们根据总政和军报领导的指示，将当时文件和报刊上反复宣扬的林彪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等言论及提法，写进前言。交稿审定时，由罗瑞卿召集报社领导集体修改定稿以后，却在署名问题上发生了争议。有人主张仍署‘总政治部’，有人主张为了便于《语录》出口，署‘人民出版社’为好。这两种意见都报到了上面。后来又由军委及总政领导决定以‘林彪’名义发表‘再版前言’，于1966年12月16日刊登在全国各个报纸上。

“林彪署名的‘再版前言’见报后，我与原署名‘总政治部’和‘人民出版社’的小样在文字上核对了一遍，内容一点未变。

“后来有人说，林彪的题词是从雷锋那儿‘偷’去的。实事求是地说，是我们请他‘偷’的，可惜他‘偷’得不全。又有人说，林彪的‘再版前言’是张春桥写的。这也是不实之词，那时张春桥对这事还插不上手。

《毛主席语录》怎样从军内走向全国

“《毛主席语录》是军队内部读物，怎么后来散发得那么广泛呢？”

“这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读

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是当时的社会风尚。毛泽东又号召‘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军队人手一册小红书，走到哪带到哪，学起来很方便。干部、群众当然也是很羡慕的了。

“至于《语录》具体怎样走出军营的，我知道这样些情况：

“64年5月1日出版的《语录》印成52开本下发部队，发放范围是干部每人一本，战士每班一本。但部队强烈要求发到每一个战士。

“64年12月29日，林彪明确指示：‘毛主席语录本在部队很受欢迎，现在每班一本太少，大家抢着看不够用，要多印一些，一定要发给每人一本。毛主席著作是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毛主席著作选读本和语录本，要象发武器一样发给每个战士。’这才达到了全军人手一册。

“《语录》下发部队以后，引起了全国的注意，各地、各部门纷纷通过电话、电报、书信来要，后来又派人联系购买，最后干脆要求代印。

“当时中央领导同志也派人来要。因为《语录》是军内发行，出版前，我们只送了军委、各总部领导各一本审阅，未送中央。

“最先是朱德同志，书出第五天，5月5日，就派人到军报来要。毛主席、周恩来也派人来拿。当时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曾三次索要，还要求直接送到办公室，以免收不到。彭真、刘伯承、贺龙、张际春、李达、邓子恢等领导同志也都先后来要。

“领导同志要《语录》，给就是了。可地方一些单位、个人来要却使我们无法招架，要求代印的单位也越来越多，面对这种情况，军报请示总政刘志坚副主任，刘指示：‘因为这小册子是总政根据军队情况的需要摘编的，只限于军队范围内阅读，如广泛向地方发行，变成我们代替中央去做工作了，这样不好。如果地方要印发这类小册子，应由他们请示中宣部解决为好。’同时还规定了

三条：‘一、不是军队系统的中央委员也不要发；二、不为地方代印；三、地方索要时婉言谢绝。’

“这三条实际一条也执行不了。军报实在顶不住这个潮流，就又书面请示罗瑞卿总长。1964年5月28日，罗批示：‘可以为地方代印；在军队学习的地方干部可以发给。’当时团中央正召开九大，代表们也要求发《语录》，罗瑞卿也同意给了。

“口子一开就势不可挡了。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等地方各大单位纷纷来军报联系代印，刘志坚为了减轻军报印刷的压力，7月10日打电话让军报考虑：《解放军报》是否出专页，将《语录》全文刊出，内部发行。可第二天，7月11日，中宣部马上来电话，不同意这样做。

“从1964年5月1日《语录》正式出版，到1965年8月1日再版为止，原计划印刷发行420万册，结果大大突破这个数字，猛增到1213万册。军报还专门成立了发行《语录》机构进行这项工作。

“1965年，《毛主席语录》再版，当时总政决定也仅限于在军内送林彪、贺龙、聂荣臻、刘伯承、叶剑英以及军委、总政、总参、总后各首长审查。仍限军队发行。

“8月1日《语录》再版本正式出版，因增加了新的内容，部队内部要重新印发，相应的，地方各单位又重新到军报联系代印。过去没印的也要求代印，公安部一次就要求代印50万册，数量越滚越大，印刷厂工人白天黑夜没命干也赶印不出来。只好请示刘志坚，看怎样处理好？刘志坚叫报罗瑞卿总长：象这样大的数量，能不能给地方纸型，让他们自印？罗同意给地方纸型自印。

“9月16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康生看了再版《语录》后也提出地方要代印《语录》，可以借给他们纸型自印。

“9月20日，贺龙批示给国家体委《语录》纸型自印。



△当年全国上下只有毛泽东本人没有高举《语录》

“11月19日，中央办公厅来电话，说毛主席同意给安徽省委《语录》纸型，让他们自行印刷。”

“后来，人民出版社给毛主席著作编委会打报告，要求公开发行的这本《毛主席语录》（当时还有几个别的版本），据当事人说，当时很快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在全国发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

“66年8月初，中央文化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毛主席著作印制发行工作会议，决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其中包括我们编的这本《语录》。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发动二、三百家印刷厂印制《语录》，特别是在党的‘九大’召开前，形成高潮，绝大多数省市都按人口数量印刷，以至几乎达到了全国人手一册。”

“小红书”从中国走向全世界

“最初的《毛主席语录》是纸皮封面，由于不经看，后来改为塑料皮本，并且全是大红颜色的。后来传遍全球的‘小红书’也就由此得名。”

“我们编的这本‘小红书’向全

国发行已出乎我们的意料了，没想到后来又走向了世界。”

“那是1966年，《语录》在大陆已十分流行，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也希望能看到这本灼手的书。他们通过香港客商在广州进出口交易会上买回一批，但供不应求，一些工人和学生对此纷纷提出要求。为此，香港方面派人到广州新华书店联系《语录》出口事。”

“10月，中央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的同志来报社联系《语录》出口事宜，他们通知我们说，中宣部已经批准出口我们这本《语录》了，我告诉他们，我们正在修改‘前言’。”

“11月8日，他们再次来电话，说香港读者迫切要求出口《语录》，等不及修改前言了。并说外办廖承志同志报告了陈毅副总理，陈毅已批准给香港发一付纸型。他们已经将‘内部发行’字样去掉了。先出口三万册。希望我们尽快修改好前言，交他们出版，以满足海外读者的需求。”

“11月18日，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又向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打报告，希望尽快赶印《语录》出口本，报告中说：‘到目前为止，《语录》已有国际书店向我所订货10万册，香港

订货8万册，我所已于一个月前向人民出版社提出印制出口本20万册的计划……语录出口问题长此拖延下去，势必造成重大的政治损失……’

“当时不能落实出口的主要问题是前言和‘内部读物’问题，当时‘内部读物’已不是问题，再印时去掉字样就行了。1966年底林彪著名的‘再版前言’发表后，这个问题也迎刃而解了。”

“据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10月中宣部批准出口到1967年5月，仅八个月时间，中国国际书店已向全世界117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了英、法、西班牙、日、俄、德、意、尼泊尔、越南、印度尼西亚、阿拉伯、缅甸、斯里兰卡、波斯等十四种文字的《语录》共80多万册。”

“此外，有些国家因等不及我国翻译的各国文字的《语录》出版，就自己动手翻译出版。据不完全统计，法国、意大利、日本、德国、希腊、荷兰、比利时、丹麦、瑞典、挪威、波兰、印度、巴基斯坦、叙利亚、老挝、马来西亚、北加里曼丹、刚果（布）、西班牙、芬兰、朝鲜等国家，用英、法、日、僧伽罗、泰米尔、马拉雅拉姆、乌尔都、老挝、印地文、旁遮普、芬兰、朝鲜、孟加拉等二十四种文字自行翻译出版了40多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其中法国，早在1966年1月，《前言》还署名‘总政治部’时候，就在巴黎翻译、出版、发行了法文版。日本从1966年11月——1967年3月，也是在《语录》内部发行时期，就翻译出版了四种日文版《语录》近三十万册。瑞典从1967年到1969年《毛主席语录》印行了六版。”

“最近杂志上披露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有一位英籍华人，英国光华书店董事经理邓家祥先生，现在经营着英国乃至欧洲最大、最有影响的中国书店。据他本人讲，他就是靠卖《毛主席语录》发的家。1966年，他正在英国读书，他利用休息日在



伦敦海德公园出售中国书刊。他说：“我在海德公园出售最多的是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小红书几千本、几千本地被人们买去，包括英文、西班牙文、德文、法文、俄文，足有20多种版本。后来，这种情况引起了警察的注意，他们以阻碍交通为名，不准我在那售出。”邓先生索性在伦敦办起了中国书店，并且从此名扬海外。

“当时《毛主席语录》在资本主义世界都如此畅销，这说明虽然我们国家处于半封闭状态，但整个世界并没有把我们忘记，世界人民在关注着我们这个具有世界人口最多的神秘的红色中国，关注着领导中国的传奇式人物毛泽东。《毛主席语录》当时向整个世界介绍宣传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国，我想无疑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无怪乎有的国家评论说：《毛主席语录》的出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各大单位不同版本《语录》均告流产

“1965年，《毛主席语录》再版以后，特别是‘文革’期间，编《语录》形成了风潮，全国各地都编，大小单位都编，在社会上流传也不少吧？”我说。

“是的。但是都没有我们这本发行这么广泛。据我所知，中央直属就有四个大单位先后编了全国通用的《语录》本，都准备在全国发行，但也都没能传播开来。”

“1965年4月，人民出版社编了一本《毛主席语录》，准备向全国发行。据当事人讲，编好后，因为已有总政这本《语录》，他们也就作罢了。”

“在1965年，毛主席曾经指示陈伯达负责编一本全国通用的《语录》。陈伯达计划搞六万字左右，据

说因为太繁杂，最终也没能出版。

“1965年11月，中宣部指示《人民日报》编一本适合工农干部学习的《毛主席语录一百条》。编好后叫陈伯达压下了，也没能出版。”

“1966年5月，总政宣传部又准备编一本供战士学习的识字用的《毛主席语录一百条》。9月，他们编好后，向上写报告，要求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上同时发表。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和副主任刘志坚都同意了。但陈伯达在10月23日通知《人民日报》不要急忙发表，他说：‘这样的事是非常严肃的事情，要非常慎重，要经过大家研究同意以后才能发表。如果群众需要，可以出小册子，内部发行。’这本《一百条》后来就印成小册子，在军内发行了。”

“别的单位组织编选的《毛主席语录》，因为种种原因都没能在全国出版发行。只有我们这本《语录》，一下子覆盖了全国。”

“您不觉得你们编的这本《语录》在全国普及有它的偶然性吗？”我突然问。

“你提的这个问题我没有考虑过，但我认为，我们这本《语录》之所以能最后取得优势，主要是我们比其他几个单位编得精练、实用，政治

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涉及到了，但字数又不很多。”她这样回答我。

后来我找到几种版本的《语录》进行比较，没能看出总政的那本《语录》有什么特别的高妙之处，我想，它之所以能取代一切《语录》，是不是还有这样几点特殊的因素：

第一，它编得最早，发行面宽。它上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彪……各位领导，下发军内每一个士兵。出于先入为主的习惯，这本《语录》在中央各级领导及军内外群众中最先得到了认可。因此后来不管如何再编，人们也会觉得不如这本正宗。

第二，林彪当时政治上的影响。这个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林彪当时是我军的副统帅，后来又是全党全国的副统帅。这本《语录》，外界一直认为是林彪指示编的，当年也是这样宣传的（至今社会上都是这样看的）。因此，随着林彪政治地位的不断上升，这本《语录》的影响也就不断扩大，无人斗胆敢对它进行挑剔，刁难，所以它一走出军营便可平趟天下。至于林彪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别有用心地利用了《语录》，看来也是不可否认的。

第三，当时解放军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威望也是这本《语录》走俏

的原因之一。毛主席提出“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以后，中国百姓不但学他们的政治思想、战斗作风，也学他们的服饰，他们的作派。当年全国山河一片红（红海洋），全国人民一片绿（绿军装）。人们学着解放军的样子：身穿绿军装，腰束武装带，当然也要手擎“红宝书”了。而且这本红宝书也必然应该是解放军手里的那本了！

第四，《毛主席语录》始终一花独秀，不能百花齐放，可能也是后来作仪式使然。当年在大小集会开始时要例行一套仪式，其中有一项是：“让我们打开《毛主席语录》多少多少页”，而后，在领读人的一句“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的动令下达后，全场齐声诵读，这一道仪式，无论是响当当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罪该万死的牛鬼蛇神都是免不了的，作此仪式不容人们手中《语录》百花齐放。

以上这些大概就是总政编发的这本《语录》之所以能自始至终地盖过所有官方和民间编的《语录》的基本原因吧！

毛泽东本人赞成搞《毛主席语录》吗？

在田晓光留存的有关语录编纂方面的一大堆资料中，有这样一页打印文字，这在当时，不过是对一项具体工作的指示，但20多年以后的今天，却成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线索，它证明毛主席是赞成用“语录”这种形式传播自己的思想的。

这是当时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给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刘副主任：

主席指示陈伯达同志负责编写一本全国通用的“毛主席语录”。准备编写六万字左右，现只编写出一部分，约三万多字，给我送来一份。陈伯达同志



△周恩来和高举《语录》接见红卫兵的“中央文革”领导人

说，这本语录是在总政和各地所编写的主席语录基础上编写的，要征求总政的意见，将来他们讨论时还要请总政派人参加。

此事我已向林副主席报告过，林副主席指示，这是件大好事，要大力支持，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现将送我的一份稿转上，请你即告有关同志先研究，待陈伯达同志征求意见时，即可告伯达同志或参加研究。并将结果告我一下。

此致

敬礼

杨成武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这封信当时自然地很快转到了总政语录本主要编纂者田晓光手里。

“这封信可以肯定这样两点”田晓光对我说：“第一，看来毛主席是赞成用‘语录’这种形式传播他的思想的。第二，因为总政编的这本语录是根据部队需要编的，所以，毛主席还希望编一本全国通用的，能全面概括他的思想的。当时《毛主席语录》没有像后来那样普及，看来当时毛主席也是希望他的‘语录’能在全国普及的。

“但大也有大的难处，大而全既不易问世，更不易普及，后来也就夭折了。

“毛主席赞成搞语录，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

“1964年版《语录》刚出，毛主席就派人打电话来索要。这说明毛主席很早就看到了我们编的这本《语录》。

“1965年11月19日，中央办公厅打来电话，说毛主席同意给安

徽省委《语录》纸型，让他们自己印刷。当时《语录》仅限于军队内部发行。

“由此可见毛主席对《语录》的态度。”

“用‘语录’传播哲人思想，并不是什么新发明，我国古代的《论语》也是近似语录体的，在我们这本《毛主席语录》出版以前，就有马、恩、列、斯、毛的各种专题语录的出版。在矫枉有过正的今天不是也还在用这种方式传播中央领导人的思想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吗？”

“我认为问题不在‘语录’形式上，而在学风上，林彪提倡的‘活学活用，学用结合，立竿见影’的这种实用主义的学风，导致了后来毛主席的话满天飞，断章取义，为我所用。所以需要批判的不是‘语录’文体这种形式，而是那种实用主义的学风。当然，我们编的这本《语录》，客观上也助长了这种不良学风，但批评它的缺点时，还是要将‘语录’形式和不良学风区分开来。可惜后来‘语录’形式遭到了批判，不良的学风却遗留下来，不是有人将马克思当年买过股票之事引来论证当今股市的合理性吗？文风不正，即使不给他语录，给他原著，他也会断章取义的。”

“其实，‘语录’的作用也就是一个提示，引导人学习毛的思想，其中包含相对真理的部分，可以起到格言的作用。读书也要把握住书的功用范围，否则也会谬之千里的。”

罗瑞卿在《语录》工作上的功与“罪”

“1959年彭德怀被罢官后，林彪兼任国防部长，罗瑞卿被林彪提名任总参谋长。

“虽然他们的关系后来发展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但在开始，在对毛泽东思想和对毛泽东本人的宣传上，应该说是别无二致的。在《毛主席语录》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上，罗瑞卿管得比林彪要具体。

“早在1962年，罗瑞卿就在《解放军报》毛主席语录宣传小结上批示：‘大型辑录形式好，以后还可以用。’

“1964年，罗瑞卿首先批准：‘可以为地方代印《语录》，在军队学习的干部可以发给。’同时批准发给当时正在召开的团中央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

“1965年《语录》再版时，又是罗瑞卿打破框框，同意给地方纸型，

让地方自印的。

“按常理，罗瑞卿同志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上应该是立了大功的，可结果并非如此。

“林彪对毛本人及其思想的宣传逐渐走向肉麻的吹捧，把毛泽东举上了神坛，将他的思想绝对化，这是正直的人所接受不了的。

“罗瑞卿同志对林彪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总觉得有些不妥。1965年的一天晚上，他打电话向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同志请教：‘家英同志，你看那个提法在理论上站不站得住？’

“田家英同志当即斩钉截铁地说：‘那个提法是错误的！’

“罗瑞卿同志问：‘错在哪里？’

“田家英同志说：‘错就错在‘顶峰’这两个字上。因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科学，是真理，而科学的真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前进而不断发现，不断发展，不断丰富的，所谓‘发展的顶峰’，其含义很明显，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毛泽东思想就到了头了，不再发展了。怎么能这样说呢？所以，‘顶峰’的提法，是违反科学的，违反辩证唯物主义的，是站不住脚的！’

“罗瑞卿非常赞许田家英的观点，在一次会议上，他把这些见解用自己的语言讲了出来。

“这一年，他对再版的《语录》送审本内容未提出什么意见，却不同意‘前言’中引用林彪的一句话：‘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他说：‘不能这样讲，最高，难道还有次高吗？最活，难道还有次活吗？’‘最高最活，不好理解，外国人也不好翻译呀！’让考虑删去（正式出版时我们删去了这句话）。后来罗的指示不知怎么传到了林彪那里。成了林彪用来置罗瑞卿于死命的借口。

“1965年，林彪指使叶群跑到上海向毛主席告了罗瑞卿的黑状，



△上天安门的外宾也高举《语录》

导致12月8日到15日,中央突然在上海召开背对背批判罗瑞卿的会议,但在那次会议上,林彪没能置罗于死地,因为毛主席对林彪说: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还是一片好意。

“上海会议以后,林彪很快把罗瑞卿的所谓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材料送到了毛主席那儿。3月在北京召开了由毛主席及军委常委参加的会议,就在这个会上,给罗瑞卿的问题定为反党反毛主席的性质。

“在罗瑞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状’中,他反对《语录》前言中‘最高最活’的话算是最重大的一条。尽管后来毛本人也明确指示:今后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语言。但罗瑞卿也没能因此减罪。

“罗瑞卿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很积极的,但由于奸佞当道,反使他功亏一篑。”

“1967年,林彪一伙要为‘大树特树’立新功捞资本,提出要编一本《毛主席语录》修增本,代替原《语录》本。原来关心支持《毛主席语录》出版发行的老师傅们和罗瑞卿、刘志坚及唐平铸都以各种罪名被打倒了。当年11月,就由军委办事组成员邱会作、张秀川、刘锦平组织总

政、海军、空军十五人成立了修增《语录》组。由海军张秀川负责抓总,下分总政、海军、空军三个小组,总政组由著名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调报社工作不久的廖初江同志担任组长。我是原《语录》的主要编者,所以也被吸收为修增《语录》小组成员。

“当时,完成这样一项神圣的任务,是要开个会,首长接见一下,表示重视的。

“开会那天,军委办事组的成员都到了会。在会上,让每个参加这项工作的人作个自我介绍,当我站起来作自我介绍时,张秀川与我眼光相遇,他打了一个愣,看来是认出我是谁了。

“你知道,文革时是很讲究家庭社会关系的。一个人有问题是要株连九族的。当时在海军工作的我的丈夫正被李作鹏、张秀川、王宏坤扣上‘苏振华的狐群狗党’的帽子在批斗。过去我和张秀川曾相识,想必这次是逃不出他的手心了。

“我心里忐忑不安,没有心思听会,只是想着株连的事。

“散会了,张秀川将廖初江留了下来,我马上预感到灾难就要临头了。

“当时军报的主要负责人是肖力,即毛主席的女儿李讷。果不其

然,回到报社后,肖力就找我谈话,传达张秀川叫我离开修增小组的意见,但出乎我意料的是,她并没有让我马上离开修增小组。她谈了这样三点:一、她本人是信任我的;二、革命重在个人表现,不应该受到家庭影响;三、认为我对选编毛主席语录有经验,工作需要,应该留下。由她请示军委办事组再重新考虑让我离开修增小组的意见。

“我在那样的精神压力下,听了她的一席话,心里自然很温暖,很感激。感到她虽然是造反夺权上来的,但在这种事上,却处理得既合政策,又有人情。

“但张秀川他们还是不能饶过我,肖力说话也没用。

“这时肖力决定仍把我留在修增组工作,只是在上报的名单上除名,说白了,就是瞒上不瞒下。使我成了个‘地下工作者’。这种事也就是肖力能干,因为没有人敢打她的小报告,告她的‘黑状’。

“时间过得很快,到了1968年4月,修增本的初稿编完了,三个小组即将合并,我参加这项工作就无法再瞒下去了,只好到此为止,我退出了修增组。

“编选《毛主席语录》本来是件好事,万万没有想到,竟由此引出了一系列‘《语录》案’,最后连我这个‘始作俑者’本人,也成了‘案犯’……”

我手头恰好有一些资料:

1968年初秋,北京某所大学哲学系主任、有名的康德专家,由于席地而坐时,垫在屁股底下的笔记本中夹着一本《毛主席语录》,而被打成反革命,从此,被造反派课以“专政”,撵下了“无产阶级”的讲台,发配到锅炉房烧锅炉了。

1967年,军队中的一个涉世不深的十几岁的毛头小子,和战友抬杠,互不相让,谁也下不了台,这时对方突然抛出圈套,提出:“你敢撕《毛主席语录》吗?”不甘下风的楞头



△购阅《语录》的日本朋友

青竟敢冒当时天下之大不韪，将《语录》撕碎，从此被投入监狱。为了一时挣得面子，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后来他在狱中天天痛哭，后悔不已。

总部直属单位有位同志，在参加会议时，不在意把手中的《语录》本插进了翘起的“二郎腿”的裤腿中，被“政治嗅觉特别灵敏”的人看见，当场大喝道：“我们这个会场出现了现行反革命！你们看！他把红宝书放进哪里去了！”当事人这时发现也晚了，马上立起请罪，人们不饶，除现场批斗外，还要继续对他进行审查。他惊恐万分，会后不久，跳楼而死。

还有个部队战士在抄写毛主席语录时，将“毛主席”误写成了“毛主席度”而受到批判。

……
此类“政治案件”在文革中层出不穷，不胜枚举。就连《毛主席语录》的发源地——“毛主席语录”编辑组里，竟也蹦出了“反革命案件”。田晓光向我沉重而沉静地从头谈了这宗‘语录案’的案发经过：

“说来也是很荒唐的。1968年，我修增《毛主席语录》的工作停止后，报社领导决定让我编一本《毛主席指示》，就是将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以来发表的最新指示汇编成册，作为原《毛主席语录》本的一种补充。领导上特意从印刷厂调来一位具有十几年校对经验的张凯夫同志协助我搞校对工作。

“6月份，所有选编任务均已完成，小样也已校完，这时肖力已不在军报，有位领导要将《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的讲话》全文附在《毛主席指示》后面。

“当时我手头上没有这份文件，张凯夫说他可以找到。为了节省时间，我就将要发排的稿子全部交给了他，交待他找到那份材料后，附在后面，替我发了就行了。

“事后的一天，张凯夫没来上班，也没请假。我觉得有点奇怪，到



了下午，我才听人说，他往毛主席头像上打×，是现行反革命，被抓起来了。

“报社那两年也发生过这类事件，记得一起是打字员将‘打倒肖华’打成了‘打倒肖力’，一起是一个编辑在处理标题回行时，处理成‘反标’了。但张凯夫的事情当时对我震动仍非常大，我以为我的警惕性不高，他同我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我怎么看不出他竟是一个反革命呢！可几个星期之后，当我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时，我才明白，当一个反革命是何等的容易。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他找到了《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的讲话》的小册子，原封面上有标题，这是我们《语录》中需要的，标题上面有一幅毛主席头像，这是我们《语录》里不需要的，按发排稿件的习惯，他在不要的部分顺手画了个×，没在意正×在毛主席头像上。

“张凯夫做为活靶子，在大小会上遭到批判时，我还是安然无恙的。不做贼心不虚。

“就剩我一个人了，校对工作也落到了我的头上，我加班加点，夜以继日，最后三天，天天干到12点以后才睡。

“最后一个晚上，已到半夜了，

我在办公室里处理最后的工作。总编室战斗队一个人来到我的办公室，一会儿坐坐，一会儿翻翻报纸，一会儿来回走走。我挺奇怪，人家忙成这个样子，他还在这儿瞎转游，也不知有什么事。我没功夫搭理他，埋头处理我的事。当我把《毛主席指示》大样总校完毕，在付印单上签了字，一切工作就绪，抬起身来想轻松一下的时候，总编室战斗队的头头领着几个战斗队的成员，虎视眈眈地站在我的面前，原先那一位不知什么时候溜走了，我这时才意识到，他原来是来监视我的。

“我镇定了一下，问他们：‘什么事？’

“‘什么事！你不要再装蒜了！你与张凯夫合谋在毛主席像上打×，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还在这儿装糊涂呢，走！’说完还振臂高呼：‘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等等口号。

“我这时就是有一百张嘴也没用，我太累了，事后竟记不清我是如何与他们争辩的了。他们把我押到了临时关押走资派、反革命的‘小院’。我当时虽然很气愤，但是也抗不住长期疲劳和困倦，倒下来就睡着了。我心里没鬼，睡得也香。我想反正任务完成了，好好睡吧，休息好了，再找他们把事情说清楚，这样，

我一连睡了三天三夜。

“我还是太天真了。在‘牛棚’里我多次写信找他们理论，还写了信给肖力，但都无济于事。他们不理不睬，一拖就是半年。后来又给我另加很多莫须有的罪名，对我进行诬陷迫害，并且抓了放，放了抓，使我成了个三进三出的‘牛棚’元老。”

“最后一次是1971年，‘9.13’林彪出逃自我爆炸后，我又被隔离审查。让我交待在编《毛主席语录》过程中与林彪有什么联系，真是莫名其妙！”

“《毛主席语录》在最时兴的时候，功劳都记在林彪的帐上，我该株连九族，照样株连，该蹲‘牛棚’，照蹲‘牛棚’，没有得到半点好处。可林彪倒台以后，却让我承担编纂《毛主席语录》的‘罪过’。”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一次，报社有位领导同志私下向我透露：上面有精神，要批编《语录》的事，让我有个思想准备，不要来时精神上顶不住。社里老同志都知道，《毛主席语录》不是林彪指示叫编的，是我们提出要编的，也主要是由我负责编的。”

“但后来，编《语录》的事没能批得起来。大概也是因为‘投鼠忌器’吧！”

“《毛主席语录》是‘文革’前选编的，在过去的年代里，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在‘文革’中，林彪等人利用《毛主席语录》大作文章，以至搞到荒唐的地步，完全违背了我们当年编辑出版《毛主席语录》的初衷。其原因也是很复杂的，真正承担罪责的不应该是我们编者。”

谁能回答？

文章到此就要结束了。虽然文中仅是《语录》的一个编者亲历所知的事，尚有若干高层幕后的事，至今还是个谜。不过我还是想问：这本

小红书在二十多年前搅得周天红彻，这中间是谁起了主导作用呢？

是毛泽东吗？历史和他个人的需要使他一次又一次地肯定了制造个人崇拜的作法，一次又一次地赞赏用各种方式，包括用《语录》宣传他个人及他的思想，并将把他的旗帜举得最高的人，推上了副统帅的位置；

是林彪吗？他对树立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权威无所不用其极，他将自己学习中创造的摘警句、录格言，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经验，推广到他权力所辖的军队，又通过抓典型，使这种方法在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中得到广泛推广和运用，是功劳，是罪过，尽在其中；

是田晓光或支持、批准她编发《语录》的各级领导人吗？他们都在自己的岗位上，怀着对领袖的赤胆忠心，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进行了积极、主动、甚至创造性的发挥；

是那些推崇《毛主席语录》的元老元帅们吗？

是被个人崇拜的爱火烧得近乎疯狂了的广大群众吗？

是的！他们都在其间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作用。

不！他们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这么大的能量让这一本小书发行50亿册，并复盖全国又流向全球。

伟大的、公正的历史之父啊！你能给我们一个正确的回答吗？

编后 在“史无前例”年代，发生过多少史无前例的事？

一本“小红书”竟一下泛滥全国、流向全球，发行量大达全人类平均一本半还有余。

这件前人不能想象，后人不可理解的“历史大事”，到底

是怎么发生、发展直到发“疯”的呢？一位亲历者向人们叙述了此事全程奥秘。尽管其中尚有疏漏欠详和认识有异之处，但总体是真实的、客观的，对于人们了解和研究那一段历史，无疑是一分丰富而生动的史实资料。

我国从古到今，尤其是本世纪以来，如这样值得探源寻踪的事何止万千？仅就“小红书”本身，也还有许多不解之谜。如果都能象这样将其兴衰涨落加以探究记述，人们必将从中获知并领悟从国家民族到党和军队所以兴衰涨落之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就是我们向读者推荐此文的初衷。

（责任编辑 卢弘）

汪事会谈成功有感

吕鸿

辜汪齐奏和声曲，
狮城佳音四海溢。
求同存异明共识，
经文交流奠路基。
血乳交融汇如潮，
截波阻澜枉自期。
“台独”狂吠人唾骂，
分裂祖国罪恶极。
“三通”呼声不可挡，
鱼雁飞鸿早传递。
和平竞争宏图展，
互惠互利促统一。

萧克

一九三〇年：
毛泽东

为何批林彪？



△战争年代的毛泽东和林彪

毛泽东的光辉著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选》注释是篇通信，是和谁通信？过去知道的人很少，现在都知道了，是和林彪。

这篇通信，是1930年1月红四军在闽西根据地的时候写的。通信的目的是为了克服当时红军党内以林彪为代表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思想；也是为了提高广大干部的思想水平，就由军党代表办公室油印小册子送给林彪，同时发营以上干部阅读。

林彪当时是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毛泽东为何写信给他？我认为，主要是针对他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林彪不相信全国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

毛泽东在信中指出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说的“有到来的可能”。而是“站在海岸远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艘航船……”林彪则没有看到。在南昌起义失败后部队由三河坝向湘南转移时，林彪悲观失望，在大庾曾经逃跑过，由于跑不出去才回头的。在井冈山，林彪曾提出“井冈山

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记得二十八团党委在召集营以上党委委员讨论红军主力下井冈山的时候，林彪多次讲：“现在边界很困难，只有红米南瓜是不行的，一定要打出去，不然，就没有办法维持。”他在白露军委（或前委）扩大会也这样讲。下山之后，我们利用新军阀混战，在赣南及闽西展开广泛游击战，毛泽东提出一年内夺取江西的计划，但林彪相信流动游击政策，不满意这个计划。记得他有次从军部开会回来，说毛泽东对时局的估量太乐观，从东江回闽西后还这样讲过。

林彪这些观点，毛泽东经过长期观察，知之甚深。为了教育他，帮助他，便有针对性地给他写信，说“从前颇有感觉，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划，而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也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又指出，林彪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在全国各地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思想，是不适合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的。因为不做预期的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的工作，就不可能建立和巩固赤色游击根据地。

林彪错误思想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情弄清楚。从鸦片战争后到解放战争前，各帝国主义都侵略中国，在中国产生很多矛盾。辛亥革命后，软弱的资产阶级没有造成全国统一的局面，各帝国主义在自己的势力范围扶助一派军阀去反对另一派军阀，扩大自己的势力，这样，就产生了长期的军阀混战。大革命时期，北伐军从广东打到长江流域，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中途被资产阶级右派和买办豪绅篡夺了，随即开始了新军阀大混战。1927年冬在两湖、安徽一带是李唐战争，广东是张李战争等。新军阀之间在北京天津没有打下之前，需要暂时的妥协。1928年上半年，又开始了所谓北伐，消灭了张宗昌，把张作霖赶出关外，完成其所谓“统

一”。统治阶级的稳定是暂时的、表面的而已。红军主力下井冈山的四言布告，有几句说：“蒋桂冯阎，同床异梦，冲突一起，军阀倒运”，就是对当时各派正在酝酿着新的军阀混战的分析。过了三个月，蒋桂两派就大打起来了。这一年的秋冬，又发生蒋冯蒋唐战争，两广也打得乌烟瘴气。真是“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毛泽东的伟大诗篇《清平乐·蒋桂战争》，是这样描写蒋桂两派开始发生的大混战的。

军阀混战，从客观形势上给我们以很好的发展机会。1929年3月，红四军从广昌向南进军，国民党军张与仁旅追我们到壬田市附近，忽然停止回头了，我们后无追兵，就放手打汀州，打死国民党旅长郭凤鸣。从此，就和闽西地方党一起，在较短时间建立了大块革命根据地。赣南游击战争，也得到了大发展，其它地区的红军游击队，都利用这个机会继续发展，左右江的革命士兵和农民，利用两广军阀混战的机会也暴动起来了。所以毛泽东就作出革命形势有很快到来的可能的论断。

毛泽东为教育林彪和提高干部的思想水平，指出：夺取江西的计划“只有详细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毛泽东从实际出发，认为在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更加迫切的情况下，就会在中国引起并加剧一系列的矛盾，例如：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混战一天天地扩大和剧烈；农民暴动起来反抗政府和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工人抵抗资本家的压榨；国货受外货的压迫而日益困乏，走向破产；学生常有失学及毕业即失业的忧虑；士兵群众处于战争死亡和困苦之中，他们很不满意国民党，甚至有不少哗变起义。毛泽东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情况，得出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的不可避免，而且会很快到来的结论。星火燎原，正是当时革命形势发展的适当描写。

第二个问题，关于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及农村包围城市问题。

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农民人口占80%以上，这样就产生了农民问题的重要

偶 感

○莫文骅

一

连年辛苦获丰收，
家家温饱不发愁。
隔墙小学乖儿女，
不时抛来剩馒头。

二

欢天喜地庆中秋，
富家糕饼积如丘。
食馀不去赏明月，
垃圾堆中一并丢。

三

艰难时节想稀粥，
肚饱却又厌脂油。
当今物资稍丰盛，
肥肉进口有人呕。

四

时代不同人亦变，
优良传统弃可羞。
奉劝同胞少青老，
节约还是一良筹。

性。工人阶级要解决中国革命任务，就要发展广大的农民革命运动，可是林彪没有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的深刻观念，他羡慕流动游击，是流寇主义思想，由此就产生：第一，1929年夏，不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在一定时期内争取江西的计划。第二，上级指令拨枪给地方，他常有怨言，说主力越刮越瘦。有时甚至拒不拨枪，就在这封信之后的1930年2月水南、直下大胜后，仍不愿多拨枪给地方，因为他要把还没有经过教育的大批解放士兵编入部队，不走由深入土地革命来扩大主力的路线。他说江西人“会拿算盘，不肯拿枪”，有时说江西人“不肯当兵”。林彪不参加群众工作，不做社会调查，不接近士兵。他身在农村有时心在白区。如1929年秋打开上杭城，他和纵队政委熊寿祺闹意见，几次写信给四军军委，提出去上海工作或去苏联学习。

毛泽东以严肃的原则性和耐心诱导的态度，致书林彪，促其觉悟。信中指出，如果认清了中国是许多帝国主义争夺的半殖民地，就会明白一系列问题。共讲了六个，第一个讲中国各派军阀为什么会长期混战，为什么不能有统一的政权？其余五个基本上是讲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发展农民革命运动及依靠农民建立红军游击队，以及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问题。“通信”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由农村走向城市道路的思想。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写的两篇文章，就肯定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对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和依托根据地以创造真正

的红军及其作用，也有充分估计。在蒋桂战争刚爆发不久，毛泽东提出争取江西及闽西浙西问题，就是这个思想的具体部署。林彪反对争取江西的计划，是不懂得这个任务是根据江西当时主客观条件决定的。主观方面，我们在江西盲动主义的错误比较少，游击战争很发展，对南昌、吉安造成了包围形势。客观条件是江西封建经济占主要地位，地主武装弱，驻防的是朱培德的客军，数目不大，对江西情形不熟，和本省统治阶级有矛盾，距离帝国主义影响比较远，加上全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条件，争取江西闽西及浙西的思想，就是用“工农武装割据”来包围城市。又采取波澜式的发展，逐渐扩大，达到最后夺取城市，走向全国胜利，历史已经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的辉煌范例。

从前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林彪早期并不是完全正确的。虽为党和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思想上是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个人英雄主义的，过分自尊，爱惜羽毛，从不作自我批评，也不让别人批评。庐山会议后，乘机倖进，纵情傲物，欺世盗名，对通信过去不表态，示人以接受的样子。但到“文化大革命”中，地位膨胀，就在井冈山题反诗“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多年来，他用自己手造的墙，和别人帮造的墙，深闭固拒，把自己的劣根性保护起来，任其发展，推向极端，卒至身败名裂，不耻于人！

（本文节选自作者近著《朱毛红军侧记》）

“文革”小品

“四类分子” 生活记“趣”

○鲁 訇

1、从新四军到“新四类”

我在“史无前例”时，被史无前例地打成反对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并押回原籍，与村里原有被管制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一起，在群众监督下劳动改造，由此开始了我的“四类分子”生活。

第一天劳动中，几位“四类分子”老前辈，对我表示了某种欢迎和关切，我家近邻的那个地主分子对我叹惜道：“我原以为我们这些四类分子死一个就少一个。没想到还会有新的四类分子，更没想到你会当上这新四类分子。”

一个富农分子也同情地对我说：“是呀！我记得你从小当了新四军，怎么革命革到而今，革到了我们一堆，由新四军同志革成了新四类分子，真不知咋回事？”

我暗地自嘲道，当年的新四军，今日的“新四类”，这真是开了个历史玩笑。

那地主又说：“常说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定我是四类分子，还有个说头，谁让我家祖上给我留下了田产呢！你家原本是种我家租田的，我们怎么也‘类聚’不到一堆呀！”

一个当过国民党县政府秘书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小声关照我说：“听说现在的政策是重点打击现行犯，人说我们已是‘死老虎’了，你那头上戴的是顶‘现行’帽子，可得格外小心啊！”

2、你不认我认

初回乡时，手头一样劳动工具都没有，挑担没扁担，送粪没粪桶，又十分难借。到公社的“生产资料门市部”去买，那里要公社干部批的条子才卖，我只得去求一位当公社干部的表弟。考虑到他的“面子”，我只得到他家里，向他的母亲即我的舅妈说了此事，舅妈说这好办，马上让孩子去叫他拿张条子回来。可我左等右等不见他人回更不见条子，以为他忙，就说下次再来，哪知出门后碰到他在闲逛，但却故意没有理我，我便礼貌地向他招呼了一声。谁知他见周围有人，竟马上拉开架子，扯起嗓子，当众训斥我为什么不在队上老老实实劳动改造，却出来乱跑乱说乱动。我说我没有乱说乱动，只是想请他帮助解决缺少劳动工具的问题。他却横眉瞪眼地说：

“告诉你，生资门市部的农具，只供应贫下中农、插队知青和下放干部，你什么也不是，就什么也不能给！”

我还是恳求他破例开恩给帮帮忙，他却说：“不给就是不给，你休想钻革命的空子！”

我生气地说：“好呀，你倒是大公无私六亲不认啦！”

他说：“对你这样的反革命，我就是不认，就是要同你彻底划清界限！”

我说：“你不认我认，我从此也认识了你这个革命的好亲眷了。”

3、你也伪装伪装看

县革委某领导为了解“阶级斗争新动向”，下乡查问我在劳改中的表现，乡亲们争相说我怎么一到家就埋头参加劳动，怎么干活不怕苦不怕累，今天正落雪，一早就抢着跳下冰河，扒河烂泥积肥。那领导听了，教训乡亲们说：

“他这是伪装，这种人可是有阶级斗争经验的，你们不要被他用假象迷惑了！”

有个乡亲说：“你更有阶级斗争的经验，他今天正下冰河扒河泥，你也下去伪装伪装，看看我们受不受你迷惑！”

4、难得的“摆子”药

夏天，我打开了“摆子”（虐疾的俗称），想买点药治病，怎奈身无分文。正筹款无着时，公社水闸工地要人去挑石头，一天可得三角五分钱补助。人们因天太热、活太重、钱又太少都不肯去，我却自愿去了。每担石头二百来斤，从天亮挑到天黑。我的“摆子”恰好在中午休息时来，到時候朝地头一倒，抖一阵，出身汗，过去了继续上工，并不误活。这样干了整十天，得了三元五角“巨款”，忙拿了钱去公社医院买药。里头人收了钱包好药递出时见是我，又见近旁来了几个干部，忙把药收了回去，将钱朝外一扔，大声地说：

“我们的药品供给贫下中农和革命干群，不管你们这种四类分子！”

我抬头见墙上有“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标语，就指着它说：“按照最高指示，这药可以卖嘛！”

那人却指着另一条“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说：“这也是最高指示，专门治你们的。”

我只得快快而返。半路上遇到邻大队一个赤脚医生，他见附近无别人，悄悄问道：“老×，去哪里啦，脸色怎么这么不好？”

我将原委告诉了他，他忙打开随身药箱，递给我一小包药，又推开我递过去的钱说：“趁没人看见，你快拿去！”

我感激之余忽然想道：早知如此，何苦去挑了十天石头呢！

5、营养化学

一天，我同本队的“历史反革命”和“地主”一起劳动时，问起他们怎么都那么瘦，是不是有什么病？那

“历史反革命”说：

“病倒没有，就是缺少脂肪。”

那“地主”说：“谈何脂肪，有淀粉就行。”

我一听就明白了，这是在说他们长期缺粮没油吃不饱。正说着，一个干部来了，警惕地问道：“你们在说什么黑话？”

我忙随口解释道：“哦，他们说的是营养学，与政治无关，不是黑话。”

“营养学是什么？”

那“地主”过去是化学工程师，我就随口道：“好象是一门化学。”

那干部忙问“地主”道：“怎么，你还想搞化学，是不是要复辟？”

“地主”慌忙说：“不敢，不敢，死也不敢！”

那干部得意地说：“谅你也不敢！”又转向我道：“你有文化，听到他们说黑话，就向我报告。”

我说：“放心，不过有我在边上，他们什么黑话也不敢说。”

（后话：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那“历史反革命”和“地主”都被摘掉了帽子，前者曾来京探亲并治病，后者真的“复辟”了，回某市一化工厂重当了工程师。可惜他们都因过去缺少“脂肪”和“淀粉”太多，体质太弱，不久都先后病故了！）

6、请你拒绝“腐蚀”

在那火红年代里，家家穷得叮当响，谁要有一点钱，就会被人盯上。我们队那个“历史反革命”在劳改农场时学会了烧窑，刑满回乡后帮邻大队烧了一窑，给了他40元酬劳。他怀揣“巨款”刚到家，大队某干部就来找他“借”30元“急用”，又说自己还没吃晚饭，让他马上买些酒肉外加两包好烟回来，他不敢抗命，只得一一照办了，结果不仅被敲得一分不剩，还倒赔了许多。我回乡第二天，因队上耕牛死了正筹钱买牛，我却当了“反革命”不忘学雷锋，将离婚妻子在分手前硬塞给我的200元，拿了150元给队上应急。结果露了“富”，那干部当晚就来找我“借”50元“急用”。我说集体急用，我尽力支持，个人需要一是满足不了，二是怕将来说不清，严肃地拒绝了他。我母亲知道后急道：“你这下惹祸了，得罪这种地头蛇可不得了！”她忙将自己留下准备过春节用的15元，“自愿”地“借”给了那干部。

不久开展“狠抓经济领域阶级斗争”，第一个被揪斗的竟是那“历史反革命”，罪名是在经济上拉拢腐蚀革命干部。包括我在内的全体“四类分子”奉命陪斗并交代自己在这方面的罪行。轮到我时，我主动交代说，

某干部也向我家借了钱，如果这也是腐蚀干部，我就马上以实际行动来赎罪，请某干部立即把钱如数还我，也以实际行动来拒绝我的“腐蚀”。别的几个“四类分子”听了，也纷纷表态，一致请求允许他们“赎罪”，请某干部从此拒绝“腐蚀”，弄得那干部十分狼狈。不料散会时那干部却把我扣下了，罚我当夜出义务工，冒着风雪到村北河边看守未拆的抗旱水车。

我只得去了。守到半夜，那“历史反革命”摸黑来了，从怀里掏出两个热乎乎的烘山芋塞给我说：“我不是在‘腐蚀’你吧？”

我说：“没事，我反正没资格被‘腐蚀’。”

7、我叫你造反！

我们队贫农杨老汉有个儿子，由于根正苗红，当上了造反派小头头，揪人抄家打砸抢，无所不为，无人不骂，只有我们几个“四类分子”对他既怕又恨更讨厌。一天他又向我们耍威风，他老子忙赶来拦他道：

“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没捅过别人一指头，你别再造孽了！”

儿子把他一推道：“你懂个屁，我们是在革命！”

他骂道：“你革个屁！”又指着我说：“他革命的时候，你还抓羊屎当酱豆吃呢，他又惹你什么啦？”

儿子道：“现在是造反时期，什么都反了，过去革命的，现在就是反革命！”

他跺着脚道：“你个忘八蛋，革命的成了反革命，我这老子是不是也要反过来当你的儿子了？你说，你说！”说着就上去揪住儿子。

儿子甩开他怒道：“你胡搅什么！”见他老子还要来揪，拔腿就走。

老子忙再去抓，儿子却跑开了，几步蹦过河坝头，老子怎么也追不上了。气得那老汉浑身发抖脸发白，连骂带噉不解恨，忽然出人意料地解开自己的裤子，掏出裤裆里那玩意，折了根树枝边抽打边骂道：

“我叫你跑，我叫你造反！叫你再跑，叫你再造反！”

我怕这老汉气疯了，忙去劝他道：“大叔，别太生气，你干嘛跟自己过不去呢！”

他狠狠地说：“不，我这是在揪他的老根，抄他的老家，我也在造反，也在革命呢！”

8、处理哪一个？

夏忙插秧时，一群奉命支援农忙的小学生，正在田间紧张劳动，见一公社干部头戴草帽，身穿的确凉

衬衫，脚踩海绵底拖鞋，背着手在地头踱步巡视。一个学生朝同学们嘀咕了一下，忽然齐声背诵开了“最新最高指示”：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个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

那干部傲然地说：“我又不是下放干部。”

小学生接着背诵道：“在职干部也应该分批下放劳动。”

那干部恼火地说：“那也不是个个都去。”

小学生马上应道：“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该这样做。”

我正挑秧到田里，见此情景不由一笑。那干部忙指着我对生产队长说：“你们队里问题严重，四类分子公然挑动群众攻击党的干部，一定要追查处理！”

生产队长说：“我看见你说的四类分子一声也没吭，却只听到红小兵们在宣传最新最高指示，你让我处理哪一个呢？”

9、“反革命”画革命画

身为专业画家，几年不能作画，不由技痒难熬。正好大队新建的供销社，让我去帮他们写牌匾店号，我见两面白墙十分平整，自告奋勇为他们加绘壁画，供销社的人自然欢迎。我便一边画了一幅“农业学大寨”，一边画了一幅“为人民服务”。作画时不断有人来观赏并啧啧称赞，很快惊动了公社革委会，革委会主任带着公安科长和武装部长一齐赶来了。我恰好已经画完，正在画上写“最高指示”，他们不便禁止，就去责问供销社负责人道：

“谁让你们找他来画画的？”

“怎么，不是画得很好吗？”

“他是个反革命，你不知道吗？”

“我只知道他画的画是革命的。”

10、四份中央文件

关于林彪罪行的中央文件，一直发到了生产队并传达到全体社员，我和所有的“四类分子”一样，照例没有听传达的资格。本队传达文件的当晚，生产队长老陈把队里那份文件悄悄塞给我说：

“你自己看看吧。我也不懂上头的事，那最最革命的副统帅，竟是个最最阴毒的大坏蛋，我看你也是被他们残害的忠良，说不定有出头之日了。”

我忙双手接过，拿进里屋藏到枕头底下，准备夜里细看。

天黑后，年轻的大队支书小姜忽然来到我家，递给我一卷什么，小声说：“你好好看一下，看完再给我，千万不要告诉别人！”说完就推开我出门走了。我回屋点上灯打开一看，原来是同一份文件。

吃罢晚饭，正打算顶上门去里屋看文件，有人轻轻推门进来，又回身把门掩上，这才转身对我招呼，原来是公社粮管所的严会计。他说：

“我特为请你看样东西，你一定会有兴趣，说不定你的问题会有变动了！”

说着从手提包里掏出一份包了又包的材料，机密地道：“这是关于林彪问题的中央文件，你看完放好，我过两天来拿。好了，回见，你别送！”自己开门，象来时一样悄没声地走了。

夜深人静了，我关严门堵上窗户，从枕头底下取出三份同样的中共中央红头文件，兴奋地细读起来。正读着，只听窗外有人轻敲几下小声叫我。我慌忙藏起文件，问道：

“谁，什么事？”

外面说：“我，进去再说。”

我狐疑地刚把门打开一条缝，一个竖着大衣领又裹着长围脖的人，一下挤了进来又马上把门插牢，很快解开围脖和大衣，不断擦着满头大汗，我这才看清来者是本村在县里工作的一个非同宗堂弟。我忙问：

“怎么，刚从县里回来吗？”

他说：“就是，天黑后才出的城，一气蹬车到家，连家一放下车子就来了，明天一早还要回城去。”

“有什么急事吗？”我问。

他说：“不是急事，是大事，关系到全党全国，也可能关系到你个人的一件大事。我不惜违犯一次纪律，好让你早点知道这事。”他边说边从里头衣袋里拿出了又一份我已经得到三份的文件，我接过时上面还保留着他的体温。我没有说这是自己今晚接连收到的第四份同一文件，只是心头热辣辣地说：

“谢谢你，谢谢同志们，谢谢我们的党！”

11、乡亲的祝贺

我终于获得了平反，原单位派人陪我回到曾经劳改过的家乡，为我恢复名誉消除影响。从县城回公社时，一人叫了一辆“二等车”（即后座搭客的自行车）。

上路后，为我蹬车的那个老乡与我闲谈中，知道我从北京来，家就在正去的公社，就对我说：

“你们公社也有个北京下来的人，这个人可了不起呢！听说已经平反复职回北京了。”接着又说了许多关于我的事，只是都被添油加醋地走了样，我忍不住为他一一纠正着。

他听了忙问道：“你怎么也知道这些事？”

我笑道：“因为你说的就是我。”

他马上煞住车跳下来，不住打量我道：“真的是你？”

我说：“不假，这回就是特地回来宣布平反的。”

他忙叫住另一位蹬车者道：“嗨，你晓得搭我车的是哪个？”不待答话又情不自禁得意地说：“就是我们早听说的那个北京同志呢！”

那位也高兴地说：“好啊，算我们运气好，碰上你平反回来，恭喜恭喜！”

为我蹬车的这位又说：“今天的车钱一分也不要了，算是我们对你的祝贺！”

12、你保不了密

我回乡平反时，有一亲戚老远赶来问我道：“听说你这次平反，毛主席和周总理都说了话，你能给我细讲讲吗？”

我说没有这事，他说：“你不要保密，我早听说了！”

我问他听到了什么了，他认真地说：“听说你在平反时向中央打报告，要求还回家乡继续劳动，和乡亲们一起彻底改变家乡面貌。”

我说是有过这想法，但是没有打什么报告，更不会向中央打。他说：“你还瞒我，大伙都知道了，你的报告送到周总理手上，他马上批示同意，说你是个好同志，应该支持你的意见和愿望。报告最后送到毛主席手上，他看了却批示不同意你回乡，说你这样的好同志，应该回到北京，做更重要的工作。”

我笑道：“我第一次听说这事，不是谣言，也是误传，你千万别信！”

他却摇摇头说：“不，你自己说的不算数，眼见为实，你马上又要回北京去，就说明你在执行着毛主席的指示。我心里有数，你保不了密！”

一个诗人 ■ 欢歌 ■ 恋曲

○ 顾 工

(长篇纪实文学《年轻时 我热恋》选载)



△诗人顾工和他的「栗色发髻」

春天,1949,共和国之春。
我随着横渡长江的百万雄师,
神采飞扬地跨进了南京。
我走进纸片飞舞的“总统府”;
我走进楼房似卫队般排列的
“国防部”;
我走进没有人行政的“行政
院”;
我走进……
一步一个音响,一步一声欢呼
……
旧世界,新天地;新天地,旧世
界,如同万花筒般在我面前旋转。腰
鼓,入城式的礼炮,秧歌……
和平,早已在大江以北徜徉。她

走近冰消雪化的淮海战场,她跨进
四门洞开的北平古老城楼……

北京:首次文代会 “赶走”董必武 周恩来为“小鬼”题词

刚解放的北平发来通知:要在
那里举行第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
表大会。我们第二野战军也要派文
艺团体参加。

我们驰车北上。

那是乍热的初夏。津浦铁路刚
刚接通。我们坐在一辆没有车棚的

敞口货车上。火车头喷出的黑烟和
大粒煤屑,劈头盖脸地直扑过来
……车时走时停,日日夜夜,不知是
多少个昏晨,没有时刻表,没有固定
的月台……

受罪——但经受了多年在崎岖
山路上,日夜兼程行军的我和我们,
受这种罪简直已是莫大的享受。那
时在风雪和风雨中,时时受到敌人
的合围,鞋在积雪和泥泞中脱落,光
着脚,背着沉重的负荷,几十里,几
百里……脚底板,全磨破,磨烂,一
步一个血脚印……就这样,突出重
重的包围圈,飞扬起一张捷报又一
张捷报……

人们背靠背，坐在货车上，入睡，作梦……

我梦见什么了？

我是五岁随父母乘着这津浦路的火车到的北平。读了十年书，又沿着这铁路线南下，回到上海。我参加了剧团，参加了地下党。十六岁，离上海，去皖北——现在货车正在浓浓的夜色中驰过皖北——参加了新四军……

隆隆的炮声……

隆隆的车轮声……

又回到了北平。

我们的文艺代表团住在东总布胡同 22 号（后来改为中国作家协会的所在地——包括《人民文学》编辑部）。这里过去是一家王府，很大，有好几个套院。

我们在一个大房间的地板上摊开了铺，拉起了窄窄的低低的蚊帐——帐顶几乎挨着鼻子尖。这是进南京后才发的军用蚊帐。钻进里面，闷热得难以透气，但总算有了个小小的安乐窝。

这时的梦也是安乐的，当然也有离奇古怪的悲欢离合——我小时候，在北平最后住的家，就离我现在睡的地铺，只有几百步路，在西总布胡同的东口，一个小小的四合院里。从 1943 年离别，到现在已有六年。啊！这生生死死，炮火连天的六年啊！我，我竟然会活着回来，穿着土布军装，在梦中将你寻觅，将过去的每个由小到大的脚印寻觅……

我们文工团在文代会上演出了《王克勤班》、《挖工事》、《两种作风》等快板剧、秧歌剧；还放映了幻灯片《血海深仇》——那时看幻灯，比现在看电视还觉新奇——我是这幻灯片的解说员，也可以叫配音。我每天在幕布后背诵得有声有色，声泪俱下。

除这以外，我没别的事，就是天天观摩别的文艺团体的演出。华北军区文工团的《不要杀他》；华北联大文工团的《红旗歌》，还有西北战

斗文工团的歌剧《刘胡兰》，还有……

看多了，后来就什么都不想看了。《刘胡兰》剧中用铡刀铡刘胡兰的大胡子连长，是严寄洲演的（后来，他成为我所在的创作室副主任；成为八一电影厂的著名异演）。我在南京也演过《刘胡兰》中的大胡子连长。我的自我感觉良好，总觉得演得要比他强得多。现在我只当个不露面的幕后解说，我有些怀才不遇。

我常常躺在憋闷憋闷的小蚊帐里，作我的白日梦，黑日梦……

神话，童话……

童年住过的那小小院落……

我钻出蚊帐后，常常走过那小小的院落。我探头探脑，不敢走进去，不敢走进那童年时背着书包，天天走出走进的院落。

我钻出蚊帐后，常常去偷看电影。

在西总布胡同西口的不远处，有家大华电影院，那是北平城的首轮电影院。我童年时常常溜进去观看——溜的方法是等电影演一半休息时，我随出来的观众一起进去看下半场——现在我又采用我童年的方法。因为我没钱，甚至比童年时更没钱。当时是不发军饷的。

电影院在演《西伯利亚交响曲》。我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得很入迷。觉得比当时文代会上所有的演出都要好看。和我一起观看的有我的忠诚好友徐怀中（谁会想到三十多年后，他竟当上总政治部文化部的部长呢！）那时，他睡在我边上的那个扁蚊帐里。我和他躺在蚊帐里擦着汗，不断神聊——他聊他们中原突围和挺进大别山的惊险事迹；我呢？谈沂蒙山，谈孟良崮……

现在，我和他坐在同一块银幕前，一幕又一幕……西伯利亚的大风雪，安德烈·娜达莎……拥抱接吻——那时苏联电影的演员就敢拥抱、接吻……

电影译制配音，是苏联人自己

配的。他们说的中国话，洋腔洋调，特好玩儿。徐怀中看完出来，就一路上学着那有趣的发音——他学谁象谁，唯妙唯肖。从此，他早晨一出蚊帐，就对我喊：

“啊！上尉同志！”

“哦！我的小鸟儿啊！”

也许因为我太悠闲？领导上决定派我到文代会的演出委员会里去工作——一个野战军派一个。

第一野战军派的是马吉星。他是位三八式的年轻老干部。他的口头禅是：“三八年那会儿……”（后来，他和我在一个创作室搞创作；后来，写出过名剧《豹子湾战斗》等）。

第二野战军派的是我。

我佩上了“演出委员会职员”的红飘带；有了这红飘带就能不用票出入所有演出的剧场、前台和后台。我不知我是变得身价百倍？还是变得身价一落千丈了？！是不是只有那些上不了台的人，才派到台下看管座位？！

有天，在西单的长安大戏院，梅兰芳演出。我的职守依然是看管座位。演出委员的主任委员刘开渠——我当时还不知道他是我国首屈一指的大雕塑家——他对我谆谆叮嘱：你看守住楼上前排的包厢座位。只有中央领导人，中央委员来了才能坐，别人一概都不能坐。记住，这任务极重要，要记住，做好！

天哪！我知道谁是个中央委员？！

没办法，谁来坐，我就查他的证件。

离开演还有一二十分钟，楼上楼下的散座都已坐满，唯独这楼上前排厢座还都空着。我坐在一角默默张望。

来了位女的，年轻、漂亮、落落大方，安闲自在。她稍稍迟疑一下，就在前排落座。

我走了过去，渐渐看清。我认识，她就是我最崇敬的女影星白杨。前不久，我才看了她主演的《八千里路

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但崇敬归崇敬，我知道她不是中央委员。不得不执行我的任务。我上前躬身说：

“对不起，这是委员坐的。”

“我就是委员呵！”

白杨拿出了文代会主席团委员的证件。我接过来看了看，立时还给了她：

“您这委员不行。这是留给党中央的中央委员坐的。”

“喔，喔——”

她的第二个“喔”拖的声音很长，仿佛是恍然大悟。她站了起来，离开了前排座位。

又一位气宇轩昂的中年人过来坐下，他似乎是理所当然地坐在当中。我不认识他，不太敢询问，又不得不询问：

“您是……？！”

他不抬头，不说话，只从口袋里拿出证件。也是文代会主席团的委员：黄镇。黄镇何许人也？我没读过他作品，也没看过他的戏（若干年后，他当上了外交部副部长；粉碎“四人帮”以后，又当上了文化部长。我这时才看到他的画册：他随红军长征时画的许多速写。不禁油然而崇敬）。那时，我对他抱歉地苦笑了一下：

“不行，您不能坐这儿。”

“为什么？”

“因为……”我对他说了刚才对白杨说过的理由。我不记得他当时是不是也对我苦笑了一下？他迅速起立。

又后来，一位颌下飘着白须的老人犹犹豫豫地坐了下来。他左顾右盼，似乎很不放心，似乎不知道该不该坐在这里。

我走了过去，轻声说：

“同志，这是留给中央委员坐的。”

“哦，哦……”

老人不知听清我的话没有，他仿佛做了件失礼的事，连连向我点

头致歉。他走到楼座的最后一排，站在最高处，扶着椅背，凝立不动。

即将开幕的预备铃拉响。

中央领导人入场，在警卫人员的护拥下，走到前排座位落坐。这当然无需我再上前询问，坐在前面的几位，都是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虽然过去都没见过面，但总不断见到他们的大照片——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

我既惊喜又惶惑地坐在他们身后——这回我倒怀疑我自己该不该坐在这里？！

前排侧面有位观众（当然也是位大人物，或许是武将），他大大咧咧，把双脚架在厢座前的矮围墙上。

毛泽东回过身对警卫人员说：

“请你过去告诉那位同志，请他注意安全，不要把脚放得太高。”

警卫员应声走去。

那位观众把脚收了下來。

毛泽东继续回过身，向还在向他热烈鼓掌的人们挥手致意；就在这挥手之间，他看到了停立在最后一排的那位老人——被我赶走的老人。

毛泽东向他大声招呼：

“董老，你过来，过来嘛！”

老人立时踏着一级级阶梯，向着毛泽东欣然走去；毛泽东扶他坐在旁边的座位上，并欢乐地和他谈笑。

我大为惊愕：呃，这位老人到底是何许人也？！——我问坐我身边的警卫。

“董必武。”

噢！我有眼不识泰山。后来，董必武当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时，我常常感到愧疚：那天我怎能那样冒失？但我又时时诧异：当时他为什么不加申辩？——

长安大戏院的大幕拉开……

梅兰芳出场，一亮相，满堂彩……

《贵妃醉酒》、《霸王别姬》……

我不懂京戏。小的时候，战争年代，都没看过京戏。梅兰芳唱得如醉如痴时，我已沉沉入睡，直到散场……

我又一次见到周恩来，是在怀仁堂听他的报告。他精辟地论述了解放区和国统区两支文艺大军的配合和贡献；他还展望了建国以后……（那时，新中国还没有宣告成立）。

在报告休息时，我拿着文代会发的纪念册，请济济一堂的文艺精英，给我签名留念。说实在的，所有的与会者我几乎都不认识，但我只知道个个都是大名人。那时，我凭着佩在胸前的红条仗胆——有这红条到处可通行，有如大会的记者一样——我走到两位正交谈的代表面前。

我递上纪念册，请签名。

“啊！我字写不好，老赵字好，请老赵先写。”

老赵取出钢笔签下：赵树理。

呃，我读过《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呃，赶情就是他。农民，质朴得完全象是晋西北农民。

另位，接过笔写下：欧阳山。

会场上人们有坐，有站，有走动。我不管不顾，逢人就递上本去……一个个名字，象一道道闪电，一声声霹雳：巴金、茅盾、曹禺、何其芳……

我的纪念册很快就一页页地签满。前面，还空白着几张。我又静坐下来，听周恩来的报告；报告结束后，我斗胆走向后台。

警卫人员把我挡驾。他们说：

“周副主席刚作完报告，很累，他需要休息。”

周恩来坐在离警卫人员几步远的地方。他炯炯有神地注视着我这穿土布军装，佩红条的士兵。他含笑向我招手：

“来吧！来吧！小鬼。”

我高兴极了，我大踏步走了过

去。我红着脸，谈不出话，双手捧上纪念册。

周恩来一页一页翻看，赞许地点头：

“嘿，这么多签名。”他立时拔出他胸前的钢笔：“是不是也要我签？”

“嗯。”我的活跃劲儿都没了，只是木呆呆，只是心在发颤。

“你叫什么名字？”

“顾菊楼。嗯，菊花的菊。”我的嗓音发堵，那“顾”字几乎没发出来。

“有姓菊的吗？”周恩来望着我，转动着手中的笔。

我用笔，在手心中写下我的名字。

周恩来笑了。用他的手帮助我擦掉我手心中汗湿的名字。他问：

“你在哪个部队？”

“第二野战军。现在住在南京。”

“南京？你进了南京，很好，这是很大的胜利！”他的手放在我的手上，一直没松开，“你喜欢南京吗？”

“喜欢！”我又红了红脸。

“我也喜欢，很喜欢。我在南京住过一个时期，那是一座美丽的美好的城市。现在只要把那些遗留下来的官僚垃圾一打扫，就会变得更加美好……”

我没想到，他竟握住我的手——一个小士兵的手长谈起来。直到警卫人员来请他上车，他才停住话语，在我的纪念册的首页，写下满满的一张：

顾菊楼同志：

祝你为开展部队的文艺工作而努力；要为兵服务，服务得更好。我们获得了胜利，前面还有更大的胜利。

周恩来

我接过纪念册。我眼中含着热泪。我颤动着嘴唇说：

“我们就要进军西南。”

“这我知道。”他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他怎会不知道。他更紧握住了一下我的手：“到西南后要给我写信，不，在进军的路上就要给

我写信。”

“一定写。”

“嗯，说好了一定，就是一定噢！”

他松开了我那更汗湿的手，和我一起走出怀仁堂。

我出了中南海的大门，独自沿着红墙，沿着长安街向东走去

……前面就是天安门。小时候上学，天天走过的天安门，

我怎能想到，几个月以后，将在这里举行开国大典，我怎能想到，十多年后毛泽东将身穿绿军装将在这里检阅如火如荼的红卫兵；我怎能想到……

南京：火车出轨

告别演出

锣鼓伴奏朗诵“社论”

开完第一次文代会，乘着火车从北京回南京。这回，不是敞篷货车，是有座位的客车。因路基太坏，火车走走停停，又是几天几夜。坐得实在太困倦。我和一位文工队队长（他的名字叫郑洪，多年后调到八一电影厂当电影编剧，后因写了电影《怒潮》，文革中被批为吹捧彭德怀，斗得死去活来……最后，深夜时，他跑到一株枯树下，把绳扣拴在树叉上，把绳圈套进自己的脖颈……）这时谈得很来劲。他和我同年，在新四军时是同班，又都只有十六岁，战争中的风风火火，俩人都是一起面迎，一起冲破的……说是同生死、共患难，那是真真实实，毫不夸张——现在新的同生死，共患难，又在火车上意外降临！



△在文代会主席台上的毛泽东和周扬（左二）、郭沫若（右二）、郭沫若（右一）

由于太困倦，我和他一起爬到车座上面的行李架上去睡觉。没有卧铺，权且就拿它当卧铺。这节车厢，是我们文工团包的。他是文工队队长，我是创作员，我俩不睡谁睡？

俩人头对头，迷糊了一会儿，就开始神聊。

聊什么？二十岁的大兵，怎能不谈论女人？满车厢坐有一半瞌睡着的女兵，不过都不太漂亮。最漂亮的是那些南京刚刚参军的女大学生；不过她们现在还都在南京。

“你这当队长的，看上了谁？”

“我，看花了眼……你哪？”

“你们队里，有个栗色头发的，总是站在女兵班的头一个。”

“唔，你说她呀！”

“她叫什么名字？”

“她叫……我想想……”

车厢一直在剧烈地摇晃、震荡。我和他牢牢抓住行李架上的横档。骤然，车厢象头野马似地狂跳起来；接着，车轮下，枕木下的碎石，竟在车窗外溅开来，有些砸碎了车窗，伴随碎裂玻璃一起飞进车厢……

满车厢的人都惊叫起来，都东倒西歪地栽到地板上。我和郑洪同时从行李架上翻滚下来，地板上倒着些人，我和他就摔在人堆上……

只听车厢外有人狂喊：

“火车出轨啦！火车出轨啦！”

这时火车已驶上一座大桥，车身仍在大桥上狂跳……倒在车厢里的人，已被颠簸得晕眩，只觉得死到临头，双手向着空中，向着四周围乱抓……

幸好，火车停了下来。

我和郑洪惊魂未定，跳下火车。

确实是火车出轨了！

我们乘坐的这节车厢，车轮都已经脱离轨道，歪歪扭扭地向左转和向右转。横拖着轮子，象钝斧一样折断了几百根枕木，使得铁轨都波浪形地拱动起来。

幸好，火车头没有出轨。

幸好，上了桥的前半部车厢没有出轨；出轨的是后半截。出轨原因，在惊慌的人群议论中才闹清，是由于这列车挂的车厢大小不一，猛刹车时，前后挤碰，把小车厢碰出轨外……

火车司机也吓得出了一头汗，他说：“这车要晚停三秒钟，所有的车厢，都要从桥上栽进大河！我们就全部报销！……”

所有的人，在路边又转了十几个小时铁路才抢修修复，火车继续向前蠕动……

我和郑洪那出了轨的思绪，出了轨的桃色梦，又开始重新浮泛……

回到南京，又要很快离开南京——这就是我向周恩来当面报告的一个“军事秘密”：我们第二野战军即将进军西南。

要举行告别演出。

在南京的“国民大会堂”——据说这里就是几年前蒋介石为召开伪国大而兴建的。非常瑰丽，冠冕堂皇。

我们文工团在台上站成几排，表演大合唱。唱词和当中穿插的朗诵词，是第二野战军新华社社长海陵写的，他当时在部队也算得是位显赫的诗人。

不过，这朗诵词写得实在太概念，太枯燥，为了增添表演的轻松，

活泼，文工团的领导就确定让两位姣美的女团员，打着快板作为对口词来念，并指定我去作指导。

我走到后台。

啊！两位姣美的女团员，其中的一位就是那个栗色的发辮。顿时，我这“艺术指导”，真不知该怎么来作指导。这两位姣娃都是中央大学的学府弟子，从未打过这过去不登大雅之堂的快板，越打节奏越乱；但演出在即，大幕即将拉开。

栗色的发辮和另一个姣娃，急得直掉眼泪。没办法，领导只好临时确定让我上台。我惶惶地昂立在大歌队的前面，捧着朗诵词，面对大会堂的黑压压的听众，提起精神，慷慨激昂——台后的乐队，临时给我配上锣鼓……

解放军大军（锣鼓声：咚咚）

横渡长江（锣鼓声：锵锵）

大江南北（锣鼓声：啞啞）

红旗飞扬（锣鼓声：当当）

乘胜追击（锣鼓声……）

朗诵词实在太长、太长，比社论还社论……观众开始瞌睡，站在我背后的歌队，也渐渐被催眠……

我有些声嘶力竭，好不容易才朗诵完毕。接着，乐声起，歌声起……

第二天，领导叫我去新华社，找社长海陵，请他把朗诵词砍掉一多半，把几百句压缩成几十句。我不敢去，可又不敢不去。我壮着胆子，推开了新华分社的门。

海陵正伏案审稿，改稿。

我嗫嚅着说明来意：“请您把这朗诵词改改，砍掉些，砍掉一多半。太长，实在太长……”

海陵放下红笔，抬起头，听完我的话，勃然大怒：“啊！砍，怎么砍？这每句话，都是有重大意义的。”他指着我放在桌上的朗诵词：“你说，哪段能砍？哪行能砍？哪个字能砍？你给我指出来，指出来！”他又加重语气怒喝：“你给我指出来！”

我吓得发蒙，呆若木鸡。

“你是怎么朗诵的？”

“我……我朗诵的时候，配上锣鼓。”

这位社长一听，更是怒得火上拨油：

“啊！配锣鼓？！诗，是很优美的东西嘛！怎么能配锣鼓？！你回去对你们的领导说：要配小提琴，小——提——琴！”

我不知该如何答对，就疾疾退出。

当晚演出，领导决定取消了全部朗诵。

当然，我也不需再登台。

每晚演出，我坐在台下第一排，作一名忠实的观众；但我的眼睛，只惶惑地迷乱地注视着那站在歌队第一排的栗色的发辮。她那细细的腰带，她那精神精神的绿绑腿，她那……

有天，演出演到一半，会场出现了轰动。

观众不由自主地纷纷起立——通向舞台的过道中出现了苏联作家代表团。他们从莫斯科来，他们是第一次访华……

他们都站到台上——站到歌队前面，挥动花束，向狂欢狂鼓掌的观众举手致意。

翻译在明亮的光束下向全场介绍：

法捷耶夫——（顿时，我流下热泪，在当年打完孟良崮战役后，我读过他的《毁灭》和《青年近卫军》……）

西蒙诺夫——（我的热泪更涌流。我从上海到解放区，在新四军文工团演的第一出戏，就是他写的《俄罗斯人》。淮海战役前后，又读了他的长篇《日日夜夜》……）

他俩是苏联作家代表团的正副团长。他们从台上走下来，在前排落座，正好坐近我身旁。我又满怀激情地拿出了我的签名簿——这上面有周恩来的，有许许多多中国作家的……我爱若珍宝，视若生命——我

又捧到我无限崇敬的苏联作家面前。

金发的法捷耶夫愉快地签下了名；

洒脱的西蒙诺夫微笑着签下了名……

啊！我收藏起这纪念册，象收藏起一颗永远滚动着的星球……

我把它收藏在军装的内衣里；
我把它放进将继续进军的背包里……

我走出挹江门……

我又随着百万大军挥师西进……

浩瀚的长江……
浩瀚的人生……

重庆：绑腿带 歌乐山 “爱神”和她的巨著

已是1949岁尾，二野文工团乘坐的一艘江轮，在重庆朝天门码头靠岸。我抬头望去，只见天梯般的石台阶，向云雾深处伸展；屋脊和窗口，也在云雾缭绕中时隐时现，神奇莫测……

啊！雾重庆！

我想起四年前的初春，在上海——那时没有一点春天的感觉，黄浦江上浮动的灰暗的雾，日本宪兵戴着刺刀，戴着钢盔，站立在外白渡桥的桥头。每个行人走过都要脱帽，不然刺刀就要把你的帽子挑落……

我悲忿，我忍无可忍。我走到新闸路，对我参加的《晓钟剧团》的导演蒋文焕说：

“我要走，要离开这可耻的大上海。”

“你去哪儿？”

“去重庆。”

“怎么去？”

“拼死拼活，通过重重封锁线。”

“你有拼死拼活的精神，去那么远干什么？你不就是想打日本吗？”

“对！想！”

“那你可以去苏北，那里有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就在打日本；重庆，是打不到日本人的。”

于是，我改变了生命的航向，历史的航程。我拿着党的也就是蒋文焕写的介绍信，投向新四军。蒋文焕是老地下党党员，上海解放后，担任了上海市青年团书记。新四军军部文工团，演出的戏中有个话剧就是，《雾重庆》。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来看排演时，还亲自作了导演，他不但导演戏，更“导演”了胜利的胜利……

胜利使我来到雾重庆！

从朝天门，走向雨路口，走向上清寺……重庆，在寒冷中颤栗。

雾中，有个小小的女兵掉队了。我走在队伍最后，我停住脚步。呢，栗色的短短的发辫！

不管雾中的重庆怎样，我却在寒冷中发热了，我站住脚步，哑哑地问：

“怎么啦？”

“绑腿打太紧了，勒得小腿疼。”

栗色的小发辫盖在军帽下，一瘸一拐地艰难地走着，她疼得额上、好看的鼻尖上，都渗出了汗珠。我在行军路上，长江的江轮上，给她讲过许多福尔摩斯、亚森罗苹的故事（四十年后，我也大写起侦破小说来，出版了一本《顾工侦破小说选》，某大报竟评为《神话般的涉险与诗意》）。她那栗色、墨蓝色、黑晶晶、富有色彩变幻的眼睛里，流露出天真。真有意思，这南京中央大学农业经济系

的高材生，昨天她还在幻想农业救国呢，今天却在重庆滑梯状的马路中步履艰难。我以老兵的资格对她说——虽然声音稚嫩而发抖：

“你把绑带解下来，我教你重新打一下。你先把脚尖翘起来，把小腿肚绷起来……”

她按照我的指导，重新打了绑腿，再走时，果然脚步轻快了，很快追上了队伍。

我望着她的后影；从此，一生都在望着她的后影……

二野文工团在上清寺的求精中学里安营扎寨。学校已放寒假，课桌拼凑起来，就是我们的卧铺，这比战争岁月中睡门板、稻草和垫壕，要美气得多。

第二天，团部通知我：随几个新华社记者去歌乐山中美合作所旧址参观采访。

到了山上，顿时觉得更为寒冷，更为阴森恐怖。一位戴着白边眼镜的新入伍的大学生，成为我们的向导，领我们看了“白公馆”、“渣滓洞”，还有小萝卜头和他爸爸、妈妈被枪杀的地方，杨虎城倒下的那扇门后，江雪琴殉难的那排焚烧过的铁栏和木柱……

晚上回来，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心情激荡，思潮起伏，脑子里在构画着一幕幕很悲壮，撼天地，泣鬼神的戏。戏名叫：《死难者》，或者叫：《安息吧，难友》……对，我为什么不用这个名字写首诗呢？



胡玲在农村

我坐起来,写起诗来。一气呵成,默读了一遍又一遍……一个小小的女兵推门进来。她满脸雀斑,牙齿发黄还外露。她并不难看。我不遗憾地想:野政文工团招这样个“丑小鸭”干什么?她能演《白毛女》,还是能演《刘胡兰》?是从淮海战场的雪地里拣来的吧?……

这不太招人喜欢的女孩,却说了句特别招我喜欢,甚至是惊颤我心弦的话:

“她要你去。”

“谁?”

“你还会不知道吗?就是你老给她讲故事的那个。”“丑小鸭”眨动着她那有雀斑的眼皮。

“干吗?”我故作矜持。

“当然,还是讲故事呀!”

军令如山倒,爱神就是最高统帅。我扔下诗,遵命前往。

女同志住的大教室,灯光和我睡的房间同样地暗。暗淡中我看到横七竖八的许许多多张桌子摆成的许许多多张床。床上床下有的在看书,有的在写什么,有的在钉纽扣……她们都不约而同地抬眼注视着,我这半夜来客;我好象从来没被这么多女性的目光扫射过。我窘迫得四肢发僵。

“雀斑”把我领到我心中的女神面前。腊黄的灯光照得她那栗色的发辫变得棕黑,脸在朦胧中更有种

朦胧的美。她见我果真来了,特高兴。她坐正身子,用手挪动了一下放在她铺边的另张课桌:

“你坐吧!”

课桌很高,我坐得很高,在这“女儿国”里,我异样地浑身不自在;却又用似乎很自在的声音问:

“有事吗?”

“讲故事。”她纯真得象个幼儿园的小贝贝:“我睡不着,特想听。”

我自从在南京一间放布景报的大空房间里,和她蓦然相遇后,就每天都想再看到她,能多看她一眼。现在,讲故事,讲什么?还是福尔摩斯吗?不,我要讲我白天看到的歌乐山、白公馆、渣滓洞,许许多多烈士的遇难。他们死在已经听到自己军队的脚步声和枪炮声的时候,被敌人的子弹一排排射进胸膛……

我沉浸在悲壮中讲着讲着,爱和恨在我面前交炽成一个个火球,滚动着、跳荡着……室内,许多女孩子都入睡了。我把我的声音压得更低更低。我梦幻中的爱神,听得流出滚滚热泪……

第二天清晨。我刚睁开惺忪的眼。呃,是梦还没有离去,还是梦又飘来?!她,正站在我的床前,脸红得象是窗外的太阳——重庆难得有这样好的太阳。她激动地激情地把几张小纸放我枕边:

“你看吧!我想把你讲的‘歌乐

山’写成个剧,这是提纲——我一夜没睡……”

她放下提纲后,就走了。

哦,这是个怎样的提纲呵!竟然有八幕,每幕中又有五、六场……是部多么恢宏、磅礴的巨型悲剧!我从来没看到过她写的字,现在跳入我眼帘的字,都象是举着爱的弓箭飞翔的丘比特;每个字都太秀丽,太壮美了。我几乎想吻遍每一撇,每一捺,每一个标点和符号……

后来,这磅礴的剧本没能写成,不过这一生中我还是和她合写了十多部剧本,差不多都演出了、发表了、播映了……人生,是条多么漫长的长河,她不应该是戏剧;但戏剧确实确实应该是人生呵!

1949——那年我二十岁;

1959、1969、1979、1989……呃,我们一直在写,还将一起写到二十一世纪……

作者简介 顾工,原名顾荫楼,1928年11月出生于上海,后就读于北平。1945年7月参加新四军并从事文艺创作。全国解放后曾任八一电影制片厂编剧、解放军报社编辑、记者和总后勤部专业作家。曾出版诗、小说、散文专集30余种,上演、播映和发表舞台、影视剧本10多部。

(责任编辑 卢弘)

首届《爱我中华》“马钢杯”改革之春纪实作品大奖赛征文启事

有胆有识、雄心勃勃的马鞍山钢铁公司的企业家们,深知提高企业文化素质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力,于是便有《爱我中华》“马钢杯”改革之春纪实作品大奖赛的举措。

一、以反映中国改革开放为总主题的报告文学、散文、诗歌及“写马钢”的作品均在征稿之列,每件参赛作品,报告文学限1万字内,散文限3000字内,诗限80行内。须是首发之作,不得一稿多投。报告文学需经有关部门审核后签章。未用作品退作者。二、大奖赛揭榜日期定在1994年夏季,1994年6月1日截稿(以邮戳日期为准)。获奖作品由《爱我中华》杂志编辑出版;举行隆重的发奖仪式。三、大奖赛设:一等奖3名(报告文学、散文、诗各1名),奖金各1000元;二等奖6名(报告文学、散文、诗各2名),奖金各500元;三等奖20名,奖金各200元;优秀作品奖根据实际情况设立。所有获奖作品由《爱我中华》编辑出版,

稿酬照付。发给作者获奖证书。

四、每篇参赛作品交评审费:报告文学每篇15元,散文、诗歌每篇(首)20元。参赛作品务请注明“马钢杯”改革之春参赛作品字样,以免延误。邮局汇款寄: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209号《爱我中华》杂志社赵家海、查淑媛收。邮政编码:230022。未收到评审费的稿件一委不予评选。

为及时了解大奖赛情况,请您不要忘记订一份《爱我中华》!

欢迎惠赐佳作!

祝您中奖!

“马钢杯”纪实作品在赛组委会

《爱我中华》杂志社

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1949年2月11日夜，国民党理论权威——戴季陶，出人意外地服下过量的安眠药撒手西去。他的死，震惊了国民党朝野上下，一度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说他是眼见国民党大势已去，对前途绝望至极而服毒自杀；也有人说他为了表示忠于党国，不愿离开故土而自尽；还有人说他是误吞安眠药过量致死……众说不一，褒贬不一。他的死，给人们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

追随孙中山“同进同退” 一度陷入困惑和苦闷

广垠浩淼的太湖伸出一支角，清澈碧澄的富春江绕了一道弯，平地隆起一座城市，犹如镶嵌在吴越大地上的一颗珍珠，它有个美丽的名字，叫做吴兴（今湖州）。

不知是山水的哺育还是沿海开放风气的熏陶，吴兴人不迷恋富饶的土地，不陶醉秀丽的山光水色，喜欢外出做生意。有户戴姓人家，外出经商一直闯荡到四川，贪财忘返，竟在远不如吴兴富庶的广汉定居下来，繁衍子孙。戴姓后人中出了个戴小轩，他对经商兴趣不大，专心从医成了一方名医，闲暇铺纸挥毫，泼墨涂丹，倒也自得其乐。清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891年1月6日），戴小轩喜添贵子，取名良弼，字选堂，不求其成龙，只望其成为贤相良辅。

小良弼6岁入私塾读书，他天资聪颖，功课很好。他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开始崇拜圣贤，给自己取了个响亮的名字——戴传贤。他改名成癖，反满革命时自号戴天仇，以示与清廷有不共戴天之仇。经商做生意时又取季陶，以示效法生意人的鼻祖。晚年思想上皈依佛教，取

国民党理论家 戴季陶的 扭曲人生

○李占才

教名不空、不动，后人则多称他戴季陶。

戴季陶1902年入成都东预备学校学习，遇到恩师徐炯。徐炯常向学生灌输反满思想。年仅12岁的戴季陶，在幼小心灵里，埋下了反满的种子。

1905年秋，不满15岁的戴季陶汇入游洋大潮，东渡日本留学。他先入师范学校学习，希望学成归国，做一名象恩师徐炯那样的传道、解惑、授业的教师，为开启民智尽一份力。1907年秋，他改变初衷，入东京日本大学法科学习。他认为中国是个没有法制的国家，学法才是急中国之所需，梦想将来做一名出色的法官或者律师。读书期间，他一展鼓动和组织才干，联络、发起建立了日本大学中国留学生同学会，被推举为会长。他经常激励会友承担起救国救民的重任，做中国的华盛顿、拿破仑。年少的戴季陶朝气蓬勃，狂荡豪放，深受同学会员们的拥戴。

1909年夏，不到19岁的戴季陶学成归国到了上海。怀着报效祖国一腔热忱的戴季陶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位置，离沪到了苏州，被江苏巡抚瑞澂任命为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主任教官。这职位对于自以为怀有远大抱负的戴季陶来说，只能是有了一席存身之所。

不料，半年后瑞澂升任湖广总督，戴季陶失去了“知遇后台”，不得不又回到上海。

戴季陶放弃了当律师做法官的梦想，投身于新闻事业。1910年春，他升任《天铎报》总编辑，兼为《民呼报》撰写评论。他用笔名“天仇”，以犀利笔锋，激烈言辞，清新文思，撰写批评时政的文章，抨击清政府的腐败，1911年春被清廷地方政府通缉，在友人帮助下，仓猝逃亡日本。旋即又转赴南洋槟榔屿，任《光华报》编辑，继续鼓吹革命，并加入中国同盟会，决心做一名反满斗士。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戴季

陶回到上海,参与创办《民权报》。这年底,孙中山从海外归来,戴季陶以同盟会记者会员的身份拜见这位仰慕已久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对这位思路敏捷、善于辞辩的年轻记者给予勉励。戴大为感动,知遇之恩,油然而升。孙中山前往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命戴季陶同行。1912年3月孙中山解职由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戴极为不满,曾在《民权报》上著文揭露袁世凯的专制野心。6月唐绍仪内阁辞职时,他在《民权报》上发文指出:“袁世凯之帝制自为,其迹已昭昭在人耳目”。但是,当孙中山接受袁世凯的任命为全国铁路督办打算与袁携手合作时,他又接受孙中山邀请担任其秘书,并随孙赴日本考察。他在理性上对袁世凯伺机称帝的认识清醒于孙中山,情感上又别无选择地忠于孙中山,行动上则显露出就情感抑理性的端倪。

1913年“宋案”发生后,孙中山主张讨伐袁世凯,戴季陶立即归国,在上海、南京间进行反袁军事联络。“二次革命”失败后,戴季陶随孙中山流亡日本,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兼翻译。1914年春,戴季陶参与创办《民国杂志》,撰文声讨袁世凯。并宣誓加入了孙中山组建的中华革命党。1916年4月底,戴季陶随孙中山回到上海。翌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戴季陶被任命为法制委员会委员长。1918年2月,他兼任大元帅府秘书长。不久,南方军阀排斥孙中山,改组军政府,护法运动归于失败。戴季陶又随孙中山回到上海。

自辛亥革命以来,戴季陶追随孙中山“同进同退”,“同革命同流亡”。随着护法运动失败,中国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戴季陶这个“革命斗士”和民主革命的主帅孙中山一样,陷入困惑和苦闷之中,政治热情大大降低,自称感觉很疲惫很劳累,想休息。

休息。他把家迁回祖籍吴兴,与富得流油的张静江等交往甚密,萌动了做生意赚大钱的想法。

曾顺社会潮流而 下却不能与潮流同 步同行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汹涌澎湃的社会大潮激荡着古老的中国大地,社会舞台一下子扩展开来,各色人物纷纷试图在这大舞台上表演一番。戴季陶当然不甘落伍,试图引导社会大潮按照自己的意向流动,却又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潮流的冲刷涤荡,自觉不自觉地顺潮而下,为潮流的奔越向前推波助澜,但最终却又未能与潮流同步前进。

戴季陶没有直接参加群众“直接行动”式的政治斗争,但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对戴季陶震动很大。他认为中国民众尤其工人,智识太低,一旦盲目行动起来,那简直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必然酿成内乱,引来外患,中华民国的国运也就没得指望了。“有智识有学问的人”必须“用温和的社会思想来指导社会上的多数人”,才能避免“惨祸”的发生。因此,他试图通过舆论导向,引导工人运动走上改良主义道路。本着这一宗旨,和沈玄庐、孙棣三创办了《星期评论》。

戴季陶在《星期评论》和中华革命党机关刊物《建设》上,编发了一些反映工人生活状况的报导文章,对劳工的“悲惨境遇”表示了极大同情。他明确指出:世界上再也没有象中国工人“这样苦命”的了。他们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劳动态度好,但工资最低,生活条件差,生活社会最底层。他本着民生主义精神,为求减少社会动荡,应当改善工人生活状况。他反对工人自发的无组织无目的的斗争,主张建立工会组织,领导工人进行改善待遇的经

济斗争,且不可带“政治色彩”,采取“过激”手段。他极力提倡“阶级互让”精神,呼吁资本家对工人做些让步,主动改善工人待遇。工人对资本家也“多少退让一点”,万不可滥用自己的势力。工会要加强“与雇主阶级的调和”。他认为,双方克制互让,中国就可以“免除激切的社会革命危险”。

五四运动爆发后,戴季陶的主要精力用在舆论宣传上。他主持的《星期评论》每期都有他几篇文章,有时达到一半以上篇幅。《建设》杂志几乎每期都载有他的文章,《新青年》也时有他的文章发表。他写得很勤,还经常到处演讲。但是他所鼓吹的思想不合时宜,不为广大工人和学生所接受。当时,他追求的仍然是以美国为榜样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尤其反对传播到“无知识”的工人中去。但他不主张压制工人运动,认为愈压则会愈激。主张从民生主义精神出发,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贫富悬殊引起劳工运动的社会问题中汲取教训,“治者阶级”和资本家对工人让步,以便使中国社会“平和的”发展。可惜,戴季陶想做中国社会潮流的引导者,却不被社会各阶层接受,成了一个游离在社会潮流之外、倍受冷落的人。

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中国未在对德和约上签字。美国议会也不接受“和约”,一些议员提出“和约修正案”,要求将和约中规定的德国在中国山东享有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改为归还中国。中国知识界普遍希望通过美国干预,山东能够归还中国。戴季陶就是其中之一,写了一些颂扬美国议会的文章。1919年10月16日,美国参议院表决和约修正案,结果55票反对、35票赞成,修正案被否决。戴季陶在19日《星期评论》上发表文章斥责美国议会,他们标榜的议会民主制实际上仍然是专制。他号召国人不要再走他们的

老路,要走中国自己的路。这是戴季陶思想认识飞跃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爱国主义旗帜下,他开始探索新的救国道路。

随着新生苏俄的稳固,戴季陶开始注意研究俄国革命成功的“秘诀”。苏俄对华“放弃侵略”政策的消息传入中国之后,更引起他的欢迎和好感。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尤其是经济学说。中国的工人学生运动持续发展,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显示出巨大力量,都促使戴季陶的政治态度发生明显变化。

1920年4月,苏俄第二次对华声明发表以后,戴季陶的政治态度有了更加显著变化。他公开赞同苏俄“建国主义的根本信条”,信奉“马克思经济学为骨干的科学社会主义”。他转译日文版考茨基著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建设》杂志上连载。他还翻译介绍马克思、介绍苏俄新政策的文章。他曾批判“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表示赞成“马克思的纯正的科学社会主义”。他在关于社会思潮、国家变革、妇女解放、劳动运动等许多方面的文章中,使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分析问题,这对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这期间戴季陶的思想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公开表明,研究劳工问题是为了“唤起中国平民之世界的阶级的觉悟”,“完成社会的文化和消除社会的阶级为目的”。他指出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只有制造工具和应用工具制造的物品的两只手,和潜伏在身体里面的一个‘劳动力’”,是无产阶级。他称自己也是“无产阶级里的人”。资本主义生产制造出“两个苦乐不平的阶级”,一个是占有生产资料、并靠此剥削他人的有产阶级;一个是失去一切生产资料专靠出卖劳动力生活的无产阶级。“前者是财产的掠夺者,后者是财产的被掠夺者。”他

还指出:工人运动的目的,已不单单是要求改善生活状况的经济斗争,而是要最终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制,建立工人阶级自己劳动,自己管理,自己享用,“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他放弃了改良主张,鼓吹阶级斗争。他对早些时候自己提出的“阶级互让”作自我批评道:“互助的基础是要站在平等上面的,两个绝对不平等的阶级,要他们讲互助,这是一个笑话”。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地位,靠工人的阶级奋斗得来的,“想靠资本家和由资本家培养出的政府来保护劳动者,恐怕是一辈子作不到的呢!”他呼吁工人运动要采取“直接行动”的手段,打破“官僚武人政客绅士的专政”,“打破阶级支配阶级压迫的现代式的政治”,以使中国社会改造“根本解决”。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率先明确提出了知识分子应当到工人群众中去。他在《新青年》的一篇文章中,号召知识青年“投向资本家生产制下的工场,那里有许多的苦人,许多的苦事,要研究也得到那里去找材料;要奋斗也要在那里去找朋友;要训练也要在那里才有战斗员;要试验也要那里才是大大的试验所。”

不难看出,戴季陶已经是一位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主持的《星期评论》办在上海外国租界,政府当局恨得咬牙切齿却又无法封禁。当《每周评论》、《湘江评论》相继被查封之后,有影响的“三大评论”只剩下《星期评论》了。《星》又以研究劳工问题、宣传劳工运动为主要内容,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了积极推动作用。戴季陶也因宣传工人运动甚力而深受工人及工人运动领导者们的欢迎。1920年夏季前后,戴季陶与陈独秀、李达等人接触频繁,积极参加了“上海共产党”的筹建工作。戴季陶为自己的历史涂抹了最光彩的一笔。

应当看到,戴季陶此时具有“双

重人格”。正如他自己声称:从学理上承认阶级斗争,赞赏马克思主义;但情感上又总不希望斗争,总希望平和的互助。明明知道这个希望会落空,也免不了去希望它。这种双重人格性,是他的致命弱点,也是他最终未能成为共产主义战士的思想根源。

为蒋家王朝建立 呼号鼓吹 最后落得 个死因不明

1920年夏,戴季陶一面宣传马克思主义,鼓吹工人运动,一面参与筹建上海共产党组织。孙中山召见戴季陶,尽管谈话温和委婉,但戴季陶何等精明,立即明白了孙中山的意思:其一,共产主义合理的东西已包含在三民主义之中,如社会主义即民生主义也;其二,三民主义更合乎中国国情;其三,如果信奉三民主义的话,没有必要再去参加信奉共产主义的共产党。戴季陶一直把孙中山当作中国革命的导师,对其非常敬仰。知遇之恩、以死相报的观念在戴季陶思想深处也根深蒂固。一旦孙中山打了招呼,他马上停止了与陈独秀等人的接触,不再参加筹建共产党的活动。尽管他理性上的认识有了飞跃,比较清醒,但情感上仍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上,行动上不愿意超越孙中山,把超越视为背叛,羞于为之。他的抉择,不能说内心深处没矛盾。1920年6月初,《星期评论》受当局压制被迫停刊,他觉得“疲劳到极点”,搬到湖州,表示要“休息休息”,以致萌生了富春江上垂钓的念头。“休息”了一个多月,在友人一再催请下,他才回到上海,但仍很消沉,偶尔在《建设》上发表文章。年底,《建设》也被迫停刊,他索性挂起笔来,封住嘴巴(不再演讲),与张静江、蒋介石、陈果夫等人合股设立“恒泰号”证券物品交

易所，“盈余”甚丰，资助陈炯明的粤军回粤讨桂战争。到1921年，投机生意失败，戴季陶退出交易所，生意也懒得做了。失去精神支柱，他花天酒地，开始沉沦。

1922年，陈炯明背叛孙中山，孙中山回到上海图谋恢复广东。10月，派戴季陶回出生地做川军联络工作。他乘船溯江而上，指望到四川后能做出一番成绩来。当船过枝城直驶宜昌时，他遇到一位朋友，告诉他川军各派系矛盾重重，都在积极备战，内战一触即发。他听到这一消息，知道联络川军工作已无从下手。是夜，当船乘风破浪继续上行的时候，站在甲板上的戴季陶思绪万千，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程，想到追随孙中山革命所面临的绝境，觉得“公私的前途，都无半点光明”。他越想越觉伤感，竟致凄然泪下。他心灰意冷，万念俱焚，实在没有勇气活在这混沌的世间再作冲刺搏斗了。他对天长叹一声，跃身投入江中，想“一了百了”。不知是“气数未尽”还是“劫数未到”，他被渔夫救起。欲死不成，这是“天意”！他一下子顿悟，觉得眼前豁然开朗。他在四川年余，一门心思研究起佛教经典来，爬峨嵋，游乐山，心灵开始与佛结缘了。

1923年12月，戴季陶回到上海。当初劝阻戴参与创建共产党的孙中山，反思了自陈炯明背叛后他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陷入绝境，比较了帝国主义列强和苏俄的对华政策及其对待他孙中山的态度，明智地选择了“以俄为师”，决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政策，与共产党合作，改组国民党，以便重新开展一场崭新的革命。这时候的戴季陶对孙中山的决策有所疑虑，他了解一些共产党创始人“后生可畏”，若让他们加入到国民党中来，弄不好鹊巢鸠占，孙中山等人辛辛苦苦组建的国民党，会为共产党人取而代之。为他人做嫁衣裳，岂不憾哉。他给积极协助孙中山致力于

改组国民党的廖仲恺写信说：“叫共产党参加进来，只能把他们当做酱油或醋，不能把他们做为正菜的。”这正流露出他的上述思绪和担忧。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标志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会议选举戴季陶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委、宣传部长，不久又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大本营法制委员会委员长。但是，他目睹协助孙中山和在国民党中央各机关工作的共产党人的办事能力、精力、效率都远超过“国民党中之老朽”。孙中山对这些人持赞赏态度，而戴却认为孙中山大有被共产党人包围之势，说不定会成为“准共产党”。他滋生了一种失落感，与改组后的国民党勃勃生气很不协调，曾多次离粤返沪。他私下里与蒋介石交谈，曾流露过自己的忧虑。戴季陶与蒋介石是老相识，老同乡，同在日本留学，同在上海做投机生意，二人私交深厚，蒋介石劝他要忍得住寂寞，耐心等待，谁主沉浮，要看天意，要看机遇。他明白了蒋介石的心志，看到“新的希望”。

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临终前签署遗嘱，戴季陶正在病榻前，他是遗嘱见证人之一。孙中山逝世，国民党内形势复杂化了，老右派分裂出去的迹象已很明显，以蒋介石为首的一直以左派自居的新右派，加紧争夺领导权的活动。戴季陶意识到机遇天赐矣。他以国民党元老、继承孙中山思想的理论家自居，到处大讲“孙文主义”。六、七月间，他出版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比较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形成国民党新右派的理论武器——“戴季陶主义”。其核心是扩展孙中山思想中的消极方面，歪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把孙中山说成是继承孔子的儒学道德家，把三民主义说成是继孔子之后二千年来“中绝的中国道德文化的复活。”宣

称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强调团体的“排拒性与独占性”，主张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戴季陶主义”一出笼，就受到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批判和谴责，戴自己也觉得受到“很大的攻击”。

在这样的处境下，戴季陶索性加紧和国民党老右派的联系。1925年11月，国民党老右派邹鲁、谢持等齐集北京，准备召开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即西山会议）。戴季陶、沈玄庐等也打算参加会议来到北京，遭到一些老右派的坚决反对，认为戴、沈等参加过共产党的筹建活动，是国民党的叛徒，把他们痛打一顿，戴季陶无可奈何地返回上海。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开除西山会议派的党籍，并责令戴季陶“反省”，处罚他三年内不得再发表文章。由于蒋介石等人的庇护，戴仍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不久戴又负责改组广东大学（后改名为中山大学）的工作。1927年2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前夕，戴季陶受蒋委托到日本活动，寻求支持。3月底归国，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献计献策。他把蒋视为密友，为“蒋家王朝”的建立呼号鼓吹，竭尽其力。1928年，戴季陶任考试院院长直到1948年，长达20年之久。开初，他热情挺高，制订考试法规，试图通过考试选拔政府各级官员。但他很快发现，国民党的吏制腐败，任人唯亲。较高职位的谋取，主要是通过私人关系，考试院只不过是装璜门面的虚设机构。戴季陶的热情顿时冷却下来。他也明白，尽管蒋介石是他的老友，尽管他为蒋介石“打天下”立过汗马功劳，但夺得天下的蒋介石不会与他分享天下，只不过被当作“元老”点缀统治，粉饰民主而已。他出于对蒋介石情感上的亲近，也就乐于充当这种角色，力所能及地做些粉饰太平、粉饰民主和阐释蒋

（下转 63 页）



1959： 胡志明 秘密登庐山

○王凡 晓流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还有一桩秘闻，至今未曾披露，这就是毛泽东在会议期间，会见了秘密上山的越南劳动党领袖、国家主席胡志明。

东谷346号的神秘来客

1959年6月末，毛泽东登上庐山，住进牯岭以宋美龄名字命名的别墅——美庐。

7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召开。毛泽东的初衷是，在充分肯定1958年大跃进的前提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纠正“左”的倾向，以便继续跃进。

部分与会者对大跃进以来暴露的许多问题深感忧虑，要求深入纠“左”。

7月14日，国防部长彭德怀致信毛泽东，强调大跃进问题的严重性，遂促使毛泽东的态度出现转变。他认为：会已开了半个月，总喋喋不休地缠着问题缺点不放，只能令人泄气，今后的事业还怎么办。天天说缺点、坏事，“不要说一

年，就是一个星期，（社会主义的国家）那也是要灭亡的。”更何况还有康生的煽风，“再这样下去，人都要被彭德怀同志拉光了！”

在7月2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措词激烈地指出党内有些人已经到了右派的边缘，对彭德怀提出的不同意见，逐条加以批驳。庐山的气氛骤然紧张。恰似云雾缭绕中的庐山，一时又看不清真面目了。

正在此时，一位神秘的贵宾，悄然上山，住进与庐山大厦遥遥相对的东谷346号别墅。

这就是越南党和国家主席胡志明，他此次是在苏联休假后返回越南，途经中国做短期逗留。他到北京后转乘“伊尔—14”，直飞江西九江十里铺机场。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庐山交际处的程先喜等，专程赴九江迎接。这一天是7月26日。

胡志明下榻的东谷346号别墅，是一栋北欧风格的小楼，依山而筑，势高凌空，视野开阔，环境雅致。站在宽敞的别墅阳台上，放眼是苍翠欲滴的山谷，聆听有潺潺流淌的回龙河溪水。

“美庐”排座次

27日上午,胡志明前往美庐拜会毛泽东。10点时分,当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四位中央领导的身影,刚出现在美庐的平台之际,胡志明乘坐的“吉姆”牌轿车,恰好驶入美庐院落。

胡志明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早在20年代的大革命时期就已相识。那时,胡志明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直接参与了中国人民争取民主和解放的斗争。1942年夏,胡志明在中国境内遭国民党当局逮捕,经周恩来奔走营救才脱离囹圄。因此,胡志明一到,毛泽东面露喜悦,走下台阶,同客人拥抱致意。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也依次与胡志明握手拥抱。随后,四位共和国的领袖,同越南人民的领袖,在美庐会谈了一个多小时。所谈内容,至今未曾披露。

然而有一点是不难推测的,即胡志明刚刚从苏联来,或许会将苏共中央的一些意向转告中共领导人。当时的中苏关系已经出现裂痕,1958年秋,毛泽东当着赫鲁晓夫的面拒绝了他在中国内地建长波电台、拥有一个潜艇基地的要求,双方不欢而散。毛泽东希望出现大跃进的局面,对赫鲁晓夫全面巩固的提法,很不以为然,而赫鲁晓夫则认为毛泽东的构想,“任意破坏或越过了合乎规律的历史进程”。

倘若真实的情况如此,这次的会面就非同寻常了,因为来自苏联的意见,很可能启发毛泽东的一系列联想,把庐山会议上发生的事,置于更广阔背景下加以考虑。

会谈之后,毛泽东邀请胡志明在美庐进午餐。入席的时候,中、越的领袖们兴致盎然,按年龄的大小,排列了座次。结果朱德被推为老大,胡志明老二,毛泽东老三,周恩来老四,刘少奇成了小老弟,坐在最下方。

这是一顿名副其实的“便饭”,没有山珍海味,只上了几道江西地方的特色菜。酒倒是好酒——茅台,但每人只喝了一杯。席间诸位领袖谈笑风生,亲如家人。胡志明丝毫没有察觉,一场决定数位中共高层领导政治命运的严峻斗争,已经拉开帷幕。

胡志明离开美庐后,毛泽东特地派人,把并

冈山人民送给他的新鲜的“娃娃鱼”(大鲵),转赠给胡志明品尝,同时还送了自己家乡湖南风味的腊肉。

“何时能吃您的喜糖?”

7月28日上午,寂静的东谷346号别墅内,传出一阵阵欢声笑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和李富春的夫人蔡畅,来到胡志明的住所看望他。

在这些夫人中,邓颖超与胡志明有着非同寻常的情谊。周恩来与邓颖超于1925年结婚后,胡志明是他们在广州的家中常客,他同周恩来一样,称她作“小超”;邓颖超则同周恩来一样,称他为“大哥”。由于胡志明是独身,只要能联系上,邓颖超总不忘给这位“大哥”缝制冬衣。

他们在互致问候之后,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临近中午,胡志明留几位夫人吃饭。这饭依旧吃得十分俭朴,四菜一汤,不过每份菜的量比较多。

午餐席间的话题十分轻松,几位夫人同胡志明开玩笑说:“胡主席,明年该吃您的喜糖了吧?”因为胡志明曾发过誓,越南统一事业未竟,他决不结婚,他一直恪守着自己的誓言,不曾结婚。几位夫人提出想吃胡志明喜糖,意在希望早日见到他的祖国的统一。

饭后,几位夫人与胡志明一起合影留念。分手时,大家都希望胡志明在凉爽宜人的庐山多住一段,因此时正值酷暑灼人的盛夏。

看《追鱼》

在中共领袖夫人们看望胡志明的那天晚上,胡志明应邀观看江西省赣剧院演出的《追鱼》,由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作陪。他们在演出以前,便早早地来到庐山人民剧院,恭候胡志明的到来。

胡志明因剧院与其寓所不过咫尺之遥,吃罢晚饭,便在工作人员陪伴下,漫步走向剧院。守候在门口的刘少奇夫妇,见胡志明到来,迎上前去,随他一同入场就座。

长年在中国从事过革命活动的胡志明，对汉语十分精通，所以无需别人为他翻译介绍，已将剧情看懂个八九不离十，当演到精采处或演员有上乘表演之时，他便会同其他观众一样，鼓掌称赞。

翌日上午9时，胡志明到刘少奇住的124号别墅，做礼节性的拜访。刘少奇首先问候胡志明昨夜是否休息好了，然后对他说：“庐山气候凉爽，你不妨多住几日。我们也还要在山上再开十多天会呢。”

林彪提出一个敏感问题

就在毛泽东会见胡志明的同一天，彭德怀也被召进了美庐。

彭德怀本以为是毛泽东单独见他，可当他走进楼里，却看见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依次而坐，在山上的政治局常委都到了。他本能地感到势态的严重，此刻将决定其政治命运。他一再叮嘱自己要冷静，先认真听。

毛泽东说彭德怀同他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这次又给他“下战书”。彭德怀最真切地感受到毛泽东每句话的千钧之力。

在座的林彪，忽然提出了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

“彭德怀同志前不久访问了东欧各国，上山你急于发难，是不是有背景？赫鲁晓夫对你评价那么高，你答应了他什么？”

毛泽东已经知道苏共领导人对中国的大跃进的不同看法，但直接将苏联、赫鲁晓夫的态度，同彭德怀对大跃进的意见牵扯在一起，这还是第一次。于是不由人想到胡志明刚刚从苏联来，他可能转述的某些信息，引发了某些联想。

毛泽东的挑战性格被激起来了，彭德怀的意见，不是简单的认识问题，他所代表的，是与追求加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中国共产党人相抵触的右倾思潮。至此，彭德怀在庐山所作所为的性质，基本定下。在许多的关于庐山会议的纪实文学中，至关重要的国际风云对毛泽东决断的影响，被忽略了，这无疑有碍人们正确地认识庐山会议，也有碍于人们公允地评价毛泽东和

彭德怀。

三个文件

7月29日，毛泽东批示印发三份材料，并撰写了一段按语。毛泽东的按语是耐人寻味的：

“此三件印发各同志。印时注意，将赫鲁晓夫的那篇（连同中央社的一则纽约消息）放在前面。三篇印在一起，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台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台的因素，如果不垮台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为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

毛泽东的这段话，强调了三篇连在一起，强调了对比，其用意十分明显。

让我们再看看当时印发的三份材料吧：

其一是赫鲁晓夫1959年元月在苏共21大发言中，对中国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批评。如“争取实现‘大跃进’的人民运动”，“任意破坏或越过了合乎规律的历史进程”，“是平均主义”等等。

其二是台湾中央社报道的一则来自纽约的消息，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攻击人民公社和大



△邓颖超等看望胡志明

跃进的部分言论。如他在《进步与人类尊严——1958年11月13日在西雅图商会的演说》中说的“中国共产党人正在把一种称为‘公社’制度



△40年代胡志明在延安

的落后的大规模的奴役制度狂热地强加在六亿五千万大陆人民的身上”，“在中国的‘公社’制度下，人的个性和人格是要予以否定的”等等。

其三是关于苏联农业公社问题的材料。苏联在实行农业集体化以前，曾试办过农业公社，不仅把生产资料公有化，而且把每个社员的生活资料也公有化，结果犯了“左”的错误，不得不加以纠正。1958年武昌会议后，王稼祥针对随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后刮起的“共产风”，提出“我们的人民公社，颇有类似于苏联农业公社的地方；为了吸取其他党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研究一下苏联的农业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的异同之处。”在他指示下，中国驻苏使馆收集了有关材料，陆续寄回国内。王稼祥本想用以纠“左”的材料，经毛泽东之手，转化为批右的反面教材。

历史的确能戏弄人，敌意和偏见，有时同善意的批评竟有那么多相似之处。而这一点不加甄别的相似，竟能置最真诚的革命家于死地。

“庐山好”

庐山上中国共产党内的斗争在逐步升温，但胡志明并未马上得知内情，虽说他是唯一一个置身会议地点的外国首脑。此刻，他听从了中共首脑的劝说，难得一次忘情山水。

在会见了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之后，胡志明

的身影便隐现于仙人洞、花径、大天池、含鄱口、黄龙潭、乌龙潭、庐山植物园诸风景点之间。

胡志明熟悉中国文化，对一些古诗词尤其喜爱。庐山的白云青峰、飞瀑流泉、苍松奇葩、悬崖怪石……这美不胜收的佳景，往往使他将脑海中那些熟悉的诗句脱口吟出。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苏轼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诗景相应，更令胡志明陶然沉醉。

当他徜徉蜿蜒花径，在当年白居易吟诵桃花的地方凝神，“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佳句，飘然欲出。沉浸在良诗美景中的胡志明，对陪同的人说：“庐山不但夏天凉爽，春暖也来得早，白居易的这首诗，就是赞美庐山之春的。”这位具有非凡洞察力的政治家，一下就发现了庐山特有的景致，并一语道破：“庐山不但风景好，云景尤其好！”

8月1日，胡志明去参观庐山博物馆。当他走进博物馆休息室，见宽大的案子上铺着宣纸，砚台里已磨好浓浓的墨，旁边摆着几支型号不同的毛笔，胡志明一看即明白了主人的用意。在庐山管理局党委书记楼绍明恳请下，胡志明走到案前，问庐山交际处的程先喜说：“用手指写行不行？”程回答说可以随胡主席的便。

于是，胡志明身体微微前倾，用手指蘸上浓墨，点抹挥洒，竖着写下三个遒劲有力的汉字，“庐山好”。在一片赞叹声中，胡志明洗干净手，拿起一支中楷狼毫笔，将落款题在左侧，也是行云流水般的汉字，“一九五九年八月胡志明”。这幅题词，后来一直悬挂在庐山博物馆的展厅里。

8月2日，胡志明在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陪伴下离开庐山。临别之际，他与曾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合影留念，并赠给每人一个他签了名的笔记本及一枚纪念章。也是那一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开幕。

3天后，新华通讯社发了一则消息：胡志明主席“由赛福鼎、郭鹏、陶峙岳、张仲瀚等陪同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垦区参观，受到男女职工的热烈欢迎。”但消息没有透露胡志明从何处来。

（责任编辑 张勤）

红军战将、林彪战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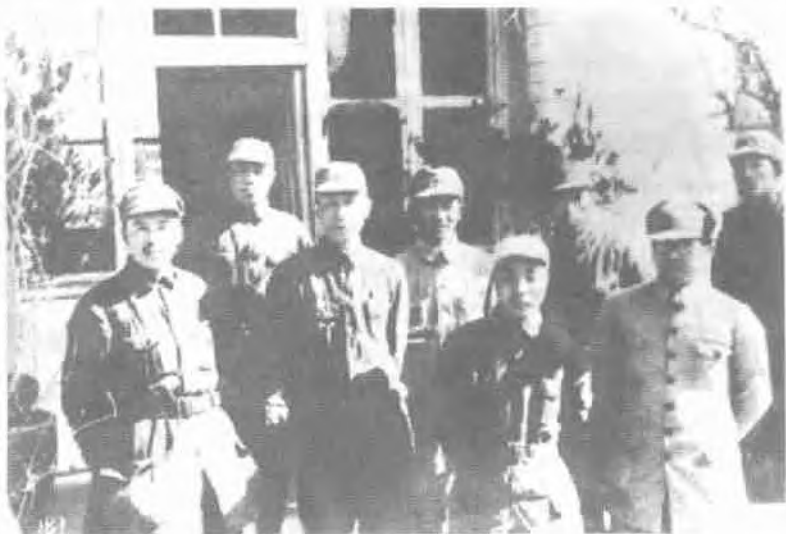
陈光功「罪」录



○历
秋

陈光 1949年春摄于北京中山公园

从红军时期起就和林彪并肩作战，多次担任他的副手和代理人，曾任著名的红一军团代军团长、八路军115师代师长的名将陈光，在全国解放以后不久，忽然成为“反党罪人”，最后惨死狱中。直至1988年，中央才为他平反昭雪。这是怎么回事？陈光到底是何等样人？他又是怎么蒙冤并“尘封”至今的？这与林彪有否关系……



△抗日时期陈光(后左二)与刘少奇(前左二)、罗荣桓(前右一)、肖华(前右二)等合影

永存在心的历史镜头

1938年11月，中央组织部将我和一批抗大同学，分配到八路军115师工作。我们从延安来到晋西北双池镇，一到师部就见到了代师长陈光。原师长林彪在平型关大战后因误伤，去陕北治伤养病去了，115师部队就由陈光指挥着。我们报到不久，115师奉命东征，陈光既是指挥员，又是排头兵。部队出发时，他骑着枣红战马，迎着漫天风雪，走在大队前列。进入敌占区，夜过同蒲路时，我们正紧张地通过封锁线，忽见陈光师长站在铁路旁微笑着对我们说：“不必紧张，沉着点。”当部队越过风雪中的绵山时，又见他站在山头上，大风刮得他几乎站立不住，他却在不断给大家加油鼓励……

当时，侵华日军极为疯狂，铁蹄过处，一片灾难！山东人民热情迎接了抗战主力军115师的到来。部队到达不久，他就和罗荣桓政委一起，按照中央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指示，连打几个胜仗，开辟和建立了山东抗日根据地。我参加并目睹了他指挥的几次战斗，有两次至今记忆犹新：

1939年5月，日军在山东的最高指挥官尾高龟藏中将，调集5000余日军，带100门大炮，乘坦克、汽车100辆，9路出动，将我115师师部与地方机关3000余人和少量部

队，包围在肥城陆房村北山沟里。大家都很担心着急。只见陈光敞着领口，挽起袖子，不断用电话向各阵地发出命令。部队在陈光的指挥下，连续打退敌人9次冲锋。有一股敌人绕道偷袭进来，机枪打到了陈光的指挥所，他迎着噓噓枪弹，命令师部骑兵连冲杀过去，击退了敌人。当夜，陈光让我们全体轻装，在拂晓前，带领全部机关和部队分三路安全转移。天亮后，日军不见我军踪影，尾高中将连声惊呼：“八路神兵！”其铁壁合围化作泡影！

这一仗毙伤日军大佐以下1300余，我方仅72名伤员。陈光用兵真是神了。

两个月后，日军长田大队占领了鲁西汶上，又带着12匹骡子拉的野炮和骑兵，出动示威扫荡。陈光在罗荣桓政委支持下，将手头仅有的两个步兵连和一个骑兵连，巧妙地布下了伏击圈，一下把敌人打得人仰马翻，逃进了独山庄。陈光又命令部队半夜冲进去，爬上房顶用手榴弹狠炸敌人。敌人忙开动野炮，想用炮声求援。陈光上前大喊道：“同志们，把敌人大炮夺过来！”战士们猛扑过去，打死敌兵，缴获了两门野炮

和一门步兵炮。天一亮，敌人更无处逃，少佐大队长被击毙，长田大队全部被歼，还活捉了24个日军。战后第二天，八路军总部就传令嘉奖这一仗是“模范的歼灭战”，陈光的威名，也到处流传开来。

抗战期间，陈光多数时间在山东。他很尊重罗荣桓政委，政委也积极支持他，两人紧密团结，山东军民把他们叫成了一个人：“陈罗”。这成了他们不断取得胜利的保证。我曾多次见到陈光，虽为军事首长，只要是政委主持的报告会、座谈会和学习会活动，他总是积极参加，并且认真发言，时刻作为一个普通党员，接受并服从党的领导。每逢传达中央或军委的文件指示，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或报告，他总是亲自作笔记，反复阅读领会。

有一件事我印象特深。1942年春，刘少奇同志由华中赴延安路过山东，受中央委托视察当地的军政工作。陈光曾几次向他汇报交谈，使刘了解到许多情况。有一天少奇同志向干部作报告，会场就设在村边打麦场上。陈光和罗荣桓一起最早来到会场，并且和大家一样，就坐在



陈光和他的夫人、孩子

挥员。在反“围剿”战争和长征途中，陈光先后担任了红二师、少共国际师、二师和四师的师长，最后又代理了一军团长。长征一开始，他率领红二师承担了最

艰险的前卫任务，连续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通道转兵后，又按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意图，突破乌江天险，率兵占领遵义，使连续苦战的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获得了第一次喘息的机会和休整的地点，更为扭转党和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创造了条件，提供了保证。在后来的四渡赤水河、飞夺泸定桥和爬雪山、过草地时，一直是全军的开路先锋，特别是长征后期腊子口战斗，陈光又立下了大功。

腊子口位于岷山高峰，是红军必须通过的山口。山口两边悬崖峭壁，高耸入云，山口下面是一条湍急的河流。河上木桥就是进入山口的唯一道路。敌人在桥头筑有碉堡，山口周围则是敌人主力部队把守。陈光用一个连兵力去夺取木桥，数次进攻未奏效。他就亲自带领两个连绕到敌人背后，和正面部队共同夹击敌人。在茫茫黑夜，他带领战士们，不顾掉进深渊的危险，胜利地爬上悬崖峭壁，从背后给守敌一个突然打击，使正面部队顺利发起猛攻。天险腊子口被我军胜利攻占，扫除了长征途中又一最大障碍。之后，陈光又率领前卫师翻越六盘山到达陕北，消灭吴起镇的敌人骑兵，并在著名的直罗战役中，完成了主攻任务。这一连串的胜利，为中央把大本营放在陕北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

中央在后来的总结中，曾称赞陈光“创造出不少有名的战斗范例”，“对中央红军北上渡出险境，贡献极巨。”

抗战初期的首战平型关，陈光又立了新功。战斗打响后，执行主要作战任务的就是陈光为旅长的三四三旅，他是这一战役的火线指挥员。1937年9月24日夜间，陈光指挥部队冒瓢泼大雨，运动至山沟两侧，忍受着寒冷，隐蔽待机。第二天上午7时，100余辆载着日军的汽车，日军骡马大队，骑兵部队以及200多辆运货大车，沿着山沟的崎岖公路，蜂涌而至，进入我伏击圈。这股敌人是板垣师团的二十一旅团，陈光当即果断地命令部队抢占制高点，两侧部队如猛虎下山冲向敌人。日军这个旅，武器装备非常精良，士兵个个高大强壮，作战十分顽强。但是我军在陈光指挥下，压倒了敌人，巧妙地将敌人分割数段，一举歼灭敌军1000余人，打出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打出了八路军的神威。

不久，林彪被闫锡山部队开枪误伤，离开了部队。中央决定由陈光代理一一五师师长，带领部队继续作战，以后又挺进山东，屡建战功，为一一五师战旗增添了新的光辉，陈光的威名也更响亮了。几年以后，林彪从苏联养病回国。此人本来就常居功自傲，一向瞧不起别人，见接替他指挥一一五师的陈光，战绩辉煌影响很大，心中很不是滋味，总想找点陈光的岔子。他终于等到了下手的机会。

1943年，陈光遵照中央决定，去延安学习并准备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去后不久，就有人散布流言蜚语，说陈光在山东闹独立性，不接受党的领导，因此被中央调来延安的。陈光开始不以为然，认为自己的全部活动和表现，中央完全了解和有明确评价。到“七大”开幕前夕，在出席“七大”的代表人选等问题上，陈光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马上

地上倾听报告。警卫员给他俩送来小板凳，两人一致不要，坚持席地而坐，认认真真地连听了两个多小时，直到报告结束。会后陈光又找去详细记录，深入学习领会。他对中央领导同志及其指示如此尊重，对全体干部影响很大，人们都说他们以实际行动给大家上了一堂生动而实际的增强党性课。

党的评价和林彪的谰言

陈光原是这样一位忠诚党员和杰出将领，谁知却不断受到人的攻击和诬告。攻击最狠、诬陷最毒的竟非长期与他并肩战斗的“战友”林彪。他与林彪共事很久，可以说是相知较深，有一次还救过林彪的命。

那是1930年2月在江西水南，反夏反击战中，林彪及其部队不幸被敌人包围了，处境非常危险。陈光立即率领所属部队前往抢救，他奋不顾身地亲自带兵冲进敌人重围，几乎被敌军俘虏的林彪救了出来。由于战斗特别激烈危急，陈光自己负了重伤，但他从不说自己曾救过林彪。林彪不仅不感激，反而觉得陈光知其丑事，时时对他猜疑警惕。

但是，陈光本身也是英勇战将，林彪还不能怎么他，有时还得借重于他，在红一方面军特别是一军团中，陈光一直是屡建战功的优秀指

有人直接向毛主席告状，诬陷陈光要抵制党代表大会，是反党行为。告这个阴状的就是林彪。

幸好毛主席心中有数，不仅未为林彪谗言所动，反而亲笔写了一信，着人马上送给陈光。信中说：

“你的意见我是了解的，有些意见是对的。”

“你在山东执行的路线是对的。七大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相信你能够致力于开好这次大会。”

“意见可以会后交换。”

陈光接信，反复阅读，感动万分，连声地说：“毛主席了解我，毛主席信任我！”他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积极愉快地参加了“七大”，并且把毛主席给他的这封信，一直贴心珍藏着。“七大”

以后，陈光要离开延安返回前线了，毛主席特地邀请陈光和夫人史瑞楚，到自己家中作客，同他们夫妇亲切交谈。对陈光从红军时期到抗日时期的表现和贡献，作了很高的评价，又对他今后的工作，作了许多指示和嘱托。

“七大”前后，陈光还多次看望请教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他们多次去看望陈光，都肯定陈光一贯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为党和人民立了大功。他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审查小组在为他写的《历史总结》中说：“陈光是我党有数的军事人才之一。他一贯忠心耿耿，具有为党为阶级虚心学习、联系群众的优良品质。”“抗日战争中，陈光率领一一五师转战华北，1939年进入山东，创

造了梁山歼灭战、陆房突围等有名战役，使我党我军威名远扬，鲁苏局面大开，根据地建立。”

所谓陈光不尊重党的领导，向党闹独立性等胡说，在事实和中央的结论面前，不攻自破。但是林彪却不肯就此认输。

在“顶头上司”的高压下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陈光奉命去东北工作，林彪又成了他的“顶头上司”。中央和毛主席对陈光的肯定和器重，反而使林彪更加嫉恨他，从此就开始了陈光的一系列压制、刁难和打击！

陈光于1945年到东北后，先奉



△红军时期的陈光(后右二)与邓小平(后右一)、姚荣臻(前右二)、杨尚昆(前左二)、徐海东(前右一)、罗瑞卿(后左一)等合影

命在黑山镇组织防御。东北局分配了一部电台和机要人员，由他指挥和使用。不久，林彪竟打电报给陈光，要调电台机要人员到自己所在的总部工作。当时林彪总部有日本造的强大电台，而且有一台、二台，如将陈光处电台调走，陈光就无电台同部队联络，所以陈光回电请示：“现在情况紧张，没有电台联络不行，能否不调？”林彪接电报后，竟连发两电，蛮不讲理地指责陈光扣押电台，声称不调电台，就影响他指挥

作战。陈光接电报后，随即让机要人员带着电台去总部报到。这部电台只有15千瓦，林彪并不真正需要。陈光只是申明理由，商请不调，最后则坚决执行了林彪电令。林彪有意刁难陈光，却反诬他抗拒命令。使陈光一到东北就挨了林彪当头一棒。

陈光从红军到八路军，一直是主力部队的主要指挥员，到东北后，林彪竟然不让他到主力部队工作。1946年1月，陈光被任命为东满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陈光以大局为重，不计个人得失。当军区决定由他负责指挥解放长春的战役后，他立即全力投入战斗。他不顾个人安危，亲自进长春侦察敌情，科学周密地制定了进攻长春的作战方案，并随攻城先头部队进入长春，亲自在市区指挥战斗。这一战役，全歼了伪满精锐部队2万余人，第一次解放了长春，取得了东北我军首次攻占有坚固防御的大城市的重大胜利，显示陈光的大将之风和杰出的指挥才能。

1946年10月，中央军委下令任命陈光为东北野战军六纵队司令员，使他终于回到主力部队又负重任。林彪对此极为不满，又利用职权耍开花招，一心要打击和整治陈光。当年12月，陈光奉命率六纵赴松花江冰封，到陶赖昭以西沿江集结，伺机过江。他带了一个连，亲自去前方侦察敌情，为过江作好准备。这时林彪突然给陈光发来一电，说为了防止敌人过江进攻哈尔滨，要将六纵撤回原地，询问陈光有何意见？陈光认为敌人进攻哈尔滨的可能性不大，建议仍执行原作战方案，不要将六纵撤回原地。因林彪来电系征询意见，所以陈光回电提出建议，这原是正常的。哪知陈光回电后，林彪突然以东总名义直接向六纵各师发电：“立即向陶赖昭以北布防，不要等纵队的命令。”接此命令后，六纵各师即分头撤走。陈光接到通知时，部队已全部撤走。他在返回找纵队

的路中，几乎被敌人抓走。林彪火速撤回部队，根本不是因为敌人要进攻哈尔滨。敌人当时并没有这种部署。林彪在并非紧急的情况下，擅自撤开纵队党委和司令员。直接调走纵队下属部队的做法，完全是利用职权，对陈光玩弄“上楼抽梯”的诡计。

林彪肆意陷害陈光，却又反诬陈光违抗军令。这种行径，当时就引起共愤。陈光悲愤填膺，酿成大病，被迫离开了六纵。使六纵战友也感到莫大遗憾。

1949年初，毛主席亲自签署命令，任命陈光担任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表示了中央和军委对陈光的信任。当时正值北平解放，新中国即将诞生，陈光也十分兴奋。然而林彪对陈光就任新职，却耿耿于怀。1949年3月，在北平举行的四野全体师以上高级干部会议上，林彪未经党委和罗荣桓政委同意，公然歪曲事实，蛮横地点名指责陈光，在全野战军面前，破坏陈光同志的威信。对于军事指挥员来说，威信等于生命。林彪这样搞，实际上是要剥夺陈光的工作权利。陈光早就想到林彪要整他，但没有想到竟会在刚接受新的任命时，就这样整他。他一回到寓所，就气得病倒了，连续昏睡三天，粒米未进。但最后还是理智占了上风，决心振奋精神，忍辱负重，更好地工作，以实际行动回答党和毛主席的任命。

四野渡过长江以后，陈光经过认真研究，向林彪建议尽快切断白崇禧、李宗仁退路，把他们拖住。没想到竟然触怒了林彪。一天，林彪突然声色俱厉地要陈光收回建议，对他要唯命是从，不得提任何不同意见。二人针锋相对发生争执。

林彪：我现在不需要你提什么建议，你应该将建议收回去！

陈光：我的建议是经过慎重研究的，希望党委讨论一下再作决定。

林彪：不要以为你救过我的



△红军时期的陈光(前左三)与毛泽东(后右三)、罗荣桓(前左一)等合影

命，你就可以骄傲自大，你好好想一想，没有我林彪，就没有你陈光的今天！

陈光：你不要有私心，我当时冒着牺牲自己的危险救你，是为了战斗的胜利，为了革命的利益！

林彪没说完，气呼呼地走开了。从此陈光的处境更难了！

不明不白 含冤去世

不久，陈光就被林彪调出四野领导机关，分配去地方部队，担任了广东省军区的第二副司令员和广州警备区司令员。

谁都知道，这是林彪对陈光的有意打击压制。不料，更严重的迫害紧接着来了。1950年7月23日，一直紧跟林彪的广东军区参谋长李作鹏，本来无事不登三宝殿，这天竟故作亲热地把陈光骗到公园里，说要陪他散散心。一向磊落大度的陈光，以为他有什么事要谈，怕在家里不方便，也没往别处想，就和他一起去了。哪知陈光一去不回，刚出家门就被秘密逮捕了。陈光的警卫人员立即被解除武装，住处也被彻底地抄了家。

周围的人特别是陈光的亲属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多方打听，才由有关部门宣告，陈光已被撤销职务和开除党籍，正受囚禁等待处理。两个月后，也就是国庆一周年的节日前后，他又被从广州押解到武汉，打入黑牢继续囚禁着。其全部“罪行”

只有两个字：“反党”。定他为“反党”的，据说又是他的一句话：

“我陈光不死，林彪的乌纱帽是摘不下来的！”

关于陈光到底是什么时候，对什么人，为什么说这句话的，这句话到底是针对什么说的，甚至有没有这句话，不仅谁也不知道，而且也没有任何证据和根据。如果确有这句话，其实也只表明了一点，陈光对林彪有意见，或是对林彪的为人有看法。

当然，最痛苦和愤怒的是陈光本人。据参加看押过陈光的同志说，他被关押以后，每天埋头写材料，只是所有这些材料都被监管者压着，一分又一分装了整整两大麻袋。全部材料后来都不知去向。反正没有一个字传到陈光想送的人手上。

陈光被关押期间，经常从贴身口袋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封信来看，几乎天天看，并且翻来复去地看，每次都看得那么专注、兴奋甚至充满希望之情。有次他情不自禁地对看管他的同志说：“这是毛主席1945年写给我的信，我一直贴身珍藏着。毛主席对我是了解的，信任的！”又说：“现在有人在陷害我，我

要告诉毛主席，我真想见到毛主席啊！”

可惜他为自己清白作的申辩，他向党和毛主席的申诉，他给党写的各种材料，特别是他对党对毛主席的无限深情及最大愿望，都永远不为人知了。但是当时他还是持续不断和顽强不屈地写着、想着和期望着。由于连年不见天日，体力日见衰竭，就设法靠抽烟来刺激和提神，最多时达到一天抽六包，少时也需三包。就这样连抽带写地熬着一个个无望的白昼和无尽的黑夜。

人非草木，焉能无情，他有时特别想念亲人。他曾写条子提出要求，请求让他看看妻子史瑞楚和东海、晓星两个儿子，就是犯人也该允许探监见家人么。1954年春，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幼子晓星，用刚学会的字给陈光写了一张条子：“爸爸，我想念你！”可是不仅条子不知去向，他们父子间相互都生死不知两茫茫。

几乎就在晓星给爸爸写条子的同时，当年6月7日，他们日夜想念着的亲人和许多同志常常怀念的战友——陈光，在屈辱、痛苦和悲愤中，含冤去世。死时年仅47岁。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一位忠诚战士、无畏英雄和杰出将领，就这样在正当壮年、大有可为时，不明不白和不声不响地永远离开了人间！

陈光自己至死不知道，别人更一直不知道，他到底是为什么和怎样死的。不过，许多人都把他的死和林彪联系在一起，都认为这一切完全是林彪造成的。虽然当年几乎无人或很少有人公开这样说。直到“9.13事件”林彪自我爆炸以后，才有人提出了这个问题。最早揭露此事的是刘伯承元帅，他于1972年3月批判林彪时说：“李作鹏假装友好去套陈光，完全是特务手段，林彪却为此器重他。”至于林彪从来唯我独尊，犯上压下，容不得别人，特别是

反对他甚至是不肯吹拍他的人，轻则打击压制，重则置于死地。这才造成战将陈光死在自己“战友”之手的历史悲剧。

纪念长征胜利50周年时，一批老同志上书中央，要求重新调查和公正处理陈光的问题。中央终于决定为陈光平反昭雪，林彪更早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不仅当时的许多具体过程细节至今还是一个谜；特别是林彪到底如何设谋暗害直至整死陈光？一位功臣战将怎么会突然遭此下场，又为什么几十年无人过问查考……不能不引人探究和深思。

历史就是审判官。是功是罪，都有案可查有史为证。陈光虽然冤死近40年，其英名也尘封至今，所有了解、知道或听说过他的人，都忘不了他。他的家乡湖南宜章，一直在为他而骄傲，因他而痛惜。老人们一提起这位当年雇农的儿子、最早的赤卫队长和井冈山会师时的红军连长……就声泪俱下。县广播站连续播放歌颂陈光长征事迹的长文《勇士雄风扫征途》，全县尽人皆知本县出

炎黃子孫 閔績業 祖國山河 煥新顏

癸酉年仲夏

八十八歲
胡絜青



△本刊顾问胡絜青老人给本刊读者的题字

过这位长征英雄。山东的党史和平型关的战史，以至人民军队发展史和共和国诞生史上，都记载和闪耀着陈光的名字。虽然他从来不提自己的功勋战绩，只在一分《历史自传》中似乎随便地提了一句：“我负伤10次，梅县、值夏、文家市、浒湾、广昌、朱马寨、建宁、南雄、草地，九个地点共负伤10次。”他的历史是用自己的鲜血写下的！人民不会、不能也不应该忘记他这样为革命付出鲜血直至生命的功臣。

（责任编辑 卢弘）

周恩来和他的「能干之臣」

——黄埔军校一期生彭干臣轶事

○ 朱清泽 王建丰

一座古色古香的北京四合院房间内，站着一位身材魁梧、戴着眼镜、佩戴大将军衔的中年人，他手握红色电话耳机，操着湖南口音，乐哈哈地说：“小超！我是陈赓。”对方接电话的是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人们通常称她为“邓大姐”。可是，陈赓同周恩来一样，称呼她为“小超”，足见他们间非同一般的战友情谊。

邓颖超答话后，陈赓望了望身旁的一位显得机灵的小个子男青年，接着说：“彭干臣的儿子来了，现在在我家里。”电话里传来邓颖超的声音：“叫他快来，叫他快来！”

陈赓放下电话机，立刻要车。将那男青年送到中南海紫光阁的总理客厅。

陈赓在电话中提到的彭干臣，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一位被湮没的英杰，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高足、革命斗争中的麾下战将和得力助手。因为长期征战，变动频繁，曾用彭干成、彭耐寒、石广涛、何越、黄大老板等十多个化名，且牺牲较早，资料散失，所以他的英雄业绩鲜为人知。

彭干臣的牺牲就一直是个谜。一种说法是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彭干臣率部撤离南昌，在转战途中牺牲；一种说法是1933年彭干臣在赣东北彭杨军校工作时，遭到“左”倾冒险主义的迫害致死；但有的老红军说，在1934年与彭干臣见过面，又否定了前两种传闻。尽管说法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肯定的，即彭干臣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高级干部中的一位烈士。

周恩来、邓颖超、陈赓作为他的密友，多年来常常为解开这个谜而操心。早在1950年，周恩来从北京致书湖北英山县一位烈士的父亲郭若夫先生，称：“德昭弟为国捐躯，还有彭干臣先后同学，亦为国牺牲。”1954年，陈赓大将作为彭干臣的亲密战友，在一封书信中明确指出：“1935年，彭干臣同志在赣东北形势恶化时牺牲。”1983年，彭干臣的老战友、国务院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刘鼎同志说：“1934年秋，我在赣东北见过彭干臣一面。当时，他被两个红军战士看押着，他还给我使眼色，彼此一句话也没有敢讲。”当时赣东北红军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代表曾洪易控制下，许多红军知识分子遭到了整肃，连方志敏也一度被解职。彭干臣是学生出身，毕业于黄埔军校，象他这样有文化、有知识、精通军事的战将，自然成了“左”倾路线诬陷和迫害的对象。经过多方核实，1985年，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批示，中央组织部正式发出公函，确认彭干臣系1935年1月在战斗中牺牲。

周恩来、邓颖超、陈赓都知道彭干臣生前在上海的伴侣江鲜云以及他们有一个女儿彭伟生和一个儿子彭伟光，他们一直在为寻找战友的遗孀和子女而奔走，但未如愿。今天，战友的儿子来到身边，他们该是多么高兴啊。邓颖超拉着彭伟光的手，亲切地说：“我们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孩子。”接着，周恩来也握了彭伟光的手，同时用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对眼前的这位青年人从头到脚扫视了一遍，转脸对邓颖超说：“是的，他是彭干臣的儿子。你看，他的模样，他的举止言词，都像他的爸爸。”事后，彭伟光问邓颖超，说他从婴儿时就离开了父亲，怎么言谈举止像爸爸呢？邓颖超说：“傻孩子，那是遗传呀！”

邓颖超对彭伟光说：“你姐姐幼小的时候，我抱过她。我和你妈妈江鲜云在上海时，还在一起工作过。抗战初期，我和你周伯伯曾经打听过你们一家人的下落，一直没有结果。今天见到你，我们都非常高兴。这样，我们对失去的战友彭干臣烈士有所交待了。”

1924~1925年

广州黄埔军校

彭干臣与周恩来的战斗情谊，是从黄埔军校开始的。

成立黄埔军校的消息传到安徽，中共安庆（时为安徽省会）党组织选派彭干臣等六名知识青年共产党员报考黄埔军校。1924年4月28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入校考试张榜，正式录取350人，其中有彭干臣及其同伴许继慎（后为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和军事家）等四人，另外备取120人。5月5日，彭干臣等第一期学生入校学习，他与许继慎被编入第二队。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亲临致词说：“开办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



△周恩来健步向我们走来

二的希望,就是创建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

周恩来到校后,便着手发展共产党的组织,设立中共黄埔支部(不久改称特别支部)。

当时,周恩来接触了一个操安徽口音的二十四五岁、中上身材、精明机灵的学生,他就是安徽来的彭干臣。两人谈话投机,一见如故。周恩来知道他早年受《新青年》杂志的影响,于1921年在安庆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参加领导了驱逐军阀的“6.2”运动和1923年的反对曹锟贿选当总统的示威游行,并以“敢死队长”之名遭到反动军阀的通缉。1923年安庆师范建立中共组织,彭干臣担任党支部书记。入黄埔军校后,学习成绩优良,参加平定广东商团暴乱中,作战勇敢机智,成为军校特别支部重要成员。1924年11月30日,彭干臣参加了黄埔军校一期学生毕业考试,成绩优良。因为军政素质好被留校,他与陈赓分配到教导一团,同一个连队,陈赓任连长,彭干臣任党代表。

1925年2月1日,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指导成立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是中共领导的团结广大革命军人的先进群众性组织。彭干臣是该联合会的骨干成员。当时,蒋介石作为校长,表面上不偏不倚,但暗中却支持“孙文主义学会”,压制和打击“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这个学会打着孙中山的旗号,以“孙文主义”相标榜,实际上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尽管如此,联合会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发挥了团结教育广大青年军人的积极作用,对军校和广东一带开展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救国救民”的革命活动给予极大的推动。

1925年2月,黄埔军校师生及教导一、二团共3000余人组成了校军,参加广东革命政府举行的讨伐

陈炯明的东征。周恩来以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身份,指导两广地区的军事斗争,配合校军的作战行动;又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身份,指导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以革命精神武装校军官兵。黄埔军校到达淡水附近时,得知城中有陈炯明的洪兆麟部一个旅兵力驻防,遂根据苏联顾问的建议,挑选勇士组成了奋勇队(即敢死队)担任爬城任务。彭干臣、张际春、郑洞国、李奇中、刘畴西等八名共产党员军官及二名国民党军官和一百名士兵成为奋勇队成员,分成若干攻击组。12日拂晓开始攻城。彭干臣率领的奋勇队在接近城墙和爬城搏斗时虽伤亡过半,但经浴血苦战,终于率先登城进入城内。奋勇队乘胜与敌展开巷战,很快就俘敌2000人,缴获枪支1000余条。当洪兆麟的后续部队赶到时,彭干臣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随着革命军又奋勇发起反击,迫使敌狼狽逃窜。淡水之战奠定了东征胜利的基础。当时的《商报》盛赞校军,报道说:“军行所至,不扰民间一草一木。鸡犬不惊,商市安堵……谓民国以来仅此所见,乃是真正卫国保民之革命军。”毛泽东后来也赞扬说:“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周恩来在领导这项工作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创造性和干练的才能,在国共两党尤其是黄埔师生中受到广泛的敬重和推崇。

在彭干臣的心目中,周恩来思想敏锐,政治坚定,知识渊博,方式方法机动灵活,言谈举止端庄大方,一言一行都是师表和楷模。因此,他心底里敬佩周恩来,立志做一个象周恩来那样的革命家。他对周恩来的讲话,总是认真听取和理解;对周恩来组织的政治讨论和问答,总

是勇于发言;对周恩来主办的《士兵之友》刊物,总是认真学习,手不释卷;对周恩来发出的战斗号召,总是热烈响应,身体力行,贯彻到底。1925年3月18日,彭干臣和陈赓所率全体官兵,在周恩来的指挥下,乘夜秘密逼近五华县城,悄悄地缴了敌军哨兵的枪械,并利用俘虏佯称回城运弹,叫开城门,我军蜂拥而入。在城中与敌短兵相接时,彭干臣的一个小手指被敌军击断,他全然不顾,继续率领官兵向敌猛冲,直到战斗胜利结束,方才顾得上包扎伤口,致使彭干臣的这一手指残废。周恩来惋惜地说:“彭干臣这样英俊的革命军官,失去一个手指,将来谈恋爱恐怕成为麻烦。”彭干臣却爽朗地笑笑,赋诗言志:“革命诚非易,断指何足惜。留得头颅在,可为党效力。”周恩来称赞说:“真不愧为革命的先锋!”

当初,黄埔军校刚刚出师时,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一些人,都以为校军成不了什么大气候,不相信这帮年轻学生真能杀得贼死。可是一仗仗打下来,人们齐声称赞校军的英勇奋斗精神。黄埔军校中共特别支部书记蒋先云引用周恩来的话说:“这算是我们革命军的第一次对敌,第一次实行唯物主义而奋斗!”

校军东征回师广州后,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与聂荣臻、叶剑英、蒋先云商量之后,决定派遣彭干臣等一批优秀的黄埔军校毕业生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彭干臣告别了黄埔军校和导师周恩来,踏上去莫斯科的征程。

1926~1927年 湖北 北伐军中

彭干臣途经日本、海参崴到了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学习马列主义、东西方革命史和军事课程。同班同学有从旅欧支部来的朱德、刘鼎、

陈赓大将给彭干臣之子的信

伟光同志

由鄧穎超同志轉來的信收到了。

你父親彭幹臣同志黃埔軍校一期畢業，我們是黃埔同學。大革命失敗後，我們又同在上海

做黨的祕密工作。一九三二年幹臣同志在贛東北

二蘇任任紅軍參謀長，後又改任幹部學校

長。一九三五年贛東北二蘇形勢異常惡劣，幹臣同

志即於此時犧牲。我所能記憶到的大概情況如此。

我現在寫這封信，只有信件可由北京軍委辦公所

轉交。

此致

教

陳

廣
一九三八年

曾涌泉和国内派去的张际春、涂作潮等七八十位同志。当时，外国同学为了褒扬彭干臣的才华，曾经给他一个俄国将军“布鲁西诺夫”的美称。

就在彭干臣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国内由蒋介石一手策划的中山舰事件于1926年3月20日爆发。

蒋介石借中山舰事件，撕去假面具。解除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的武装，排挤共产党，篡夺军权，连周恩来也被免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职务。已暴露身份的250多名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第一军和黄埔军校。此后，周恩来集中精力主持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的工作，领导七个军事单位中的党的工作：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四、六军，黄埔军校本部和入伍生部。其中，共产党员叶挺指挥的第四军独

立团是中共直接掌握的革命武装。在准备北伐战争期间，军队急需大批党的领导骨干，周恩来为了扩大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一面在广州大佛寺举办特别政治训练班，为军队培训骨干；一面向党中央建议，电召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共产党员迅速回国，充实军队，参加北伐战争。彭干臣便于1926年秋应召回到祖国。

这时北伐战争已经开始。担任先遣任务的叶挺独立团占领湖南浏阳后，接到周恩来的指示：要在独立团里增设一个特别大队和一个补充营；同时，派遣彭干臣、许继慎等党的骨干分子30多人到独立团工作。叶挺热情欢迎党派来的骨干，彭干臣、许继慎等也如鱼得水，获得了施展才能的良好机会。

彭干臣等到达后，叶挺向他们介绍了独立团出师时，周恩来对连

以上党员干部提出的六条要求：1、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2、注意发动和组织群众；3、注意统一战线工作，很好团结友军；4、作战勇敢，有牺牲精神，能吃苦耐劳；5、要起先锋、模范、骨干作用；6、多打胜仗，推动其他部队跟上来。叶挺特别强调说：“周恩来同志在讲话末尾，加重语气，讲了八个字——‘饮马长江，武汉见面’。”

彭干臣在北伐战争期间，始终以此激励自己，激励部属。他协助叶挺，率领所部参加了汀泗桥战役、贺胜桥战役和武昌战役。彭干臣还向叶挺建议，组织了共产党员为骨干的“敢死队”，在他的亲自带领下，冲锋在前，英勇拼杀，打出了威风，为争得“铁军”的声誉作出了贡献。在战斗中，彭干臣的腰部负伤，却说没有事，继续率部作战。为此，战友们赞扬他是“铁军中的铁将”。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昌,实现了周恩来“饮马长江,武汉见面”的预言。叶挺独立团因为长驱直入,连战皆捷,而获得军内外的崇高声誉,叶挺被誉为“北伐名将”,共产党的声威大振。叶挺升任第4军第25师副师长、第11师第24师师长,并兼任武汉卫戍司令。彭干臣成为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当时,彭干臣的三弟从英山来武昌看他,发现他住室内存有许多银元,临时时开口要带些银元回家。彭干臣说:“这是革命的军费,一块钱也不能动用。”

周恩来根据党的指示,于1926年12月离开广州,来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负责全党的组织工作,并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周恩来调来中央前后,上海工人先后举行三次武装起义。第一次是1926年10月,周恩来还未到。第二次是1927年2月,周恩来临时被派到南市去指挥行动,这两次起义都失败了。2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组织第三次武装起义。成立特别军委,主要负责人是周恩来。

周恩来深感到,武装起义缺少军事指挥人才是一大薄弱环节,必须尽快予以弥补。他想到了彭干臣等一批黄埔军校毕业生。1927年3月中旬,彭干臣、姜锦堂等奉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率领一批经过北伐战争洗礼的党员军事干部由武汉秘密潜入上海。

在上海市辣斐德路(今复兴路)的一条普通弄堂里,有三幢不高的楼房。临街的一幢房子,对外名义上是“学校”,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军委的一处秘密机关。特别军委书记、武装起义总指挥周恩来,在这里与彭干臣久别重逢。周恩来握住彭干臣的手抖了抖,高兴地说:“干臣,你们来的正是时候,犹如雪中送炭。干臣、干臣,你是一位能干之臣,就在大上海大显身手吧!”

周恩来对在场的同志介绍说:“彭干臣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是校军的骨干,又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过,去年秋天回国后,参加了北伐战争,作战英勇顽强,机智灵活,有丰富的实战指挥经验。”

不多时,彭干臣来到华商电气公司一南市区武装起义指挥部,见到指挥部的成员孙津川、王荷波。孙津川与他早就相识,并且是孙津川的入党介绍人(孙津川后来担任南京市委书记,被国民党反动派于1928年10月6日杀害于南京雨花台)。在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夕,孙津川与彭干臣一起找到上海大律师李次山,筹集了一笔巨款,作为起义的经费开支。

时至3月19日,北伐军前锋抵达上海南郊,军阀孙传芳部节节败退,其主力已撤离上海,新来的部队立足未稳,仅有3000人,加上当地警察2000人,力量十分薄弱。3月21日早晨,中共特委决定举行上海总同盟罢工和第三次武装起义。

1927年3月21日中午12时,全市80万工人宣布总罢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开始。13时起,起义队伍系着白底黑字的“工人纠察队”臂章,携带武器到指定地点集结。彭干臣与孙津川等指挥的南市区工人武装队伍,冲进警厅路(今金坛路)上的警察局,智取了一大批武器装备。接着,前往攻打高昌庙军阀部队司令部,军号声和鞭炮在火油筒里燃放的“枪炮声”,震天动地,敌军乱作一团,缴枪的、逃跑的处处皆是。时至傍晚,南市区工人武装攻占了敌军司令部、警察局、兵工厂、造船厂及地方法院、铁路南站等重要目标。

与此同时,吴淞、虹口、浦东、沪西等区的工人武装相继取得了胜利。周恩来亲临战斗最艰苦的火车站指挥作战,终于22日攻克火车站。当天,召开上海临时市民代表会议成立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

正当上海工人阶级和市民群众欢庆胜利之时,蒋介石挥舞屠刀,发动了“四·一二”事变,在杭州、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周恩来也一度被国民党军队扣留,党组织营救后使他很快脱险。为了应付当前严重时局,中共中央成立了李立三、陈延年、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周恩来立即撰文《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指出我党必须放弃苟且犹豫、图谋和缓等幻想。

5月中旬,隐蔽在孙津川家中的周恩来,在孙母的掩护下,与彭干臣接上了关系。后来在中共交通员的带领下,周恩来化装搭乘英国轮船抵达武汉,恽代英等人把周恩来安排在中央军官学校武汉分校居住。彭干臣也相继到汉。

1927年7、8月 武汉—英山—南昌

随着汪精卫继蒋介石之后公开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中国共产党人遭到镇压,正在寻求新的出路。

彭干臣根据党的指示,带着一批共产党员离开武汉,潜回家乡英山。他把大革命失败后在英山隐蔽的共产党员、黄埔军校学生姜镜堂、段焱华、熊受暄、傅坤言、蒋开和肖伯诏等召集起来,联合其他骨干分子,在英山一带发展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这一批党的骨干分子,大多是在彭干臣影响下投考黄埔军校的人员,如姜镜堂、熊受暄,均为黄埔第三期学生,都是1925年入党,参加了北伐战争,姜镜堂继肖伯诏之后担任中共英山县委书记,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2师政委(师长许继慎);熊受暄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军长许继慎、副军长徐向前)。姜、熊二

人均于1931年被张国焘“肃反”冤杀。

周恩来于1927年5月22日由中共中央秘书长改任中央军事部长。5月29日起代理张国焘为中央常委。七月中旬,中共成立临时中央常委会,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组成。周恩来商得其他常委同意,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同时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委员有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后来增补了张国焘、谭平山。

周恩来作为南昌起义的总策划人,认为大胆启用大批军事指挥人才,是取得胜利的重要前提。贺龙当时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对党却十分忠诚,胆识出众,是一位在军中影响颇大的高级将领,必须予以重用。在南昌起义时,贺龙就被任命为起义总指挥。周恩来自然地想到了彭干臣,便于1927年8月2日由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义,命令公布:“派南昌公安局长彭干成(臣)管理南昌卫戍事宜”。在民国十六年(1927)8月3日出版的江西《工商报》、8月16日出版的《民国日报·南昌十日》均登载了此项命令。

在南昌起义准备阶段,周恩来和彭干臣几乎同时秘密潜入南昌城。7月27日,周恩来以前委书记身份在江西大旅社(今八一起义纪念馆)主持会议,讨论了武装起义的组织事宜、暴动计划和时间。只因为张国焘在7月30日才到南昌,他提出:起义成功没有把握就不可动,没有征得张发奎的同意也不可动。这样便打乱了原定的起义时间表,周恩来为此拍了桌子表示反对。7月31日再开会,张国焘才表示服从多数人的意见,这才决定当晚暴动。周恩来任命一大批武装起义领导人各就其位:吴玉章为秘书长、刘伯承为参谋长、贺龙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仍兼第20军军长、叶挺代前敌总指

挥兼代第11军军长、朱德为第9军副军长(军长韦杵未到职)、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彭干臣为南昌公安局长兼卫戍司令和党代表、陈赓为特务营营长。

彭干臣不辜负周恩来的重托,为起义的胜利做了大量工作。八月一日凌晨,随着前敌委员会的一声号令,南昌起义开始。彭干臣率领所部,首先夺占国民党公安局及其哨所,随即在公安局设立南昌卫戍司令部,依据十月革命和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经验教训,迅即部署社会治安,严厉镇压反革命,保卫革命委员会和前敌委员会的安全。晨六时,起义宣告成功,全歼敌军3000多人,缴获枪支5000多支,子弹70多万发,还有大炮数门。彭干臣在起义成功的当日,部署张贴布告,安定民心,要求市民照常生活,商店照常营业,学校照常上课。他命令军警和公安系统,加强城市警备,搜查残敌,打击犯罪分子,稳定了社会秩序,保障了起义的成功举行。从中显示了他的指挥艺术和组织才干,使周恩来十分放心。

8月2日到7日,起义部队照着党中央的指示,分批撤离南昌,南下广东,准备再次组织北伐。彭干臣在做好社会治安、保卫革委会和前敌委员会的同时,积极参与组织指挥军、警、公安撤离的工作。8月4日,他冒雨召集保安第一、二队及消防队官兵,进行撤离南昌的动员,并重新编组队伍,由青壮年警士混合编成正规连队,配发了枪支弹药,当晚进驻原国民党省政府大院内休息待命。当时曾任南昌起义特务连副连长、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中将军的唐天际,在1959年发表的《难忘的行程》中写道:“起义后,部队南下,向广东进发。八月六日,最后一批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卫戍司令彭干臣要我留下,了解一些敌人的情况,并设法与袁州的毛泽东同志带领来参加起义的一千多武装联系,同时,交

给一封与省委联系的信,他们就走了。”1981年7月30日的《北京晚报》记者采访老红军唐天际,写了《八一前夕忆南昌》,更详细地叙述了他与卫戍司令彭干臣在南昌分手的动人情景。后来人们才知道,彭干臣叫唐天际与毛泽东联系以及送交省委的信件,都是周恩来指示办理的。

这次撤离南昌的军事行动,彭干臣负责殿后工作。在起义部队南下途中,前敌委员会决定成立第15军,任命刘伯承为军长,彭干臣为师长。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军事理论家的郭化若中将,当时担任营长。1986年7月9日,郭化若写信回忆他在1927年8月于汕头的参谋部与师长彭干臣会见的情况说:“彭干臣比我年岁稍大,瘦长身材,可能比我还高些,英姿勃发,涵养可亲……”在起义部队南撤途中,周恩来得了重病,发着高烧,彭干臣带着师部军医来给周恩来诊脉和治疗。10月3日,周恩来带病召集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张国焘、谭平山、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郭沫若以及彭干臣等,在流沙开会,决定此后不再使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义。至此,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宣告失败。留在三河镇的第25师余部约800人,在朱德、陈毅率领下,经闽浙赣粤边到达湖南,在周恩来的声援下,于1928年春发动了湖南大起义,随后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会师,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骨干之一。

八一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在革命历史上有其伟大意义。周恩来后来也说:“八一起义,在共产党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

彭干臣的英雄业绩一度虽被历史湮没,从1991年开始,终于在南昌八一纪念馆中首次与公众见面。

1929~1931年

在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白色恐怖
的上海，座落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和麦特赫司脱路(今泰兴路)交叉后侧的一幢三层红砖楼房，装有两扇大铁门。在大铁门的右侧，于1929年春夏之交挂出了一块长方形的大铜牌，铜牌上刻有“武汉蜂蜜公司上海蜂蜜经理处”字样。从外表看来，这里好象是在洽谈蜂蜜生意的地方。他们的经理叫黄春山，人们尊称他叫“黄大老板”。

其实，这个“蜂蜜经理处”，是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租用一位犹太人哈同的房子，用来举办军政干部训练班的秘密所在。那位“黄大老板”其实是彭干臣。他在南昌起义失败后，根据党的指示，于1927年12月辗转来到上海，隐蔽在大律师李次山家中。李次山，当时是上海律师公会会长和安徽同乡会会长，与彭干臣都是英山县人(英山县，在1933年前属安徽省，后属湖北省)。

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新青年》编辑，成为国民党的左派，同情和支持革命。李次山在30多岁时曾收养了一个9岁的英山同乡小女孩，名叫江仙云(后改为江鲜云)，认为义女。到1928年时，江鲜云已长成17岁的漂亮姑娘。经义父李次山介绍，江鲜云与29岁的同乡彭干臣结为伉俪，后生一女孩叫彭伟生、一男孩叫彭伟光。

就在彭干臣来上海之前，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五人常委之一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彭干臣奉周恩来的指示，参加中央军委(又称军事部)的工作。1929年8月，中央军事部长杨殷、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等同志，因叛徒告密被捕，英勇牺牲后，周恩来亲自兼任中央军事部长(军委书记)，并增补彭干臣和李硕勋、李超时为军委委员。周恩来十分重视对苏区红军和白区秘密工作的指导，他在与苏区红军联系中，得知前方缺乏军政指挥人才，于是决定从1929年春夏之交开始举办中

央军政干部训练班，并指示军委委员彭干臣以“黄大老板”身份开办蜂蜜经理处为名，具体主持训练班的工作。彭干臣的妻子江鲜云以老板娘身份作掩护，负责训练班的警戒和交通工作。

中央军政干部训练班每期一二十人，时间一个月，到1930年4月止，共举办了三期。当时，白色恐怖严重，敌特暗探时常出没这一地区。为了遮人耳目，确保训练班的安全，彭干臣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采取了一切可以想到的措施，加强保密和保卫工作。譬如，学员进班都经过严格审查，由地下交通秘密送入学习班；学员在学习期间，一律禁止外出，禁止与外界联系，也不得进入楼底客厅和“黄大老板”卧室。学员毕业后，由党的地下交通秘密送往事先安排好的旅馆，静候地下交通来接送出上海。从训练班出来的学员大多分配到苏区担任军政领导职务。象许德华在训练班毕业后，经彭干臣商定，取“光明之路一定能到达”之意，改名许光达；孙一中改名孙德清。二人于1929年底到了鄂西

星期日

南昌起義首任公安局長
乃早期傑出將領彭干臣
南昌起義首任公安局長彭干臣，乃早期傑出將領。...

南昌起義首任公安局長
乃早期傑出將領彭干臣
南昌起義首任公安局長彭干臣，乃早期傑出將領。...

自願心領之安撫總局
自願心領之安撫總局，...

岁月——黄埔群英（油画）

王庆裕



特委，不久部队整编，孙德清（一中）任红六军军长（1932年在“肃反”中被诬陷杀害）；许光达（德华）任红六军参谋长（1955年授大将军衔）。王首道从训练班毕业后，被任命为湘鄂赣边特委书记（建国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顾委常委）。蔡申熙在训练班时是江鲜云的入党介绍人，毕业后先在中央军委工作，后任中央长江局书记，旋任红15军军长和红25军军长（1932年战斗中壮烈牺牲）。

彭干臣、江鲜云夫妇在举办军政训练班期间，与周恩来、邓颖超夫妇进一步加深了战斗友谊。周恩来经常到训练班来作报告和讲课，每

逢来此都由邓颖超陪同，两人化了装，扮成阔商夫妇，以洽谈生意为名，与彭干臣夫妇接头。为了确保周恩来夫妇的安全，彭干臣夫妇总是事先在二楼晒台上布设报警暗号，有时放一盆鲜花，有时晒几块小孩尿布。如果实物在，表示安全；如果实物不在，表示危险，预告周恩来夫妇及时隐蔽。当周恩来在彭干臣陪同下，进入二楼后间给学员讲课时，邓颖超便与江鲜云在楼下给大家放哨。或是送给小伟生一个布娃娃等小玩具，外人看见，都以为是亲朋好友串门子。

在近一年风雨如晦的艰难岁月中，由于彭干臣的胆大心细，慎密安

排，严密组织，在敌人鼻子底下举办的这个高级训练班，没有出现差错和工作漏洞，安全顺利地地为苏区红军培训了数十名高级军政领导干部。当年参加过中央军委训练班的老同志，齐赞周恩来和彭干臣冒着极大风险，为党的军事斗争所作的这一少有的贡献。当时周恩来曾称赞彭干臣是“出色的将才经理”。

1930年5月，上海一家报纸登出一份停业启事称：“蜂蜜管理处因商务事宜暂停经营业务，何时营业另告。”这是对自己同志的暗号。登报的前几天，彭干臣夫妇已奉周恩来的指示，携带小女儿离开上海，

（下转84页）

横遭谋杀的

报业巨子史量才

○ 耿云志

1934年11月，国民党军队在江西红区“围剿”得胜时，在他们的后方江浙地区，却爆出了一大新闻：

中国最大报纸《申报》主人史量才先生，在从杭州返回上海途中，突遭暗杀身亡……

史量才是个什么人？为什么遭到暗杀？到底是谁怎么杀了他？

从江南学子 到报业巨子

史量才本名家修，1880年1月2日生于上海青浦县。1899年赶考，也算是个秀才。但却放弃科举，学习日文和自然科学。1901年秋，考入杭州蚕学馆，毕业后回到上海，先后在育才学堂、兵工学堂、务本女学、南洋中学等校任教。1904年，自己创办了后来的苏州女子蚕桑学校。1905年，他联合一些朋友发起江苏学务总会，与黄炎培相识并成知交。那时，清政腐败，外敌环逼，革命运动迭起，史量才积极参与了绅商学界的进步运动，取得了相当的地位，与各方著名人物及活跃分子均相稔熟，与革命党人也建立了联系。辛亥革命后，与军队领导人关系密切，曾被委以主持沪关清理处和秋江盐务局等重要差事。

史量才本是个很有抱负的人，一度曾任《时报》主笔，目睹清末以来的时势变迁，深知舆论的力量，便决定接办全国最大的报纸《申报》。

他接办《申报》的资本来源，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史与张謇、赵凤昌、应德闳、陈岭等五人合伙购进《申报》，由张、赵、应三人出钱，史出力管经营，陈出力主撰述。另一说是原为上海名妓的史量才夫人沈秋水身拥巨资，因史豪侠并愿担保沈的安全，乃以身相委，使史量才一下子成了巨富，这才买下并掌握了《申报》。

《申报》原是英国人美查(E.

Major)于1872年4月创刊，是中国最早的一家大报。后来美查返国，报纸归为席子眉、席子佩兄弟接办，但仍用外人名义发行。席氏兄弟不善经营，报纸打不开销路，陷入困境。史量才接办后，《申报》完全成了中国人自办的报纸。他把很有经营才干的张竹平聘来做经理，自己任总经理，悉心经营。主撰述的陈玲原是《时报》总主笔，他写的短评最出色，在报界享有盛誉。在他们的努力下，《申报》销路不断增加，1912年只有七千份，到1917年便达到两万份，以后逐年上升。

申报馆原有设备陈旧落后，工作条件艰苦。史量才首先拆资数十万修建新的五层大楼，着手更新设备。使每小时只能印几百张报纸，增至可印四万八千张。使申报成了当时全国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现代大报馆。

史量才办报，认为应力求客观反映社会的真实情况，而不应为党派政争服务，也不能靠政治势力支持，必须自负盈亏和从商业上考虑。他注重新闻，千方百计延揽优秀记者为《申报》撰稿。著名大记者黄远庸、邵飘萍都曾担任过《申报》驻北京的特派记者。他们所发的通讯和新闻稿，赢得读者广泛欢迎，对政治、军事、经济、教育各界都有影响，对当时社会舆论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他还在伦敦、巴黎、柏林、罗马、日内瓦、华盛顿、东京等聘有特约通讯员，使《申报》在新闻来源广泛和信息量丰富方面，在全国各大报中独占鳌头。

史量才又特别注意发展广告业，他请来精通广告业务的张竹平，在报馆内特设广告推广科，招徕各机关、团体、公司等来《申报》登广告。至1915年4月广告的篇幅竟超过了新闻的篇幅。《申报》由此又开辟了财源。史量才又向其他事业扩展，1921年与南洋侨商创办中南银行，又发起创办民生纱厂，复兴中华

书局等等。这些事业反过来又提高了史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促进了《申报》的发达。1929年又出资盘进了《新闻报》创办了《申报月刊》,编刊《申报年鉴》,造成了一个申报新闻出版系统。史氏成了无人可以抗衡的报业巨子。

改进社会 必须兴办教育

《申报》成为中国首家大报,史量才也成了沪上巨富之一。但他生活俭朴,从不享乐,希望把从社会挣来的钱还之于社会。他以为改进社会最重要的途径是办教育,个人报效社会的最好办法也是办教育。

1932年他创办流通图书馆。做为《申报》创刊六十周年的最好纪念。图书馆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工厂学徒、工友、商店店员等等。服务办法一是借阅,二是送阅,还开辟了邮递送阅。图书馆又辟出阅览室,备国内外中英文报纸50余种,杂志170余种,供大批青年阅读。又成立读书指导部,为读者咨询服务,用通信和在《申报》上开辟《读书问答》专栏的方式与读者互相交流。数月内就收到本市及香港、东京、汉城和云南、河北、河南、山东、南京、汉口、苏州、无锡等地的读者来信五百余封。两年以后已拥存图书三万余册和经常读者七千余人。

1933年,史量才还创办了申报业余补习学校和妇女补习学校,史氏亲任校长,请著名教育家李公朴实际负责。学校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青年和成年男女,设有英、日、俄、德等外语和国文、簿记等科,各科后来发展成六个分校,仅英语补习学校就有一千四百多学生。妇女补习学校至1934年秋,学生达137人,分家事、职业两种;另设钢琴、图画、中文打字、英文打字、银行簿记等专科。还办起申报新闻函授学校,学生

多达四百余人。

呼吁团结爱国 反对内战独裁

史量才办报避免介入政争,但不等于他没有自己的原则和政治态度。当他面临重大政治抉择时,态度从不含糊。袁世凯曾派人以重金和高官相诱,要史量才在《申报》上支持洪宪帝制,他却未为所动。

蒋介石于1927年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极力拉拢,给他许多荣誉职衔:如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招商局理事,实业界温溪造纸厂筹备副主任,上海临时参议会会议长,中山文化教育馆常务理事,新中国建设协会理事,以及红十字会名誉会长等等。但是,“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史量才认为对日态度不是党派政争的问题,是民族大义所在,是国家生死攸关的问题。他说:“行直言者,人恶之,而天必好之。故我宁愿直言以开罪于人,决不愿阿谀人而乱是非。”《申报》就对日问题公开批评蒋介石政府,而且言论越来越尖锐。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五天,《申报》发表评论道,我方一再退让,而日本人并不因而收敛其侵略的锋芒,“抑且有加无已”。认为“退让即为自杀”。当时国民党政府极力宣扬依靠“国联解决”。《申报》警告国人道:“勿徒赖国联”,“当速起自谋”。还谴责国民党当权者“当此外患临头,国家危亡之秋”,却“无杀身成仁,杀敌致果之决心”,对此极表愤慨。史量才还誓言:“我年老,生前不作亡国奴,死后不做亡国鬼。”《申报》在纪念双十节的一篇文章里,明确提出:(一)民权高于一切;(二)建设廉洁政府;(三)武装民众;(四)厉行实业计划;(五)改进教育;(六)复兴灾区。还发表一系列文章揭露国

民党的腐败,指出国民党“党员负党、党负于民”,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停止一切内争,一致对外。“内不能安,即因国民党不能攘外。”

1932年1月,日本大举进攻上海,史量才捐巨资支援十九路军抗战,积极主持上海地方协会,表现了在存亡危急关头敢于挺身负责的大仁大勇精神。

史量才不仅激烈地批评和揭露国民党误国残民的政策,对最敏感的“剿共”问题也提出尖锐批评。《申报》评论说:“政府当局认为‘攘外必先安内’……动员大军四面围剿,蒋介石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抑且所剿之‘匪’,何莫非我劳苦之同胞,何莫非饥寒交迫求生不得之良民?枪口不以外,而以之剿杀政治经济两重压迫而走险之人民,此诚为吾人所不解者也。”《申报》以大量事实证明,政府“官逼民变”,“既逼民变,复从而围剿”,这是当时中国最为可悲的事实。对《申报》的声讨统治当局,替人民申张正义,进步人士极表欢迎。有些著名的进步人士相继加入申报馆工作,如黄炎培主持报馆的设计部,李公朴主持流通图书馆和补习学校,黎烈文主持《申报·自由谈》,俞颂华主持《申报月刊》等等。还有更多的进步人士和进步作家在《申报》和《申报月刊》上发表文章。如鲁迅、蔡元培、茅盾、陶行知、胡愈之、叶圣陶、巴金、陈翰笙、马寅初、艾思奇、钱俊瑞、郑振铎、戈公振、章乃器、周建人等等。

史量才和《申报》的这种态度令统治当局大为不安。申报流通图书馆和业余补习学校把大批左倾青年吸引到一起,尤为蒋介石及其特务集团所注意。1932年7月《申报》对南京中央大学学生抗议政府任命政客担任大学校长风潮的评说,左袒学生、抨击当局,直接惹恼了政府官员。他们认为,《申报》的“剿匪评论”和对“中大风潮”的报道是“危害党

国”的言论，要求蒋介石给予惩治。蒋介石乃亲批：“《申报》禁止邮递”，严重影响了《申报》的发行。史量才不得不托人为之斡旋。蒋答应恢复邮递，但提出要中央派员指导。史量才以《申报》纯为民间报纸，倘政府要派员指导，莫如停办。蒋介石此策不行心里更恼。

1932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等奋起反蒋，组织民权保障同盟，揭露和批评国民党对进步人士残酷迫害，对侵略者一再退让妥协的反动政策。史量才极力支持同盟的活动，帮助代觅通讯社发表同盟的宣言，并在《申报》发表宋庆龄痛批国民党的文章，登载同盟的代电和各种有关的报道。蒋介石对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非常恼火，竟于1933年6月18日，派特务杀害了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

特务的暗杀行动并没有吓倒史量才，与反蒋的进步人士继续来往，《申报》继续尖锐批评国民党政府的政策。他有一次得机会会见蒋介石，当面要求蒋实行抗日，并说“你有数十万大军，我有数十万读者，你我合作……”蒋认为史量才有野心，又有特务密报史曾暗助共产党经费。蒋介石便决心除掉史量才。

惨遭毒手 舆论哗然

史量才患有胃病，1934年10月，携家眷到杭州去度假休养，在他自建的秋水山庄休养一个多月，于11月13日，乘自备汽车离杭返沪。当汽车行进到海宁县境翁家埠大闸口附近时，突遇一辆车牌为“京字72号”的别克汽车停在路上，不得不减慢车速。临近时，六、七个着黑衣的人突然举枪向史的汽车射击，司机黄锦才当即毙命。史量才与夫人逃出汽车向野地奔跑。沈氏跌倒，史跑进一茅舍，适从后门逃出去时，被追上来的凶手打伤，勉强走到一个水塘边终于倒地，特务赶上，向他的头部连开两枪，遂惨死。同车有史氏的儿子史泳庚，拼命奔跑，得以逃脱。而他的一个朋友叫邓祖询的，因坐在司机旁边，被误认为史的保镖当场遇害。夫人沈秋水和她的一個侄女周小姐受伤。

事发之后，无人不知，这纯粹是一次蓄意谋杀案。蒋介石故作姿态，下令要浙江主席鲁涤平悬赏万元缉拿凶手，而凶手却始终不曾捉到。此事直到蒋介石撤离大陆后，其特务系统才有人道出内幕真相。原来，暗杀史量才是蒋介石亲自做出的决定，由特务头子戴笠组织实施。直接行动的负责人是赵理君。此人是军统华东区行动组组长，四川人，黄埔军校五期毕业。副组长王克全也参加了行动。另有李阿大、施云之、许建业及司机张秉午。李是主要杀手。

开始，他们曾策划在上海租界内史的住宅或申报附近行刺，为此曾打算在上述两处觅屋监视史的行踪。但房子一时没有租到合适的，他们又担心在租界行刺，万一凶手不及逃脱，事情就会败露。后来通过上海帮会关系，特务们结识了史的司机黄锦才，从他那里得知史量才去杭州度假的安排。先准备在秋水山庄行刺，但考虑到杭州警察局都在军统掌握下，在自己人管区内作此大案，事后将受到社会要求破案的巨大压力。遂决定在史量才返沪途中，离开杭州较远的地方行刺。最后确定的地点便是翁家埠大闸口附近。

史量才被害后，各界反应强烈。各团体纷纷要求政府当局必须缉拿真凶，迅速破案。许多报纸发表评论，谴责这次暗杀事件，并对史量才的志业人格表示高度的敬意。《新闻报》评论说，史氏之死，“非独舆论界失一中坚，社会柱石亦感缺乏”。《东南日报》评论说，史量才“不特足为我报界中人之榜范，即全国各界各业，亦应奉为楷模”。《晨报》评论说，史氏之死，“使社会失一最有力最有用之分子”。史量才创办的各补习学校师生，更是群情激奋，他们自动组织起来，为自己敬仰的量才先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沉痛表示要继承先生遗志，反对黑暗统治，迎接光明未来。

（责任编辑 林一成）

（上接42页）

介石政策的工作，对实权不再存非份之想。这恐怕也是他能够为蒋所容在考试院长职位上稳坐20年之久的原因吧。

戴季陶身居闲职越来越笃信佛教，几乎成了未出家的僧人。1938年4月，他曾代表国民政府去四川甘孜致祭五世班禅，与宗教界上层分子联络。1940年10月至12月，他访问缅甸、印度，拜谒佛教圣地，出席在印度召开的有16国代表参加的摩诃菩提会年会，并担任会议主席。研读佛教经典，崇信佛家思想，寻觅“空境”，练达

“不动”，冲淡了他内心深处的矛盾。心理上既然能够自觅平衡，活得也就“超脱”了。

1948年底，国民党的全国统治风雨飘摇。在宋子文安排下，戴季陶携家眷飞往广州。他身患多种疾病，尤其是神经痛症，往往折磨得他痛苦不堪，夜不能寐，常常靠服安眠药缓解痛苦。不管怎么说，这一天尽管死因不明他却彻底解脱了，终于带着自己的遗憾或者是满足，为自己划了一个扭曲的终止号。

（责任编辑 林一成）



他的身躯严重残疾：右半身瘫痪、左腿骨折；

他的艺术世界精彩纷呈，诙谐大度，美丽的仕女浓墨重彩，挥洒自如；

他坎坷的生活经历与艰难的艺术创造过程是一曲令人欲哭无泪、欲笑无声的二重奏。

他是江苏省著名人物画家傅小石，国画大师傅抱石先生的长子。人称“左笔奇才、画坛怪杰”。

一、金刚坡的故事

时光留不住，岁月追不回。历经坎坷的人再回首，童年该是一种怎样的愉悦、怎样的沉重呢？

小石的童年是在重庆郊区的金刚坡渡过的。那是中华民族艰难的8年抗战时期。也是傅抱石先生画风大变的时期。傅小石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写道：“金刚坡，层层山峦围绕着疏疏落落的村舍，到处是溪流、竹林和树丛，还有藏在深山里的幽静古寺。到了夏季，烟雾迷漫不辨东西，若遇山雨欲来、风起云涌时，



画家傅小石

父亲会停下正在做的事，在轰鸣的雷声中奔到附近的较高处，凝视滚滚翻腾的乌云、时隐时现的山峰和在狂风中乱舞的树丛，直到暴雨来临，才穿着湿漉漉的衣裳回到家里。“对我们兄妹来说，傍晚时分和父亲一同到室外散步，一边走一边听父亲说些有趣的事，确是无比的快乐。我们总是先穿过门前一片竹林，跨

过清澈的小溪，再沿着用石板铺成的路，经过一条有茶馆和酒店的小街，最后登上高处的盘山公路，在那里可以尽情地欣赏日落时的山区景色。在父亲的感染下，我们好象也陶醉在美好的大自然里了。”

就在傅抱石艰辛而又自信地创造他的辉煌的艺术世界的同时，傅小石也在创造他幻想中的色彩斑斓的世界：“我那时崇拜两个人，头一个是孙悟空，手持金箍棒在天上飞来飞去打坏人，多好啊！”那时的小石已能独自看书了，《西游记》、《封神榜》是他的精神世界，早晨醒来，两只手都是空握着，“手里拿的金箍棒呀！”半个世纪以后，小石谈起往事，还是兴致勃勃，童趣十足。不少孩子围在他周围，听他讲孙悟空的故事，讲着讲着，反正不管怎么编，他的听众总是确信无疑。这使小石从小就享受到幻想的乐趣。看了、讲了，还不过瘾，小石就拿起画笔将那些书中的形象画出来。

小石崇拜的第二个人是父亲，他认为父亲的画是最好的，“将来不能干别的，或许能象父亲一样画

画?”那时他就这样想。父亲作画时，小石常常是个好帮手。原来，傅抱石作画喜大笔淋漓，一气呵成，行笔迅猛如雷鸣电驰，行笔后往往需要迅速沾去浓墨或放在炉上烘烤定型。所以傅抱石作画常是闭门锁户，怕别人打扰，耽误瞬间，或许就废了多时的心血，不知的人还以为傅抱石保守，不给外人看怕学去绝活呢。

傅小石得天独厚，常给父亲吸墨、理纸，烘画：“快快！这里要烘。”傅小石便忙不迭和父亲一起扯画在炉上烘烤，尤其是画人物的脸部最为紧张，往往是画一笔就“快快！”

父亲这种有声有色、出神入化的艺术创造活动，对小石产生深刻的影响，傅小石现在以人物画为主，却偏喜泼墨，与傅老大气淋漓的创作气度和挥洒自如的创作气氛一脉相承。

小石的绘画才华这时已经显露，当时，他在极有威望的四维小学读书，校长就是新加坡归侨著名油画家司徒乔的夫人冯伊眉女士。和同学相比，小石似乎更早熟一些，在和他们纵情玩耍以后，小石越来越愿意一个人躲起来读书，书中的人物、爸爸故事中的人物，小石都爱用画画出来。

一次，有朋友来访傅抱石，正值抱石先生不在家，等傅抱石回家后，小石说不出来访者的名字，拉笔将来访者的形象画出，傅老看罢，哈哈大笑：“这小子将来比我强！”

一天，放学后，小石见庙前的榕树上捆着一个穿黑衣黑裤的汉奸。回家后，便偷了父亲的特大号笔和各种颜料，在同学家刚刚刷过的白墙上画了一幅大壁画：《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被砍的日本兵就是那个汉奸，不过给他穿上日本军服，挎上了东洋刀。大人回来，竟连声夸奖：“胆子挺大的，气魄比胆子还大！”

“邻居有个小朋友，眼睛大又亮，

有个红嘴巴，一肚子笑话。顶会讲傻瓜，他自己可不傻，他爱看书，又会画画，他天天来耍，从来不吵架。”

艺术圈的孩子，似乎早熟的多，司徒乔的女儿司徒圆便是其中之一，从4岁写诗，到10岁已数百首了。她和小石是两小无猜的好朋友，她诗中的这个“小朋友”就是傅小石。司徒圆的诗结集成《浪花集》作为“四维丛书”出版，插图者就是傅小石。几十张诗意插图，用笔洗练，颇见功力，使文化圈盛传起二位“神童”的故事。

金刚坡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只可惜这是小石60年生涯中唯一欢愉、无忧无虑的时期。金刚坡之后，命运之神将把这位绘画奇才带到哪里？

二、混沌少年

似乎，缪斯女神也在犹豫。从1946年抗战胜利回到南京到1953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小石进入混沌的反叛期，一个典型的叛逆少年形象。“我的崇拜对象变了，不崇拜孙悟空了，知道那是假的，而崇拜福尔摩斯。以前爸爸也讲过福尔摩斯的故事，我把形象画下来，是穿中国衣服的人，现在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艺术上认为父亲那套过时了，中国画不行，可谓是全盘西化，特别喜欢美国的电影、画报，欧洲的油画。”他在中央美术学院选择版画专业完全是因为不喜欢国画。直到1961年，他才重新领略国画的奥秘。

“中学时我不是个好学生，老师说我除了一样行，样样都不行。”小石，就像是到了画画才来到这个世间，除了画画，他的世界仿佛再无法容纳更多的东西。

三、风华正茂

1953年，小石考入中央美术学院，青年小石，生性活跃，瘦高的身材，大而亮的眼睛，加上幽默的谈吐，在学生中很有感染力。艺术王国的大门骤然打开，小石兴奋不已，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和汲取，竟然门门功课得优。不久，他当了班长，成了党的培养对象。二年级以后，小石选修版画，对苏联的列宾、谢洛夫、特别是杜宾斯基的插图、封面，佩服得五体投地。小石推崇绘画的真实感与色彩。“国画是纸，怎能表现真实，怎能使用丰富的色彩？”似乎，从版画中，他找到表现自己真实而又多彩的世界的渠道了。现在，作为国画家的小石，对艺术“真实”已有了不同的理解，而对色彩的执着却一如既往。“版画的色彩好，但为什么好，当时没能弄清楚，国画以前不重彩，如何用彩才更好，现在还没弄清，要是我还能活10年，一定要把这个弄清楚些。”老年的小石这样说。

彩色世界的大门刚刚打开，作为中央美术学院无可争议的高材生，小石深得老师的喜爱和同学的敬重。组织文体活动，带领下乡劳动、布置学生会工作，繁忙而又充实，青春勃发，才华毕露。只可惜，他还没来得及领略色彩世界的真谛，黑色世界就骤然降临。

四、厄运

厄运说来就来，几乎没有任何先兆，便无可辩驳地降临在傅小石头上。

1955年批胡风时，谈笑风生的傅小石压根没想到胡风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对胡风是不是反党他弄不清楚，也未加议论，只是和同学闲聊时谈到胡风的儿子胡小谷：“在四维小学时我经常向胡小谷借书看呢！他家的外国文学书真不少！”小石无心地侃侃而谈，不料有意者竟如临大敌。暑假返校后，兴致勃勃的小石

发现班干部、团支委干部、学生会干部在开会，他也想当然地前去。团支书说：“你不要去了，他们在谈他们的事。”小石起初并不在意，再过两天发现同学都不理他了，傅小石茫然不知所措，正纳闷间，隔离审查开始了。

“傅小石，你和胡风是什么关系？”

“我和他没关系，不过向他儿子借过书。”

“胡风是反革命，你要交待和他的事情。”

一个月审查，光屁股孩子之间的事到底也没查出什么反革命的蛛丝马迹。小石又“自由”了。“我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在同学们的眼中，他仍然是一个挂上号的危险人物，没人搭理。他自己则陷入深深的迷惘之中：怎么会对青年人这个样子？

好读书的习惯使小石的灵魂得到了解脱，半年时间，小石一有空就去书市，阅读了大量社会学、政治学的书籍，小石的政治见解越来越与当时社会氛围格格不入了，不少同学又悄悄聚到他的周围。1957年2月，“大鸣大放”开始，但小石私下断言：“这是假的，目前中国社会的民主还不到这一步，谁提意见谁倒霉，至于我，不提意见也要倒霉。”

7月，山雨欲来，傅抱石访东欧回到北京，刚从大连实习归来的傅小石到机场迎接，晚上，又和几位朋友一起赴和平饭店拜望。似乎，傅老预感到了什么，望着清瘦的傅小石，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都选择了绘画，要把它作为终生的事业奋斗啊！”小石深深地点着头，有千言万语要讲，又一句话都没开口。他不忍心让父亲失望，他知道，自己很快就要给父亲带去痛苦和耻辱。

中央美术学院平地出了许多右派，最著名的是院长兼画家江丰和学生中的高材生傅小石。

几年以后，江丰与傅抱石相见，



“文革”前傅抱石(前右)与傅小石(后右三)等的全家福合影

两位老友相对无言良久：“我对不起你呀，你把小石交给我，我没带好他。”“是我教子无方呀！”除了自责，他们还能有什么呢。打倒四人帮以后，江丰摘了右派的帽子，复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问及傅小石为何还是右派，回答说：“别人能摘他不能摘，他是真的。”

“有什么证据？”“他的言论。”

“他有行动吗？”“没有。”

“没有行动，不过是学生说说话，错了也算不得右派！”在江丰的力主下，小石才得以平反。

1961年，傅抱石通过许多朋友帮忙，将傅小石弄回江苏“研究”，安排在省国画院劳动改造。

从那时起，傅小石开始对中国画产生了新的认识，正式踏入国画艺术的殿堂——地狱之门洞开了。

迎面是一棵金光闪烁的爱情树。

五、地狱之门

艺术殿堂是辉煌迷人的，而献身艺术的人又必须耗尽所有的心智才能有所收获，难怪有人说：投身艺术就等于踏进了地狱之门；

爱情之树灿烂辉煌，而追求爱

情、占有爱情的人又必须遍尝其中的酸甜苦辣之果。

1960年，不论是绘画还是个人生活，都是傅小石的转折点。

傅小石在江苏国画院所在地南京中山陵藏经楼劳动改造，压抑的生活使他愈发瘦削苍白，蓬乱的头发使那双因剧烈的精神活动而愈加外凸的大眼睛更加摄人心魄。

打水、扫地、装车，跑上跑下劳作不息；沉默、专注、双目炯炯。一有空就拿个本子练画。

这使青年女子王汝瑜触目惊心，“这样的人怎么会是反革命？”她用女性特有胸怀默默地关注着这位孤单的年青人。

落叶缤纷，落叶缤纷。傅小石早晨在空旷的藏经楼大院扫落叶，感慨良多。“哗——”“哗——”似乎听到了另外的扫落叶声，“哗——”“哗——”“哗——”扫到了墙角。傅小石与王汝瑜相遇了，傅小石才知道最近不少自己的活是被她偷偷地干了。

“你……？”

“你……！”

“……我给你画张像！”似乎一切都是等待很久的了。两颗年轻的心瞬间溶化，爱情的双桅船开始了风雨飘摇。

傅小石与王汝瑜结合,过了两年压抑却相对平静的生活,小石潜心研究国画,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任伯年、陈老莲、唐伯虎一一潜心临摹,若有所悟,再回过头看父亲的山水觉得它轻松大度,画人物也应学这种气度啊!小石心中想,而对中国画的写意性、表现自我情感的优越性开始领悟:“我当时最推崇的梁楷的《泼墨仙人图》,痛快淋漓,所画的仙人幽默、快活。”

中国画一向重笔墨、重线条,尤其是人物画,线描多,块面少。学过版画,对块面、色彩挚爱的傅小石,从梁楷一幅古画中极少出现的泼墨人物中得到启发,经过多年实践后,终于创造出“没骨人物画法”。

1964年,社教运动开始了,小石被下放劳动,与陆文夫、李山、黄养辉等人在一起,接受肉体与灵魂的再改造。一天,正参加政治学习的小石,被国画院的工友叫出:“回去有事。”工友直接把小石带至内桥殡仪馆,原来,父亲已脑溢血去世。谈笑风生的一代大师,再也没有一句话,也未曾留下一句话。小石悲痛欲绝。

20年以后,小石、二石兄弟俩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写道:“父亲死得多么及时,使他免遭了‘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劫难与凌辱。”

更大的政治风暴来临了,长期的政治压抑训练了小石敏感的政治嗅觉。每次政治学习,小石都带着笔记本,给人画像,画得怪乎乎,令人窃笑。有一次正在学习“林副统帅”的文章,小石撕下一页笔记,重重地写道:“这是一场大的政治骗局!”递给坐在一旁的李山看,李山看罢惊悚地看了他一眼:“你不要命啦!”,连忙撕碎。

他知道父亲躲得过而他自己躲不过。

风声愈来愈紧,父亲作为“资产阶级权威”、“反革命”,前后被抄家30多次。母亲心急如焚:父亲留下

的画可是国家的财富啊!小石悄悄从母亲手中接过父亲的400幅遗作,分三次偷偷带回自己简陋的湖北路住所,连夜和王汝瑜抽掉木柚,剪去装裱,藏在两只旅行包内,塞入堆放杂物的楼阁。不久,简陋的住所也不安全了,小石和王汝瑜又冒着生命危险,把这批画转到朋友家,转到亲戚家。后因小石要下乡改造,才将画交还给母亲。

六、炼狱之火

1970年春节,小石从泗洪农村回家过年,节后离去,一走就再无消息。王汝瑜感到不妙,连忙四处打听,一俟得知小石在镇江高资干校隔离审查,便不顾死活地前去探望。此行正如飞蛾扑火,王汝瑜连同女儿一道被关进蚕室的楼阁,逼她交待傅小石的反革命罪行。可怜女儿小小年纪也跟着他们受尽折磨和凌辱,一家人近在咫尺却无法相见。

半年以后,傅小石被宣判,以“企图携画叛国投敌”罪判10年徒刑,押赴劳改农场。王汝瑜带着骨瘦如柴的女儿回家。家中废品收购站似的被抄了个底朝天,楼阁上傅小石的大批画稿、墨砚、书籍,抽屉的工资、粮票全没有了。

失去亲人、失去工作的王汝瑜度日如年,而沉入炼狱中的傅小石反倒从容镇静。他惊喜地发现,狱中是观察人生的绝好视点:“犯人之间还有什么好隐瞒的呢。”每个人都带着奇特的经历来到这里,形象鲜明、性格突出。白天的劳动是艰苦的,空洞漫长的夜晚愈加难熬。有时管理人员不在,犯人就天南地北地扯起来,以此打发心中的孤寂。“讲你的经历!讲你的故事!讲女人!”犯人们的无遮无拦,给傅小石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小石听着,就在心中想着如何去画故事中的人物。那些会讲故事的人,关键时刻忽然冒出一句话:

“饿了,睡觉!”小石忙不迭地把王汝瑜送来的东西递过去:“讲,讲。”

这里也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能讲故事的犯人高人一等,饭有人盛、水有人打。有时个别管理人员也来听,听得开心了,明天赏他个轻活干。

画画是不可能了,然而心中的画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宏伟。小石从垃圾堆捡到一块小镜片,如获至宝,难得有空的时候,就照着镜子画自画像。他的弟弟傅二石回忆道:“自画像在破纸上画的,不过确是很精彩,画出了他的痛苦与孤傲,我再也赶不上他了!”小石难得有一封家信寄回,却是要书,谈他绘画上想到什么,对个人的生活只字不提。傅二石说印象最深的是他要图案设计书,他写信说他找到了盐碱地的美,如何如何画。“叫我永生难忘的是他出狱的那天晚上,突然敲门进来,一幅活脱脱的《意外归来》图:旧帽盖在头顶,破黑大衣披着,人很瘦,两只眼睛又白又亮……”“我想到了一种新的人物画法……”没进门傅小石就谈他的艺术构想、他的没骨人物画法。弟弟妹妹被他吸引着,母亲也被他吸引着。直到深夜,“保外就医”的犯人傅小石起身离去,只字没提7年的监狱生活。

傅小石的世界是完全的艺术世界,“我喜欢那些真实的、幽默的事”。他不让痛苦的事进入艺术世界,他对纠缠他多年的坎坷与不幸一向不屑一顾。

1973年,小石在劳动中摔断了左腿,狱中的医疗条件差,骨折对接后,使他的左腿短了一截,住了四个月的医院后,他跛着脚回到猪舍劳动。

一次,一位场员家属来探亲,进了农场后被人强奸致死扔到河塘里,一星期后才被发现,已腐烂没有人形。领导把傅小石叫到办公室:

“听说你会画画,画人能画象吗?”



傅小石和王世瑜在画室中

层次的画集中出现。

此时，新加坡正筹办《傅氏兄妹画展》。

似乎一切都在慢慢地解冻、慢慢走上正轨，小石庆幸着：春天快要到了，春天快要到了。1979年2月，48岁的傅小石在寒风中沉重而又充满希望地企盼着、等待着、创造着。

2月3日上午，小石正在母亲家中作画，北京来了朋友，告诉他中央美术学院要给“右派”平反了，小石听了异常高兴，几十年的冤案就要昭雪了！小石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他真想大哭一场，他真想大喊一阵，可他什么也没做，就中风倒下了！

家人连忙将他送至鼓楼医院，专家检查后说：“没有希望了，脑溢血。”

妹妹傅益瑶不甘心，跳到马路上拦下一部汽车，又把哥哥拉到工人医院，她找到脑外科手术权威侯镜高说：“我哥哥很有才华，能画好画来，求您救救他！”侯医生没来得及吃晚饭就上了手术台，7个小时后，在手术室门口的长凳上等了一夜的王汝瑜和傅二石看到疲惫不堪的医生从手术室里走出来，问也不敢问一声，直到侯医生艰难地从嘴角上挤出一丝微笑，大家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小石昏迷了很长时间，醒来时发现自己的右半身完全不听使唤了。“我不能画画了。”小石痛苦不堪。“试试你的左手”，妻子带来钢笔、速写本。“小石”，他写了两个歪歪斜斜的字。“给你画张速写试试。”妻子坐在他的病床旁。她真害怕他画不好而丧失信心，半小时后，王汝瑜走到小石跟前，看到小学生一样的速写，忙笑道：“真有点像呢，蛮像的！”

9月份出院，11月小石应邀参加了鼓楼公园的《未名画展》，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正式画展。小石参展

代，傅小石经省长惠浴宇批准，被“保外就医”。

处在半自由状态的傅小石，每天躲在母亲家里疯狂地作画，他的想法太多了，而实践机会实在太少，狱中所写的4万字的《图案设计新探》再也无暇顾及。理论的世界到底不是傅小石的世界。

一年时间，傅小石画了100多幅画，由于不能公开作画，因此都签着“傅益筠”的名字。此时，傅小石的右笔画虽说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但清新、秀美、工整，深得一些人的喜爱。扬州工艺厂经过马千里介绍每月来购他10张画，每张3元钱，小石夫妇非常开心，一是画有人买证明画得还可以，二是每月私下有30元的固定收入解决了生活的大问题。不久，北京“宝古斋”印了一本画册，收入“傅益筠”的《二娇戏鱼》，夫妻二人又高兴一场，这是小石的第一张国画印刷品啊，又在那样高

“能。”

“没见过能画象吗？”

“能。”

“这是鞋子、这是衣服。按原大画。”见到过妇女的看门人大致描述了印象，小石画出后，农场用画像找到了死者的家属。

喂猪是美差，闲暇时间多，又能吃饱饭，反正你吃猪食别人看不见，猪也不抗议。这段时间傅小石迷上了图案设计。一门心思构想着图案新的构成法则。

谈起监狱里人和事，傅小石如数家珍，津津乐道，故事多的让人吃惊。

在这群性情特异的人物当中，傅小石真是着谜入魔：“美术学院里学不到这些啊，我要画这些人物，画出幽默感来，以前手不行，现在刚刚具备了画这些人的能力。”60岁的傅小石这样说。

1979年11月，拨乱反正的年

的13幅右笔画和2幅左笔画。南京的观众至今仍印象深刻。右笔代表作《黛玉葬花》、《李白醉酒》、《琵琶行》和左笔作品《美髯公朱仝》、《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等，各具神韵，紧紧抓住了观众的心。

至此一发而不可收，小石的事业开始踏上通向胜利的坦途。虽然他的四肢只剩下一只左手完好，并且有语言障碍，但他的创作热情和毅力却使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七、扬帆

左笔作画，使小石画风大改。右笔的精细、工整是办不到了，而左笔的涩重、奇幻更具一种挥洒自如的气度和出其不意的效果。“泼墨没骨人物画”因祸得福，一跃成为小石独具一格的画风。

1982年，小石、二石兄弟画展在江苏省美术馆开幕，他长期构思创作的几十幅作品受到一致好评，关心他的老省长第一个到场，给了他极大的鼓舞。1983年，兄弟二人又赴香港办画展，林风眠、刘国松等艺术家看后都给予很高评价。

小石中风后一直不能外出写生，1983年5月，扬州马千里邀小石赴扬州办画展，小石欣喜若狂，去扬州的路上，在颠簸的汽车里就画个不停。一切都是那样新鲜，一切都是那样美好，小石似乎又回到50年代。刚到扬州个园，小石迫不及待地走到一旁去画速写，妻子转眼不见了他，急得直跳——中风以后，小石可从未离开妻子一步呀！

艺术的使命感，生命的紧迫感时刻煎熬着小石：“只剩了一只左手，不知还能活多久。”小石经常说：“别人5年上完大学，我20年才上完；别人40岁有所成就了，我60岁画左笔才刚能表现我想画的内容。”

1987年，小石赴北京举办个人画展。当年的老师，同学都来了，他们既惊异于昔日的高材生如今只剩下一只左手，又惊异于这一只左手竟能创造出如此多彩迷人的艺术世界。

画界震动了。这以后，通过各种渠道购画、索画的人络绎不绝，仅台湾就有5个地方举办了傅小石画展。

1990年，小石、二石赴新加坡

办画展，引起空前的轰动；1991年，小石又在江苏省美术馆举办了个人画展，这是他60周岁的纪念，也是10年左笔的回顾。“经过10年磨练，画人物画，应该说，我的能力刚刚开始。”小石谦虚地总结。然而，艺术界、评论界几乎众口一词，认为出乎意料的精彩。大家说：“小石的重彩人体画，进入了国画人体画的阶段。”

60岁以后的傅小石正在潜心开创一个新的时期，他准备画大画，画组画，风格上从重彩回归墨色：《父亲的一生》、《监狱人物》是他正在构思的两组人物。

国泰民安，小石生命之舟驶入风平浪静的港湾，艺术的风帆正高扬着……

最近，小石在妻子的陪同下，出访澳大利亚、美国、日本并过境香港，举办个人画展。他的绘画艺术在国内外受到极高评价。而小石自己却如饥似渴地重新开始了寻觅和探求，他要不断丰富自己，以求再次找到突破自己的契机。

(责任编辑 张蕾)

1929年冬，国民党元老居正在上海联络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反蒋，不料为熊出卖，被诱捕于上海丰林桥畔。蒋介石曾密令将居正就地处决，熊未照办，而将居正押解至第五师看守所。这年12月20日，居正由龙华寺转押南京三元巷总司令部军法处，经军法司长许可，先在汤山周必由巷，后迁蓝家庄“别幽居”。前后尚有警官、侦探看守，不许居出门。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居正才迁回上海宝山杨行狮吼庵本宅。

居正受此深刻刺激，更笃信佛学，常年深蓝色长衫、布鞋、白竹布袜。他还将房屋重修一番，大门上题“梅川别墅”四字，并以“梅川居士”自号。大门两旁自撰联句：

南面王无与易也；

大丈夫当如是乎。

居正攻佛学，不冥思孤索，追求甚解，而在通晓大义。他在《学佛修养及健康实验法》一文序言中写道：

“佛学者，人人熟念，一卷心经，往往警过其中要义观

自在菩萨告舍利子言，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明明指出一长列境界，教人去观照，去体行，人都摸糊过去。须知学佛到此，方有一究竟处，岂可忽乎哉！缘凡夫之心，取著于相，所以起生灭垢净增减种种妄见。若心不著相，虽眼前万法森然，不取不著，自然不见有生相，也不见有灭相，更不见有垢净增减之相，忆季陶入世观一文，谓舍己为群，原为佛学绝我而不绝世之精神，被流行滥用，因而理没真义。但持此态度最显明者，唯有释迦牟尼，其一生皆以出世之精神，作入世之事业，佛教降至末流，祇能绝世，而不能绝我，亦即不能为群，复不能舍己，与释迦牟尼恰相背驰。

此为释迦牟尼所不及料者。然而古今不少哲人、宗教家、革命家，如墨子、如耶稣、如甘地，皆为舍己出发至为群之路。

在《己丑角题肖像》诗中，他还写道：

现身想像空无我， 认影连头过在谁；

一念不生全体现， 六根才动六尘随。

居正一生，即以佛家“相即”、“舍己为群”为处世宗旨。

居正学佛

刘作忠

★八一 今日中国

陆军“窗口”

中国有一支令世界瞩目的人民军队。

南京紫金山麓，驻扎着享誉中外的“临汾旅”。战争年代，他们是徐向前元帅指挥下的英雄劲旅。今天，当邓小平有力的巨手推开中华国门之时，这支英雄部队伴随着祖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成为今日中国陆军的“窗口”，肩负起特殊的使命。

“让我们走向世界，让世界看清我们”。官兵们用中国军人震撼大地的前进脚步和威武英姿，成功地为86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首脑、军事代表团作了200多场次军事表演，荣获各种外国勋章800多枚。他们在不是战场却酷似战场的迎外表演场上，填写着一份份出色答卷。

美国五角大楼陆军部的约翰斯少将专程来考察昔日朝鲜战场上的对手，结果他遗憾地发现，自己犯了和麦克阿瑟将军同样的错误

英国战略情报研究所的情报资料表明，中国军队的装备比西方发达国家军队的装备，落后至少20年。他们断言，装备急需更新的中国军队，是不会有很强战斗力的。然而，临汾旅官兵却让西方军事专家们开了眼界。

风雨交加。加拿大国防军参谋长曼森中将意外地提出，参观访问计划不变。战争是全天候的。一走下轿车，将军的蓝眼睛亮了，锃亮的铜管在雨中奏起了嘹亮的《迎宾曲》，激昂的旋律盖过了风声、雨声。透过蒙蒙的雨柱，将军眼前的中国军人象一排排挺立的雕塑，任凭风吹雨打，没有人晃动，没有人眨眼……曼森将军激动地走出雨伞下，庄严地向中国军人敬礼。将军的留言是这样写的：你们是一支训练有素的英雄军队。

烈日当空。高速行驶的坦克呼啸而来，腾起滚滚尘土。两辆摩托车越过堑壕，风驰电掣般追了上来，4名身着迷彩服的侦察兵，在靠近坦克的一刹那腾空而起，一齐跃上坦克。快速敏捷的登车绝技，激起坐在看台上的匈牙利人民军总参谋长

约瑟夫·鲍契克中将其随行人员一阵掌声。坦克继续高速行驶，炮塔360度旋转，机枪吐着火舌。一场扣人心弦的搏斗竟在高速行驶的坦克上展开：前扑后倒，左翻右滚……气势汹汹的坦克终于被神勇的侦察兵制服，看台上响起更加热烈的掌声。“你们有勇有胆，有智有谋，今天看到的将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一幕。”鲍契克中将紧紧握住4名风尘扑扑的侦察兵的手。

紧急关头。秦连仿，这位27岁的中尉排长，身高只有一米六八，一次表演，对手一枪刺来，他闪躲不及，便侧身就势挟住枪，大喝一声，竟将枪断为两截。外军将领们无不骇然。因从未见过这样“令人可怕”的场面，纷纷询问这是一种什么训练方法。原来这是将中国硬气功和步兵基础军事技能融为一体。24名士兵，被誉为“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勇士”，个个有飞墙走壁，头碎酒瓶，手指断砖的功夫。

一次，美国五角大楼陆军部训练局局长约翰斯少将来华，指名要到临汾旅考察。他知道，在朝鲜战场上，这是一支令美国人头痛的强劲

对手。

半自动步枪精度射击，一兵多能射击，轻机枪对抗射击，轻武器速度射击，卧姿、立姿、跑步；运动目标、瞬间目标、隐蔽目标……武器在中国士兵的手中发出欢畅的脆响，靶子一个个树起，又一个个应声倒下。长期研究作战训练的约翰斯将军挑剔的目光变得严肃和凝重起来。他想起了朝鲜战场美军指挥官麦克阿瑟五星上将，曾经奚落中国军队为“只会钻山沟的土八路”。结果使美军在战场上吃尽苦头。而今天，他似乎也犯了和麦克阿瑟将军同样的错误——低估了中国军队的素质。

枪声乍停。约翰斯从回忆中惊醒。射手王继胜送上了4秒钟内20发子弹全部命中的胸环靶。约翰斯一数，194环！“打得非常好！”他掏出金笔，在靶子上题了这么一句，并签上自己的名字。在检阅部队时，约翰斯直赞叹：“步兵是战场的女王，是整个陆军的精华。你们的表演，令我大饱眼福。”

英国军人是骄傲的， 但“大不列颠第一枪”在看了 “中国枪王”的精湛表演 之后，便闭口不言了

自从1908年黑西奇孟德拉刚将军最早研究一种自动步枪试用军队以来，枪的演变，就成了追求射击精度和速度的历史。当今，尽管新式武器层出不穷，但手执“七斤半”的步兵们追求的依然是百步穿杨，弹无虚发。

“砰砰”，两颗绿色信号弹腾空而起。10名射手跑步进入阵地。随着一声“射击”口令，清脆的子弹便划破了靶场的沉寂。射手以不同姿式，对不同目标进行快速射击。接着，手枪、冲锋枪、班用机枪、重机枪……几乎所有类型的枪都用遍了，



敏捷熟练的动作伴随着子弹不停地呼啸。

结果怎样？

端坐在参观台上的罗马尼亚国防部长康斯坦丁·奥尔泰亚上将，通过高倍望远镜清晰地看到，从射手们枪口呼啸而出的子弹，准确无误地在一个个靶子中心刺出“梅花形”的花朵！“真了不起，中国士兵了不起！”他情不自禁地向所有射手授予“罗马尼亚英雄战士勋章”。

相比之下，英国军人则显得有些骄傲了。一位被誉为“大不列颠第一枪”的英军中将，在观看中国士兵的射击时，却表现出一种漫不经心。

大雨把午时的山谷笼罩成黄昏一般阴暗。场地的泥泞和零星的雨点，增加了射击难度。但见一名军人燕子般在谷地中前进，随着抑扬顿挫的爆响，散落在斜坡上的几组目标尽数消灭。在冲向最后一组目标时，一股旋风突然贴着山脊俯冲而下，靶子晃了两晃，眼看着就要倒下，就在这一瞬间，上尉手中的枪响了，靶子应声击中，参观台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英军中将仿佛被掌声惊醒，连忙问：“这是谁？”“童，中国枪王。”翻译介绍的童，就是被西方军界誉为“中国枪王”的一名年轻上尉连长，他叫童裳显。

英军中将的惊讶还未消失，又一组枪手上场。他们都是童裳显的

部下，来自同一个连队，各有绝招。有个黑黑的战士叫邢军舰。刚来连队时，一听枪响，手就发抖，脑袋发蒙。他曾对连长童裳显说：“我不当兵了，把我退掉吧！”童裳显却分配他去杀猪。他被逼得没法，只好硬着头皮杀猪屁股。杀得猪乱跑。十几头猪杀下来，屠宰技术长进不大，胆子却练壮了。“要成为一名好射手，还必须练就眼功、手功和心功，功到自然成”。他牢记连长的话，每天在两米外放一枚硬币大的扣子，死死盯住，一盯就是半小时，成了全连有名的“枪迷”。如今，他在12秒内用冲锋枪点射20发子弹，竟枪枪八九不离十。当他打的靶子送到看台上时，博得了交口称赞。因为即使用光学瞄准镜操作射击，也难以达到这样的射击精度！

“你练射击多长时间了？”表演结束时，“大不列颠第一枪”与“中国枪王”进行了简短的交谈。

童裳显答：“15年。”

对方点头。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你追求的目标是什么？”

“我的远期目标，是在未来战场上准确迅速地消灭敌人；近期目标，是培养一批又一批的神射手。”

对方闭口不言了，只是紧紧握住童裳显的手。这时，从“中国枪王”的背后，“童”的部队正迈着整齐雄壮的步伐，唱着战歌走来：“我们都

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一位来自中东的军事专家断言：伊拉克军队能有中国军队的勇敢精神和战斗意志，海湾战争的历史也许就要重写

中国军队的战术训练是在真枪实弹下进行的，旨在近似实战的条件下，培养军人的勇敢精神和高超技能。这使外国军界感到不可思议：“炸药炸到人怎么办？”“子弹伤过人吗？”十几年来，临汾旅官兵的表演和训练次次成功，无一伤亡。

中国军队的勇敢举世公认。

五连连长顾伟存，被誉为“军中武状元”。这，除了他有过硬的军事技术外，还在于他有一股压倒一切敌人的“硬汉子气”。一次迎外表演，顾伟存指挥一个班进行班进攻表演。一座陡峭的山坡横亘在面前，他好不容易揽住一颗小树攀到陡坡上面，突然，“咔嚓”一声，树枝断了。他跌进了几米深的坑里。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猛地一个翻身，像一只灵巧的豹子，从深坑中腾身跃出，敏捷地攀登上坡，又跃过独木桥，把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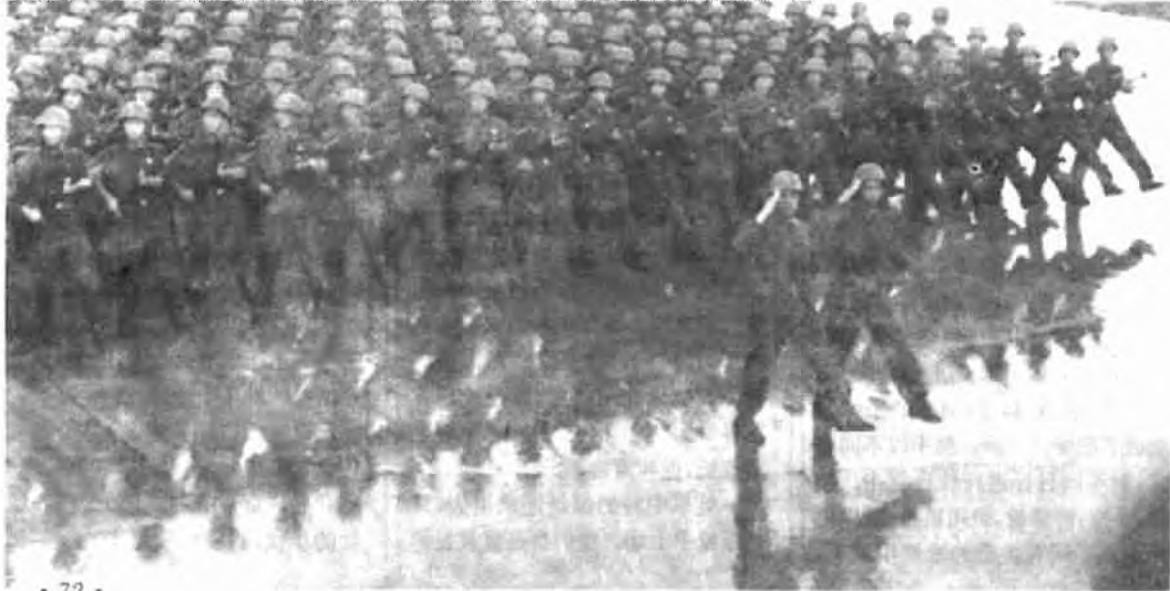
的标杆插上了山顶。还有一次更为惊险。表演中，局部风向逆转，炸药腾起的烟幕太大。重机枪射手为了掩护步兵冲击，正在对敌人进行压制射击，但却看不清进攻士兵的出发位置，结果把我方攻击的道路封锁了。顾伟存和士兵们被困在一个洼地里，过不去就意味着“进攻失败”。极为镇定的顾伟存，抢在枪手更换弹链的瞬间，突然跃出洼地，以闪电般的速度越过封锁地。当美国陆军参谋长从望远镜中目睹这一幕后，连连赞叹：“OK！OK！真是不可思议！”“中国军人勇敢，不怕死！”他知道，美军训练通常使用模拟器材，平时动真家伙，美国大兵是不干的。

勇敢精神来源于平时艰苦超常的科学训练。就是这个顾伟存，平时给自己下达了“五个一百”的硬指标，即：端枪瞄准、投弹挥臂、引体向上、蹲下起立和收肌练腹一百次。为了加大训练力度，他使用爆破筒代替木枪跑障碍，使用铁丝代替背包绳练投弹挥臂，胳膊累得连吃饭都端不起碗。他把沙衣打湿，绑4公斤重的沙袋练长跑。练战术基础动作，有时练得两肘磨破，血同衣服沾在一起，不得不用剪刀帮忙才能脱下衣服。白天太累了，夜里睡不着觉，跪着睡过，趴着睡过，半倚在墙上睡

过。一次训练，他的一颗牙齿在木枪对刺时被对方刺断，他咬了团棉花又扑了上去。他一年加发四套训练服还是练破磨烂了，星期天躲在宿舍里不好意思上街。几年来，他先后参加师以上部队组织的军事比武21次，获金牌34块，为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作过80余场军事表演，荣获罗马尼亚英雄战士勋章、朝鲜人民军勇士勋章、美国骑士勋章等28枚，荣立4次三等功，25次受嘉奖。

“一品脱的汗水可挽救一加仑的鲜血。”美国巴顿将军的名言和他所倡导的训练价值观，却在中国军人的身上得到了体现。

一场以抗饥饿、抗疲劳的野外生存训练拉开了序幕。闻名全军的“武状元班”战士不带食物和饮水，却要象美国电影《第一滴血》中的兰博一样，在山林莽莽草深藤绕，谷深坡陡人烟稀少的山地里，走、打、吃、住、藏。当暮霭融入夜幕后，到处是黑森森的仿佛掉进无边无际的黑海。两天两夜了，士兵们捕食鸟兽充饥，采摘野果解渴。夜阑人静，狼的嗥叫，狗的吠声，鼠的奔窜，蛇的骚扰，不时地袭来，饥饿、疲劳、虫咬、蚊叮威胁着他们。就这样“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战士们练





就了顽强的斗志和毅力。

临汾旅当然不止一个武状元，也不止一个“武状元班”。进入90年代以来，就涌现训练标兵、技术尖子1280多名。

一位来自中东的阿拉伯军事专家，考察了临汾旅训练之后发表文章断言：要是伊拉克军队能有中国军队这样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战斗意志和高昂士气，海湾战争的历史也许就要重写。

当然，这样的断言也许有失偏颇。但是军人的勇敢精神和精湛技能，确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

西方军界反复研究了中国军队的战略战术，却无法准确估量他的战斗力。在“蓝眼睛”的困惑中，闪烁着中国军人的自豪

西方军界对中国军队的战略战术可谓了如指掌。但却无法准确估量她的战斗力，因为其中有许多“难以捉摸的因素。”

让我们还是透过中国陆军的“窗口”，看看“蓝眼睛”的困惑吧。

“你们的士兵是什么文化程度？”当得知60%的士兵文化程度是高中、40%是初中时，美国将军耸肩摇头了。然而，他们在参观了两用

人才培训中心和士兵们的实际操作演练后，惊奇地发现，文凭，无法估量中国军人的素质。“你们的训练和继续教育搞得很好。”美国将军点头了。

“你们军人生活如此艰苦，能忍受吗？”即使在一些乞丐满街跑的第三世界国家里，军人却享受着优裕的生活待遇。当一位英国记者得知战士陈永明家有三千万元资产，叔叔在英国一家公司当老板时，便追踪采访：“你为什么当兵？”“尽一个公民的义务！”“当兵很艰苦，你乐意吃苦吗？”“很乐意，我是在尽军人的职责。”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主持人华莱士，经过4天的采访，得出这样的结论：“中

国士兵不但精通军事，而且个个很有政治头脑，富有牺牲精神”。

“你们的战士周末可以上酒吧和女人跳舞吗？”用西方价值标准衡量，中国军人过的是“清教徒式的生活”。一位扎伊尔武官直言不讳：“世界上不玩女人的军队，恐怕只有中国了。”但是中国军人的感情世界却是丰富的，有自己的娱乐方式。文化活动中心里，台球、乒乓球、桌球、扑克、卡拉OK机应有尽有，图书、杂志琳琅满目。这天日本代表团来访，随访一位业余四段日本记者听说40%的战士会下围棋，一时来了兴趣，便拉住一名战士“手谈”，不料却输了。他哪里知道，这位战士怀里也揣着业余四段棋手的证书哩！

在蓝眼睛的困惑中，闪烁着临汾旅官兵的自豪。但是，追求者的脚步是永远不会“稍息”的。正如部队长王永怀、政委孙长和所讲的那样：我们是按照军委江泽民主席“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五句话全面建设部队的。这不正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吗？

推开窗户，改革开放的春风舒展着鲜红的“八一”军旗，中国军人正以威武雄壮的步伐走向世界……

(责任编辑 陈贻林)



(本文照片：王新民、陶宇银、孙瀚宇摄影)



都市新画商发迹记

○李程骅

缪斯女神营造的艺术殿堂，高雅而又圣洁，似乎和充满利欲的商品交易水火不容。然而，在当今世界，艺术商品化却又是无法回避的事实。社会经济越发达，艺术品的价格越高，已在现实社会中形成了规律。艺术，在净化人类灵魂的同时，又给艺术交易者和创造者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物质财富。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受世界艺术商品化浪潮的冲击愈来愈大，在艺术人才集中和商品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形成了或明或暗的艺术交易市场。那些××画廊、××轩、××斋的背后，一批看上去并不显山露水的“倒画儿爷”（或曰经纪人）异常活跃，有的甚至在短时间内靠此“暴发”起来，成为国内艺术市场中的主角。笔者近年结识了其中几位“新画商”，窥探到他们一些经营的诀窍，在此披露出来，相信会使人们领略到市场经济大潮中新画商们的众生相。

1. 宇：步入“画境”的“大腕”

当宇衣着朴素，戴着玳瑁眼镜，梳着一边倒头发，不紧不慢与你交谈时，你准以为碰上了个小学教师或什么单位的守门人。不料，那褪了色的牛仔包里竟发出“唧”、“唧”“大哥大”的鸣叫声。“王兄吗？我明天下午四点的飞机，你一定给我把那人稳住。什么？大名头的，要30万？好，30万就30万，我带现款去，只要是对的，值得！”瞧他那春风得意的样儿，你会猛然意识到，撞上大腕了。不错，宇的确是“倒画”大腕，不到五年，他的收入已超过百万。

宇原来是一个机要部门秘书，闲暇之余续起大学时代的作家梦。在饱尝了熬夜的劳累、退稿的酸楚、领导的“敬业教育”后，他进了肝炎病房。又拖着软绵绵的脚走出医院。他索性泡起了长病假。

赋闲中，宇来到在沪上的姨父

家。这姨父在一家文物商店当经理，看他无聊，便带他到店里帮忙。宇很快就被那些琳琅满目的书画精品震慑住了，有意识地听店里的老师傅讲那些画的年代、社会背景、艺术技巧以及画家的奇闻趣事，自告奋勇到外地去收画送画，天长日久结识了不少海内外收藏家和画商，渐渐地迈进了艺术交易的圈子。

一年病假到期，宇向姨父托出辞去公职搞书画经营的决定时，他的姨父连连摇头：“字画经营不容易啊！首先要靠眼光。真品价值千金，贗品废纸一张。你是自己拿钱经营，不像文物部门养的鉴定专家，看一次收300元的鉴定费，要么顺着你的意思说，要么模棱两可没个明确说法，反正东西不是他自己买。其次是要摸透行情，行情看透，事半功倍，盲人瞎马，事倍功半，甚至全赔。同样一张画，你卖五千没人买，我卖一万却会争购。艺术市场是大进大出的交易，风云变幻呵！”宇，坚信自

己会成功,带着东借西挪的五万块钱毅然“下海”。

宇先来到早就摸清底细的某古镇小学校长家。名门之后的老校长,家藏名画甚多。见了面,老校长关紧门窗,从里屋拿出一大捆发黄的纸卷,共有56幅旧画。宇一一细品,觉得其中有真有假,但老校长坚持要买就一起拿走。宇舍不得错过这次机会,紧张极了,刚报价五千元,老校长就说他开玩笑;一万元。老校长说把他当叫化子。你来我往一直报到四万八,老校长还是不松口。天渐渐晚了,宇坚持不住,起身欲走。正在这时,从里屋冲出一老太婆,指着老校长的鼻子:“你这个老穷鬼,一辈子只知道吃粉笔灰,四万八还不卖!”形势急转直下,迅速成交。宇匆匆回到旅馆,拿出随身携带的《中国美术家大辞典》一一核对,发现个个书上有名,内心狂喜:首炮开门红,按时下的行情,最起码赚十万。

第二天,宇赶到上海,请姨父店里的老先生鉴定:只有两张是对的,其余全是错的。所幸的是这些赝品是半个世纪之前的画家仿作的,他全部卖给香港来的两位画商,捞回了五万块,总算没有亏本。

有了这次不算失败的经历,宇确实认识到“眼光”的重要,便花了二千多块,买了几十种有关书画鉴定的书籍,虚心求教以往结识的收藏家。数月后,他的书画鉴赏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对任何一幅美术作品,宇都能从它的用笔用墨、纸质、印章、神韵等几个方面断定其等级,特别是对清朝以后的名家书画,更是了如指掌、烂熟于心。“现在书画市场被赝品充斥,我还不敢说对每幅字画的真伪都有绝对的把握。但很多字画不必细看,一搭眼就能断定对错。遇到了名家字画,总希望是真的,因为这意味着一笔可观的收入。对似真似假的作品,总要找出多种理由来肯定它。有时没把握,索性拿回家挂几天,但往往到最后,却不

得不承认是赝品,这当然是很痛苦的。我背负着巨额金钱的压力,鉴定能力的提高当然很快。”

干好这行,了解国际书画行情格外重要。宇的家中,港台出版的《艺术家》《收藏家》《龙语》等杂志每期不缺,对香港苏富比、克里斯蒂拍卖行艺术品的最新拍卖行情,更是时刻关注。“大陆艺术品价格基本上是由海外市场行情决定的。这些材料实际上就是商业情报。国内有些家藏名画的卖主往往漫天要价,并说是以香港拍卖价为参照系的,并不了解我们收画,是要通过中介人带到香港的,其间有多道关节,如中间人要有丰厚的利润,拍卖行要收高比例的手续费,拍卖底价与最后成交价之间又存在差距。因此,在国内收画,价格最多是拍卖价的四分之一。还要看作品的年代、品相、题材及粗精程度等。

宇告诉我们,艺术交易有其独到的规则,简而言之,“真”、“精”、“信”。“真”指对近现代名家书画,力求其真,决不卖假画害人。这样,自己也不会惹麻烦。“精”,即买卖书画有所选择。不仅要看画家画技和行情,还要审视其人品与修养。至情方能至美。“信”,在交易中最为重要。“我手头上有不少港、台、澳、日本及东南亚的客户,他们委托我担任在大陆的代理人。每年广交会前夕,我都要为他们准备一大批东西。在收购时,我对“贩画”的“铲地皮”的都一视同仁,决不任意压价抬价,让大家都有赚头,且不赊欠。现在,安徽、河南、陕西等地的画商都乐意把东西往我这儿送。货源保证了,生意就会越做越火。”

“不少人称我为‘倒画儿爷’,那是带有贬意的。倒画倒到我这种程度,赚钱已不是主要目的。每日接触、观赏所藏的书画精品,乐趣无穷,身心也渐渐‘艺术化’了。每收购到名人字画,我并不急于卖出,总是把玩、观赏一段时间后再出手。对一

些特别好的精品,国宝级的,干脆就自己收藏,我已存了一批,外人出再高的价我也不卖。等我老了之后,就捐给国家。”

与一般画商不同的是,宇还“养画”,有目的地收集省级画院中青年画师的作品,“这样做,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这些画家的作品已到一定火候,价格又不高;二是我相信咱们国家的艺术市场必然走向兴盛和繁荣。收藏书画的人会越来越多,大名头的作品总有收尽之时,那时这些画家的作品,价格定会扶摇直上,到时抛出去,必然大赚。”

2. “四十而立”的祁

祁是“老三届”初中生,刚过不惑之年。这几年靠“倒画”发了家,骑上了“幸福125”,在市区买了房子。他逢人就说,“人家是三十而立,我是四十才立起来。”瞧瞧那踌躇满志的样子,和他过去当翻砂工一身油泥一身汗的邋邋劲,完全判若两人。

同很多“画倒”一样,祁也是从“铲地皮”开始的。“铲地皮”,即走村串乡,挨门挨户搜罗古董字画。祁走上这条路很偶然,用他的话说,老天让他发财,他躲也躲不开。

那是五年前的一个春日,由于工厂不景气,祁在弟弟开的小餐馆帮忙。这天,中学同学大林路过,二人对饮间,祁见大林套着粗项链,戴着老板戒,问他掉进了哪个钱窝子?吃“艺术饭”。大林答罢,请他帮助到插过队的徽州收点旧货来,事成定有厚报。“什么旧货?”“就是旧字画、茶壶、花瓶什么的,越旧越好。”说完,大林随手数了“一方”钞票给他。这举动,把祁震得一楞一楞的。说实在的,此时的祁除了领袖人物的像、连环画看得多一点,对古董字画一窍不通。只是铭记着大林的一句话:“越旧越好”。

第二天祁直奔徽州某镇。不出

一个时辰,就约上往日“患难”小弟兄相聚在镇上最高级的菜馆里。“三五”一撤、五粮液一端,祁发话了:“兄弟我正给一位大老板干活,老板有个怪毛病,特喜欢那种摆在家里没用的瓷碗瓷盘以及发黄的纸卷。知道这儿不少,特让我来搜集一批,现在就拜托弟兄们了。”在农村呆了十多年的祁清楚,庄户人家连破缸破瓦都要往家捡,土改、破四旧那阵也没造成多大冲击,现在见这些旧东西能换钱,肯定乐意。果然,仅用两天时间,祁带来的两个大旅行包便被塞得满满的,不得不让一个弟兄护送回来。当然,这些东西鱼龙混杂,其中就有几十年前的灶王爷像,可肯定也有真货,要不然,大林怎么又甩给他3000元“劳务费”呢!

第一次成功,使祁颇为感慨:干这行赚钱怎么这样容易。他向弟弟借了些钱,一头扎进“倒画”的行当里。渐渐地,祁懂得了西洋油画与传统中国画的区别,懂得了立轴、屏条、尺牍、册页、扇面的不同,但毕竟文化根底浅,年龄大了又学不进,对什么笔墨神韵、背景意境仍然一知半解。因此,祁“倒画”特注意扬长避短,在经营上下功夫。一是广交朋友,但隔断上下。他手头有几个有一定社会地位却爱面子的老主顾,他们主要是坐在家收画卖画。祁便这家买、那家卖,有时当天一转手,上千元就进了腰包。但他从不对买家说画是哪里来的。对手下一批相对固定的“铲地皮”朋友或“小捐客”问起货卖给谁时,祁只是云山雾罩地说台湾搞电脑的王老板,香港做房地产生意的朱经理,或是日本某株式会社的山田社长。他很清楚,一旦他们上下沟通,大笔钞票将离他而去。二是尽量做不花本钱的中介。听说甲要卖画,他赶快去看,待初步定为真品后,便讨价还价,最后定个底价,要么凭面子,要么丢下点定金,将画拿走。然后转身奔赴要买画的乙家,祁出个价加上“辛苦费”,乙

如能接受,这笔生意就做成了。几年下来,祁已赚了几十万元。不久前,笔者碰到他,问最近生意怎么样,他说现在干这行的人越来越多,开在明处的画廊一个接着一个,生意难做了一些。但他有自己的路子,瞅准了“三资”企业的外方老板。这些老板大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崇尚者,花个千儿八百买张一般画家的商品画,根本不在乎。一年来,这类商品画从他手中出去的有几百张,也赚了近十万元。

3. 能“造”画家的欣

欣,高挑的个头,白净的脸棱角分明,鼻梁上架着金边眼镜,一派艺术家的风度。他能言善辩,神侃功夫颇深。侃八大山人,侃郑板桥,侃张大千,侃新人文画派。谁见了,都认为极有才华的年轻艺术家,而想不到他更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画商”。

欣“倒画”的历史已有四年。他积聚了可观的资产,不仅在北京、上海设有收购点,在深圳、广州还开了画廊,和香港的艺术拍卖行也有业务往来。

欣自幼喜爱美术,但更爱诗,便考进了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到一家报纸做编辑。那几年诗作发了不少,成果甚丰,欣也因此而踌躇满志,但到最后出诗集时,出版社要他交5000元。欣做的是副刊编辑,拉不来赞助,极为窝火。那个星期日,他出去散心,到了街心公园,发现很多人在那儿卖画,且买者甚众,其中还有一些自己认识的文艺界朋友。一问,每张画都在100元上下。他想,自己画的也不错,何不也试试?遂回家精心作了一幅大山水。第二个星期日,他把画铺开没多久,就被一位港商看中,说他的画文人情绪浓,有个性,还没等他报价,港客便递给了他一百美金——欣是第一次见到美金。欣的内心涌动着情潮:同

样是艺术,国画如此受到钟爱,诗竟那样的不值钱,真是缪斯的悲哀!港客看他颇有艺术气质,便请他把画包好,送到酒店去。在房间里,港客问他能否多搜集一些有水平的商品画,按一定的比例付给酬金。欣当然乐意,找老师,访朋友,三天就搞了近百张,得到酬金超过万元。诗集得以顺利出版。

自此以后,港客每两、三个月来一次,每次都带走四、五十张。欣明白了其中门道后,收购的每幅画价格压在10—20美金之间,转卖给港客则是80至100美金。丰厚的利润,使他毅然调整了人生方向,诗也不写了,画也不作了,辞去公职,买了辆摩托车,到处去收画。一年后,他又与朋友合作,开起了画廊,业务发展到了杭州、广州和深圳等城市。

欣开的画廊,都有固定的海外客户,他说国画主要赚港台画商的钱,书法则是赚日本人的钱。在深圳开的画廊,利润最高,仅是两位服务小姐的工资,每月就在六千元以上。

几年的磨炼,欣的艺术激情已转化为商人的精明。他向我透露,艺术交易中存在“炒”画的现象。他仗着资金丰厚,常常这样干,以获取更高的收益。“所谓的炒画,对象应是名家的精品。先囤积,尔后伺机卖出,就像炒股票、炒邮票、炒房地产一样。比如某名画家的作品,我先花资金大量收购,其他同行看我疯买,以为海外行情看好,便也纷纷跟着买,价格就被抬了上去。我不断地买,价格就不断地上升。等价格升到一定程度时,我就会一下子抛出去。当然,这样干,要有实力,动作要快,否则就会自己套住自己。我敢断定,随着今后艺术市场的发达,炒画现象将越来越普遍。”

欣不仅炒画,还像选明星一样选“画家”。“当然,这个被选的对象,要有一定的功底,为人要厚道。先在他身上投资,联络感情,然后做他的经纪人,三年之内包他出名,但他这

三年内作的画全部由我包销,且不能少于100张,最后的得利四六分成,不仅让他得到眼前利益,还让他看到长远的利益。达成了共识之后,我便为他造声势、出画集、办画展,请名家评论、请新闻界朋友写专访,由市到省再到首都,乃至在港台宣传。随着宣传规格的不断升级,这位画家的作品行情必然看涨,但他所有的作品都由我垄断。画家有名,他的画又买不到,价格就会被逐步抬高。这样干必须注意,起价不能定得过高或过低。太高,收藏者不相信,也承受不起;太低,降低了画家的品位。在提价过程中,每三个月、半年就要一涨,给公众造成这样一种印象:××画家的画时时都在看涨,买他的画可以增值。购画者就会越来越多。为画家创造市场的过程,就是我赢利的过程。中间投入不算太多,最后却赚了大钱。风险当然是有的。不过我已是熟门熟路,“造”的几个画家,都成功了。”欣讲到这些经营绝招时,面呈得意之色:“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缺少的不是画家,而是像我这样既有艺术细胞又有经营头脑的新画商,对不对?”

4. 毅:“盼望有一个人人都是艺术家的社会”

在我结识的新画商中,毅是属于那种愈经磨难意志愈坚的人。八十年代初,在某工科大学读书时,曾当过学生会主席。临近毕业离校前夕他身体不适,到医院一检查,竟被诊断为不治之症,活不过三个月。然而三个月过去了,他没有进太平间。一年后仍然活着。他战胜了病魔。

走出病房,告别了死神,然而,一个沉重的包袱压在他的身上——治病期间欠下的债务,靠工资半辈子也还不清。别无选择,只能辞职“下海”。他倒过国库券,做过外汇“黄牛”,开过咖啡馆,办过皮包公司

……都没能赚到钱。正当债主纷纷上门、他一筹莫展躲到上海的哥哥家中时,和哥哥做紫砂壶生意的台湾王老板,见毅一脸精明之相,便请他到杭州、南京等地艺术院校去收些商品画,以送朋友。毅从此走上书画经纪之路。他从最基本的“铲地皮”开始,仅用几年功夫,便成为华东地区书画经纪圈里数得着的人物。笔者在他的家中,曾亲睹任伯年、吴昌硕作品的丰采,至于“书圣”林散之的字,他则收有一大捆。

“我原来是学工科的,搞书画鉴定及经营比一般人的困难更大。既无眼光和信誉,更不熟悉行情,我是交了几万元的学费,才逐步入道的。”谈起往事,毅颇有感慨,“我敢肯定,自己的眼光现在决不比一些文物部门的专家差。他们鉴别字画,对错与自身利益无关,而我呢,稍有不慎,便会几万、几十万的赔进去。”

毅凭着过人的魄力,在书画经营上几乎每一步都走在前面。“我的路子与一般的画商不太一样,不但有目的有计划地‘养画’,而且还‘养画家’。现在,我在南京、上海‘养’了两位才华横溢的年轻画家。无偿为他们出版画册、办画展、找评论家评论、在报刊上宣传,还为他们开工资、买绘画用品,甚至为其中一位买了住房。我这是在进行实实在在的 art 投资。即使是国内一些有名的艺术公司,如四川西蜀艺术公司、北京音乐厅画廊,也仅仅停留在代理画家、‘养画’阶段。”

毅在资金的运用上不单纯考虑眼前的功利得失。“比如,我刚花十万元买进一件作品,预计半年后就能卖到十五万。但如果在此时,另外一件我喜欢的名家作品只要八万元就能买进、而养一养能卖到20万、而我正缺少资金,便会毫不犹豫地再将十万元买进的作品以八万元卖出,再将八万元的作品买进,决不在乎短时间内亏两万。”不久前,毅为经纪的画家——某艺术学院讲师,

在沪上办画展,在画坛引起意想不到的轰动,被誉为“打遍江南无敌手”,连程十发、谢稚柳等前辈都大为赞赏。当时,有位日本画商提出以10万美金将展出的作品全部买走,毅婉言谢绝。“因为,我认为这位画家的作品,将来能卖30万、50万甚至上百万美金”。

对于艺术交易的前景,毅信心十足。他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生活总体水平的不断提高,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在物质生活富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有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在艺术消费方面,花费将越来越大,艺术交易将会从现在的若明若暗走向公开化、明朗化、规模化。艺术市场将会与一般商品市场、股票业、房地产业、期货市场等并足而立。近二十年来,台湾艺术品市场的繁荣,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而艺术交易的活跃,又反过来刺激艺术家们发挥才能,像中国近代的扬州画派、海派画家以及国外荷兰小画派的兴起,都是与特定时期的经济繁荣、艺术品价格的上扬分不开的。

“一个健全的艺术市场应是由艺术家→经纪人→评论家→画商→收藏者这几个环节构成的完善体系。而在现时,我们不仅缺乏有眼光、有学识的独立个性的评论家,更缺乏艺术与商业头脑兼备的经纪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艺术经纪人更为重要。也许人们会有疑问,艺术市场的兴起,经纪人的涌现,画家们的创作会不会受到影响?不会。因为,我国大部分中青年画家生活还是较为清苦的,像北京圆明园‘艺术村’里的流浪画家们,面呈菜色,看到肉眼就放光,多么需要经济资助!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窘境?他们的画没人买,换不来生活的必需品,而经纪人有雄厚的资金,解除他们后顾之忧。比如我现在经纪的一位年轻画家,当初他穷成什么样子?中午我们煮面条,家里只有一个鸡蛋,离发工资还有一个星期,他已身无分文。当时

他爱人带着孩子在农村，他每月都要寄钱回去，工资只有一百来块。看到这位才气横溢的画家，生活如此贫困，我硬是没让眼泪掉下来，当场甩出一千元钱给他作营养费。一个有才气、有追求的画家，只有生活有了保障，作画的心态才会更纯粹、更投入。他不必再像大多数知识分子那样为柴米油盐而发愁，更不必为出画册、办画展、买宣纸、购画笔而操心。经纪人还可以使画家作品的价值在社会上得到更加充分的承认。这将反过来刺激他的艺术创造精神。纵观近现代西方美术史，不难发现，每一位大画家的背后都有一位成功的经纪人，没有卡维拉，就没有毕加索。这是历史的公认。在我国，如果有一批素质高的艺术经纪人，将会有更多的书画家走向世界。”

毅目前正致力于开拓艺术市场，他认为一个繁荣的艺术市场，是等不来的，必须靠经纪人与画家、消费者联手来共同去创造。目前艺术交易的单兵作战、作坊式的经营规模与方式，肯定适应不了市场经济的需要。他正在筹办一个按国际惯例、有众多股东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在高起点上严格管理，明码标价，不搞地下经营。“我的宗旨是，决不急功近利，把公司看成是简单的赚钱机构，意在通过自己的尝试，推动艺术的商品化。我要经营的不仅仅是艺术品，更想营造新型的艺术交易文化。”至于经营方式，毅将摒弃国内一些画廊、画店及艺术品商店守株待兔、高价宰过客的做法，主动出击，做好宣传，薄利多销，让大多数爱好书画收藏的人，能买得起高质量的艺术品，强化整个社会的艺术氛围，盼望人人都是艺术家的社会早日到来。

毅还准备推出一种新型的书画营销方式“回买制度”。“具体说来，就是顾客买了我的画，三年之内可以退还给我，每年只收8%的折旧



△送你一支郁金香

沃钟宝 摄影

费。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打消顾客担心书画有伪的疑虑，鼓励更多的人购书画。另一方面买画人往往将画或挂在家中，或加价卖出，会说是从我这儿买的。这就起到了活广告和分销商的作用。”活跃在都市中的新画商，大多都发了画家们的财。他们之所以能如鱼得水，无疑和当前国内艺术市场的混乱有关。艺术作品的买卖，在发达的国家是相当普遍的。在我国，由于受经济收入的限制，一般老百姓是买不起艺术品的，而国家的艺术管理部门也不收购，即便偶尔收购一次，付给画家的钱也是相当可怜的。官方的艺术品收购价缺乏权威性和吸引力。用手中的金钱直接或间接控制了国内艺术市场。长此以往，艺术必然呈畸形状

态发展，这对一个民族而言，无疑是一种莫大的悲哀。建国后，我们始终把艺术当作一种宣传，只要能展览、登报、获奖就行，艺术家们再靠此获得职称、房子和社会地位。年轻的未成名的画家，想从正常的渠道得到名利，是根本不可能的。新画商们有经济实力和艺术眼光，恰能使他们短时间内达到目的，并反过来刺激他们的艺术再创造。从这个角度来看，新画商们已经对艺术界发生了积极的影响。而一旦将来国内与国际艺术市场接轨了，他们将会大显身手，进一步提高中国艺术品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价值。

(责任编辑 陈贻林)

徐福东渡史迹新证

○左
录

在两千多年以前,曾经吞并六国统一中国的秦始皇,梦想永远当皇帝,派遣徐福率童男童女数千人,渡东海到三神山寻求长生不老之药,结果徐福船队一去不复返,留下了千古之谜。徐福一行究竟到了哪里?三神山是否就是指日本?世界史学家尤其中日两国的学者,对此推论颇多,争论的焦点有三:一为有无徐福其人其事?二为三神山系指何地?三为徐福是否到了日本,日本现存有关徐福的遗迹是否后人伪造?在持不同论点者中间,中国史学家大都是持肯定的态度,而日本史学界持怀疑论者多,论证是因为在日本没有找到有关徐福到达日本和逗留不归的直接古文物证据,如当时的文字物证等等。

实际上,徐福东航日本之历史,不仅有古代文物可证,而且也有遗迹可寻。根据这些古代文物、遗迹和近代考古发现,不仅可以肯定徐福实有其人其事,而且史书提到的三神山、瀛洲、夷洲以及徐福到日本后不归等,都是真实的古代历史,它记载着中日两国文化交往的悠久历史。从公元25—56年上溯到公元前210年,中日文化交流早在日本绳纹式文化时代末期就已经开始了。

史不绝书

中国历史记载徐福入海求药之事,尽管简略,还是史不绝书,而且大多采取肯定的记述。

中国古代史书最早记载徐福一行远航东海,到三神山求仙药者,是西汉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始皇东行郡县”，“南登琅琊”，“作琅琊台”。“齐人徐市(福)等上书,言海中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

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本纪》又载: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9年)，“始皇出游”，“过吴”，“并海上，北至琅琊。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遣，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蛟鱼(鲸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秦始皇信以为真，亲自入海射鱼，并命徐福船队再次入海求药。《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载：秦始皇遣徐福率童男童女3000人；又“资之五谷种百工而行”。司马迁对徐福入海后的行踪仅留下一笔：“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于是百姓悲痛相思”。

司马迁作《史记》之时,距秦始皇时代仅五、六十年,距徐福远航时不过百年,《史记》记载不会子虚乌有。秦二世时,秦代档案为汉萧何所获,因而担任汉皇史官的司马迁,想必掌握的历史资料具有权威的可靠性,何况他是一位极其严肃的史学家,决不会无根据的人云亦云。

后来许多朝代的史家、学者、诗人对徐福其人其事,都有记载传说。有的是根据《史记》加以传抄,有的是另有详细的叙述。如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吴书》、唐朝李泰的《括地志》、五代后周义楚所著《义楚六帖》等等,他们都是根据后来的发现写进历史的。

《辞海》根据《史记》和宋代《太平广记》的记载作了这样的叙述：“徐福，一作徐市。秦方士。字君房，琅琊(山东胶南)人。为迎合始皇迷信长生，上书海上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请得童男女数千人，乘楼船入海。结果一去不返。”

从史书记载来看,徐福率楼船入海,似乎不只一次。据《史记》载,第一次于公元前219年入海,无功而回;过了十年,即公元前210年又入海,到达“平原广泽”后止行,称王不归了。这里说的“平原广泽”是指什么地方?是否就是徐福所称的“蓬莱、方丈、瀛洲”?司马迁并未明确说

明。只在《史记·封禅书》中说：“自威·宣（即齐威王·齐宣王）、燕昭（即燕昭王）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到底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在什么地方？并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

三神山考

蓬莱、方丈、瀛洲究竟所指何地何山，两千年来传说甚多，但终无定见。中国早有“蓬莱今古但闻名，烟水茫茫无寻处”的诗句。司马迁所说三神山的蓬莱，绝不是汉武帝为求仙人到过的那个齐地蓬莱岛。著名古典小说《镜花缘》中的“蓬莱岛”、“蓬莱山”，也只是虚构的仙岛神山。也有人说，三神山不过是“海市蜃楼”。山东《登州府志》记载，秦徐福所谓的三神山，是“望之如云，无至者”，不过是山东半岛特异的山岳、岛屿等地理气候造成的海市蜃楼而已。唐代伟大诗人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中：“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看来李白也认为瀛洲只是在烟云海涛迷茫的大海中的一座难以寻找的地方。难怪今日中日史学界，仍然有人把徐福东渡日本之事称为“历史之谜”。特别是日本史学家认为徐福不过是一位传说中的虚无缥缈的人物。

到底有没有徐福其人其事？徐福带领数千人的船队究竟到了那里？为什么一去不返？这是中日史学界人士一直在探索的问题。而且众说纷云，各抒己见。有人推测到了台湾、琉球，还有人说到了美洲，不过更多的人则认为他们到了日本。历史的真实不一定以人数多少来划定，但对史书、古遗迹、古传说的评价，人们自有去伪存真的能力。以三神山为例，古史书所说的蓬莱、方丈、瀛洲，并不是虚无茫茫无迹可寻的地方。从历史记载、地理环境和中日文物遗迹考证来看，所谓三神山

无疑就是指的日本列岛。古史书上讲的蓬莱，绝不是指称为蓬莱的登洲，更不是台湾东南海域被人称为蓬莱的绿岛。因为它们与古史书上记载的地理距离、环境不符。

那么，蓬莱在哪里呢？当中国五代后周时，古文献第一次把蓬莱指为日本一地，并把徐福东渡日本后其子孙繁衍的情景，作了极为生动的描述。当时，济洲开元寺有一位高僧叫义楚，撰有《义楚六帖》一书。作者在该书《城廓·日本》一章中说：“日本国亦名倭国，在东海中。秦时，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国，今人物一如长安……又有东北千余里，有山名‘富士’，亦名‘蓬莱’……徐福至此。至今子孙皆曰‘秦氏’。”据史家考证，《义楚六帖》上的描述，是来自醍醐时代的日本僧人宽辅之口。宽辅系日本真言宗的高僧，法号“弘项大师”。他于公元927年（五代后唐天成二年）来中国，在济州与义楚交往甚厚。《义楚六帖》上有关日本风土人情的记载，其资料大多出自宽辅的口述传闻。

但是，日本高于菟三《徐福东来考》一文中，否定义楚的说法。他说：汉唐以后，日本和尚常来中国散布徐福事，致使义楚不辨真伪而记入书中。高于菟三的考证并没有足够的论据，当时中日两国来往之人已经不少，日本僧人没有要伪造历史的根据，他们只不过是叙述历史事件和日本情况而已。何况日本古代文书上有关徐福东渡日本的文字记载也不是绝无仅有的。日本富士吉田市的官下义孝所收藏的古文书中，就记载着秦始皇命徐福等558人到蓬莱之国（日本）的“不二山”，“采取不老长寿之药”一事。

中日两国古文献的记载，都肯定徐福一行到达日本，而且都说明已经找到蓬莱。看来，他们都不可能传抄《史记》上的文字的，尤其是官下义孝收藏的史料中，所载人数并不相同。这完全可能是由于徐福东

渡日本时，因长途跋涉颠簸一路上人数只能越来越少的缘故。

三神山的瀛洲又指何地呢？根据《辞海》的解释，瀛字即瀛海。《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称瀛海是“乃有大瀛海环其外”。《论衡·谈天》说：“九州之外，更有瀛海。”所谓瀛洲，只能是四周为茫茫大海的较大的洲。以此而论，司马迁所说的瀛洲，是指日本之地无疑。实际上蓬莱、瀛洲也可能是指一个地方。古代诗人许敬宗在《游清都观》一诗中就有“方士访蓬瀛”之句。清光绪年间，王之春奉命赴日本考察，回国后写了一本书，书名就为《谈瀛录》。现代中国人称日本为东瀛已是尽人皆知的称呼。中国民主革命家章炳麟在《狱中赠邹客》一诗中，就有“邹客吾小弟，被发下瀛洲”之句，确指日本为瀛洲。由此可见，所谓瀛洲、蓬瀛、东瀛之称谓实际上都是指日本。

三神山中只有方丈好像无据可寻。根据《辞海》的解释：“方丈又名方壶”。古人有把蓬莱、方壶联用的，如李白在《秋夕书怀》一诗中就有“始探蓬壶事，旋觉天地轻。”沈亚之在《题海榴树》一诗中也有“曾在蓬壶伴众仙”之句。施圣舆在《席上赋》一诗中又提到“春到蓬壶特地晴，神仙队里相公行。”由此可见，所谓方丈与蓬莱是同指一个地方。日本有一个平壶岛，所谓方壶是不是指平壶，也是有可能的。《辞海》把“蓬瀛”、“蓬壶”都作为条目，指为“海中仙山”，不是无原因的。

至于日本高于菟三所作《徐福东来考》中，说徐福到的三神山，只是渤海湾的一个小岛以及徐福在日本的遗迹多系后人伪造的说法，是极不科学的。汉唐时期，所谓渤海是指渤海口以东的海域，那时日本还称倭国，与中国之间的海还不叫日本海。《史记》所称的渤海，实际包括今日日本海的广大海域。

夷洲、亶洲又是何

地?

中国古代史书上有关徐福一行的行踪记载中,有的说他们到达的地方是亶洲,夷洲,并且说那里的人早与中国大陆有来往。如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吴书》中说“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后汉书》上也说徐福到过神台,又说“止于夷洲、亶洲。”东晋葛洪《枕中记》中说亶洲的位置在“对东海之东北岸”。唐人李泰的《括地志》也认为亶洲“在东海中”,并明确亶洲距中国大陆有万里。

古人所记亶洲、夷洲的方位在东海中,距大陆有万里之遥,“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这就是说,小船是不可能到达的。但是,亶洲、夷洲还有人来会稽货布,想必他们有大船渡海。以万里计算,必是日本列岛。

对徐福东渡日本表示怀疑的人,另一个论据是:从《史记》到《三国志》,都没有提到他们到达的是当时称为倭国、瑠马台等地方,《后汉书》说徐福入海只是“止于夷洲、亶洲,而夷洲和亶洲也从没有人说就是今天的日本列岛。”

为什么我国古代称倭国,瑠马台等地方为夷洲、亶洲呢?这里作一点考证:

公元四世纪以前,日本列岛确实被称为倭国、瑠马台的地方。《汉书·地理志》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看来,分为百余国的倭人,已与汉朝有官方来往。当时的日本人自称倭奴或委奴。东汉光武帝颁发金印给倭国国王的就是“汉委奴国王”印。公元1784年,在日本北九州出土了这

颗金印。中国古人称倭或委怎样解释呢?倭字上古仅有一读,为委声。《说文》曰:“倭,顺儿。从人,委声。于委切。”倭人古时也称夷人。《诗·小雅·四牡》有“周道倭迟”一语,陆得明《释文》说:“《韩诗》作倭夷。倭夷是联绵词,两字一义,倭是夷,夷也是倭。”汉武帝时曾占领朝鲜,立为四郡:玄菟、临屯、乐浪、带方。后来,临屯和玄菟两郡由夷人据有,这个夷人就是当时倭人。《三国志》介绍倭国一官名为“卑奴母离”(HINAMORI),原来就是“夷守”的日语发音。当时称瑠马台(YAMATO),原来也是《大和》的日语发音。因此,《魏志》称倭国为“东夷”,中国人称倭人为夷人、倭国为夷洲,就不足为奇了。

至于古史所称的亶洲又是何地呢?当徐福入海止于亶洲之时,倭人占有的百余国,实际上是百余个部落。其中一个地方称亶洲,也是可能的。有人考证,说亶洲就是本洲近畿以西的地方。根据古史记载徐福所到地方的各种情况分析,亶洲也只能是今日日本列岛的一个地方。因为距大陆万里的地方,而且有“平原广泽”,既不是台湾,也不是琉球,更不是美洲。台湾距大陆很近,只隔一道海峡;琉球没有较大的平原和湖泊;美洲距中国数万里,当时根本没有人员来往,所以,只可能是指日本。

深信不疑

从宋代以后,中国人大多对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已经深信不疑。

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所写《日本刀歌》,不仅肯定徐福东渡日本,而且说明徐福把中国文化传到日本。歌曰:

徐福行时书未焚,
逸书百篇今尚存。
严令不许传中国,

举世无人识古文。

南宋著名高僧祖元,在蒙古大军灭亡南宋之时,被镰仓幕府执权北条时宗请到日本,主持建长寺,并将园觉寺由祖元开山,时宗还赠祖元为佛光国师称号。祖元念念不忘祖国安危,在他献香徐福祠之时,曾经赋诗一首:

先生采药未曾回,
故国山河几度埃。
今日一香聊远寄,
老僧亦为避秦来。

明初,日本名僧绝海中洋,法号空海,来到中国南京,并会见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两人以徐福祠为题作诗唱和:

空海:
熊野峰前徐福祠,
满山药草两余肥。
只今海上波涛稳,
万里好风须早归。
朱元璋:
熊野峰前血食祠,
松根琥珀也应肥。
当年徐福求仙药,
直到如今更不归。

从清末到现在,深信徐福东渡日本者不乏其人。清末,黎庶昌、黄道宪驻节日本,也参拜了徐福墓,并诗文题记。若干年后,徐福旧事成了研究中日文化交往的一个专题,有人撰写了《徐福东渡的故事》、《访徐福墓记》等篇,认为中日文化交流关系源远流长。

马非百所著《秦集史》中的《徐福传》,是肯定徐福东渡日本说的代表。他说,“徐福是有目的赴日本的”,“其意初衷不在求仙,而实欲利用始皇求仙之私心,而借其力以自殖民于海外”,“岂非预定之计划耶!”徐松石《日本民族的渊源》说,“战国先秦时期,中国东南沿海民众大量往日本移民,徐福率领的众千童男女只是其中的一队而已。”

近年来,我国有关徐福祖居地和造船遗址等的发现,又一次肯定

团确实到达了日本。”

根据是什么？因为韩国的南海郡锦州山的摩崖石刻有“徐市起礼日出”六字；济州岛西南岸西归浦正房瀑布的绝壁上刻有“徐市过此”四个大字。他还发现现在济州岛上姓高、良、夫三姓的人，都自称是徐福子孙。水野明这一发现，是徐福东渡日本的重要证据。这些崖刻不会是后人伪造，因为找不出后人要在此地伪造史迹的任何理由。济州岛留下徐福的后裔，也证实中国古代史书记载徐福出发时几千人，而日本古文献记载徐福到达日本时一说一千人，一说 558 人，是符合当时历史实际的。

水野明对徐福时代是否具有高度的造船远航技术作了肯定的考证。他说：徐福是齐人，徐福所在的齐国是霸据东方的大国，疆域曾东达渤海与大海。早在春秋时期，越国已有了“舟师”，越王勾践发“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从会稽远航至琅琊。平均每一艘戈船可载 30 名士兵。勾践早于徐福 200 多年。同时，水野明还确信，是徐福大船队把中国的先进文化传到日本。他说，徐福所率的船队到达日本时期，恰恰和日本弥生革命时期相符合，此后日本才从狩猎捕鱼时期进入农耕文化的转变时期，青铜器和铁器也是同期传入日本的。

据中国史书记载，徐福率船队入海求仙耗费金钱达亿万计，杨宽著《秦始皇》一书中说：“徐市等花去了巨万的钱始终求不到仙药”。这就表明当时秦有巨大的人力、财力，制造远航楼船可以为支持徐福入海求仙提供物质保证。近代地中海沿岸出土了“秦半两”的货币，说明秦人已经能把货币带到地中海沿岸，那么徐福从海上东渡日本更不是难不可至的一个有力证明。

日本的传说、遗迹

和考古新发现

徐福东渡日本的历史考证，不仅需要中国的文物史迹加以证实，而且需要日本文物遗迹加以证实。徐福远航东海的历史在中国已载入史册。但是，至今日本史学家，很多仍持否定徐福东来日本说，如井上靖《日本历史》、《日华文化交流考》，均未提及。山本纪纲的《徐福东来传说考》只承认徐福是个勇敢的反叛者，他是为了摆脱秦始皇暴政，逃避移居海外的，但东来日本仍属传说。

徐福在日本美好动人的传说的确很多，其中也不乏杂有虚幻色彩。如有一个传说，说徐福因避秦不归，与一个叫阿辰的日本姑娘相爱成婚，徐福死后，阿辰含悲离世，死后人们为她雕刻了“阿辰观音像”，至今尚存。这个传说就不完全真实，因为佛教观音在当时还没有传入中国。日本何来观音！

日本有关徐福一行的传说极多，流传很广。据说徐福一行在日本的遗迹达 56 处之多。日本新官市有徐福的墓地，还有他的侍员七人墓，新官市有徐福宫、徐福庙等遗址。日本佐贺县有标注“徐福上陆地”的地点，传说徐福是在佐贺郡诸富町的市井津浮杯上岸的。每年八月的“徐福祭”，是日本隆重的传统节日，年年每当大祭仪式，人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徐福祠，纪念这位对日本有卓越贡献的传说人物。《日本名胜地志》、《异称日本传》和《同文通考》对此都有详细的记录。据传，徐福死后葬在树木苍郁的蓬莱山上，山上建有“秦福之墓”字样的墓碑。

难道上述徐福在日本的传说、遗迹和古文书的记载，都系后人伪造吗？试想在公元五世纪，日本才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怎么要求当时就有记载公元前 210 年的文字历史呢？史前文化要依靠后人古代传说、文物遗迹进行考证，去伪存真才

徐福实有其人其事。八十年代初，江苏连云港市开展地名普查工作，赣榆县金乡徐阜村一位 76 岁老道士说，徐阜村原名徐福村。普查办查阅了该村《张氏宗谱》、《王氏家谱》等资料，也证实徐阜村原名徐福村，并发现徐福村原有徐福庙和徐福造船作坊遗址。徐州师范学院罗其湖教授也在徐阜村进行过考察，并写出了《秦代东渡日本的徐福故址之发现和考证》一文，确证徐福实有其人，并进一步论证徐福东渡日本实有其事。

阎孝慈在《秦代方士徐福东渡日本新探》一文中说：“当时航海技术落后，指南针未问世，所以远海航行靠季风吹送，带有极大的偶然性”，作者推测徐福横穿黄海至朝鲜半岛的南端，从半岛与济州岛间的济州海峡穿过，最后到达九州岛，即徐福所向往的“蓬莱仙岛”。

秦代造船航海技术和徐福东渡路线考

否定徐福东渡日本的人，其中最重要的论据是：公元前二三百年左右，中国不仅造船技术十分落后，航海经验也极为幼稚，在没有指南针的情况下，能够渡海远航表示怀疑。他们说，唐代鉴真和尚东渡的时候，造船和航海技术，远较一千年前秦代不知要好多少倍，尚且频频遭难，“百无一至”，而徐福要带上大批童男女和百工的船队，却平安无事地到达日本，恐怕很少可能。

秦徐福时代，中国有无可能制造大船和有远航技术？日本学者水野明的研究结论很有说服力。水野明根据他的发现和近年来的研究，认为秦代已具有高度的造船和航海技术。他说，徐福出航地和路线是，从渤海湾东经朝鲜半岛西海岸南下，经过济州岛到达北九州和其他地方。他说：“无疑地断定，徐福船

能判断历史的真实程度,正如中国史前的黄帝,就是依据传说确定的。前述日本古史书中有关徐福到达日本“蓬莱之国”的记载,也不是绝无仅有的文字。日本古历史年表也记载:“孝灵七十二年徐福来朝”。按照富士古文书(平安、镰仓时代)的记载:“徐福一行,奉始皇之命,到富士山来取不老长寿之药,因此居焉……”日本南北朝时期,一个名叫北岛亲房的武将,写了一本《神皇正统记》,就把徐福到日本求仙药的事写入史册。

显然,上述日本文字记载,既不是传抄中国古史书的文字记载,也不是仅凭僧人的神话,而是根据日本民间有根有据的传说见诸文字的。日本民间把徐福奉为“司农耕神”、“司药神”的传说,不能视为荒诞的迷信故事,恰恰正是徐福把中国的农耕“五谷种种”和中药传入日本之证明。

三十几年前,在日本山梨县富士山麓田地里发现了一颗刻着“秦”字的金印,使日本考古学者、历史学家为之轰动。因为它是表明秦始皇时代确实有秦人到达日本的一个物证。根据日本专家考证,这颗金印可能是徐福一行留下的秦人遗物。

金印的出土是山梨县山中湖村的一位名叫羽田正次发现的。羽田正次在田地里锄地时,忽然咣当一声,在距地面 50 公分处发现了这颗金印。金印高 2.5 公分,采用黄金和铜的合金铸成。文字部分为 2.2 平方公分,刻有一个“秦”字,印的把纽为狮子形。经“富士山研究中心”的学者渡边长义考证,金印出土地点和日本古书上记载徐福到过的地方十分吻合。渡边认为,金印出土之处,正是当年徐福等人居住的地区。金印出土处的邻近,是古称宇亩湖(今名山中湖)畔的长生村,后来更名为长池村。在这一地区附近,有一族姓秦的居民盛传是徐福后裔。在公元 1170 年前(日本延历十九年)

富士山大喷火时,搬至现今的神奈川县的秦野市去居住了。渡边认为:一、金印来自中国,文字雕刻部分恰为中国一寸见方尺寸,而日本旧尺寸则为六分不到;二、发掘金印的地点,从地表到地下 50 公分处都是火山灰,证实金印原是在地面上的,后来是被火山灰掩埋了的;三、金印确为秦王朝遗物,因为当时日本尚未发明合金术。

从日本世代传说、遗迹、古文书到近代发现的古文物考证,都证实徐福率领船队到达日本并居住日本不归的历史是真实的。日本一些学者持伪造说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至于后人对一些传说故事和古迹加以神话或迷信色彩的渲染,那也是不足为奇的。正如中国古代有关黄帝、尧、舜和大禹的传说众多,庙宇和坟墓都不只一处,如果据此否定他们的历史存在,是不科学的。对徐福东渡日本的史实也应是这样。何况中国学者历代考证证明,徐福船队远航东渡求药并不归的历史是确有其人其事的。

“神武天皇之谜”

有人推论,日本传说的神武天皇实际上就是徐福在日本称王后人给他的封号。台湾就有这样的书籍文章问世。如汪公纪的《日本史话》第一章的题目就是《神武天皇之谜》。作者考证说:徐福东渡日本,建立王朝,成为神武天皇,是一种“合理的推论”。这个推论与司马迁的《史记》称王不归的史说法差不多,但仍不过是一种猜测,需要更多的古代文史资料进一步考证。

有一位卫挺生博士,他对传说中的神武天皇作了研究,写了《日本神武开国新考》一文,极力主张徐福东渡建立了日本王朝,并说神武天皇就是徐福。他是根据日本《神武纪》的记载,作了如下考证:

“可确知神武天皇不生长于日本,乃乘天磐自高天原飞降者。‘天磐’船谓航海之楼船。‘飞降’谓操纵飞帆而来。‘高天原’乃指海外之一地而言。”卫挺生的意思是:神武天皇是一个不生长在日本的海外人,乘有飞帆的航海楼船来到日本。

当时日本为什么从绳纹文化时代忽然飞跃到青铜器时代的弥生文化?

据卫挺生的研究:“近年,自筑紫至远贺川口,出土青铜器时代之刀剑戈矛镞范甚多,与神武纪所云,居‘吉备’数年以蓄兵食之语相应,‘兵’即兵器。神武东征途中先折而西行,停驻远贺川口多日,因其地为兵器制造区,故亲往视察制造情形。从已出土之兵器而言,其形式与先秦之大陆中原之刀剑戈矛无异,可见神武兵工之技工来自大陆。日本产铜之各地,多在伊豫安艺以东,而当日制造兵器之场所,反集中九州之西北,去矿场甚远,显然当时日本铜矿尚未被发现,不得已乃自大陆齐楚沿海运铜入倭,故将其冶铸集中去齐楚海港最近之港湾,因而自唐津以至冈田皆成其冶铸之工业区。”

卫挺生这种考证,虽然疑点甚多,但从他引证的材料来看,又一次说明徐福到达日本后,将中国先进文化传到日本,却是一个有力的旁证。《史记》说徐福称王不归,问题是既然在朝鲜留有崖刻,为什么在日本却没有留下片言只语?连一块石刻也没有?持否定徐福将中国文化传至日本的人,其中最具有说服力的论据是:日本的汉字是公元三世纪传入的,为什么徐福当时没有把汉字传入日本,而要迟至几百年后才使用汉字?

事实上,这些疑问只要对徐福渡海求药的时代背景作一番研究就清楚了。徐福是借求仙之名,到海外避难是实。徐福深知世上并没有什么长生不老之药,他不过采取的是

金蝉脱壳之术，借出海求仙药，骗取秦始皇的信任，为他创造条件达到东渡日本避难的目的。这从《史记》中“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遣，乃诈”的记载可以得到佐证。秦法规定：求长生不老术者“不验辄死（如果试验不灵要处死）。”当时方士卢生、侯公因求不到仙药而逃跑，求不死之药的韩终一去无音信，秦始皇一怒之下，坑儒460多人，这就是徐福东渡日本一去不归的原因。可是为什么徐福东渡日本不归，竟不传播汉文字呢？经过历代史学家推断，这也是可以解释的。欧阳修的“逸书百篇今尚存，严令不许传中

国”的诗句，不是凭空虚构的情节。徐福第二次出海远航之时，已经发生了焚书坑儒的事件。徐福不把汉字传日本，其目的可能是对他不归的行为采取的一种保密措施，不让秦始皇和以后的皇帝知道徐福一行的行踪。徐福在朝鲜留下了崖刻，是他借以证明他们确实是远航东海了，以保证徐福一行在日本的安全。

有些人考证说，徐福不传汉字乃是“愚民政策”，继承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愚民之治”，这是不准确的推测。从日本传说、遗迹和考古发现证明，徐福及其百工把青铜、铁的冶炼术，农业耕作技术，中药以及秦汉

制度传入日本就是证明。只是汉字除外，致使徐福远航东海求仙药之事，成为两千年来的历史之谜。至于徐福在日本是否没有一点片言只语留存，这还有待今后的考古发掘来证明，至今也不能断然下定论的。

从上述历史文物证明，徐福船队东渡日本是真实的历史，使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文字记载可以提前几百年。徐福作为两千年前中国人民的使者，他为日本国史前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伟大贡献，他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个辉煌的永远值得后代子孙纪念的人物。

（责任编辑 方德）

（上接60页）

抵达奉天（今沈阳）。彭干臣担任中共满州军委书记，负责领导东北地区的武装斗争。他的助手是一位朝鲜族金姓交通员，为便于掩护，取名王鑫。不久，东北党组织遭到叛徒的出卖，彭干臣在王金同志的掩护下得以脱险，搭乘火车北上哈尔滨，又过了一段时间，彭干臣被任命为中共顺直军委书记。1930年12月，彭干臣夫妇抵达天津，以某洋行经理身份出现。又因为叛徒出卖，顺直省委遭到破坏，彭干臣无法开展工作，奉中央命令再回上海，继续在中央军委工作。

1931年4月，在上海发生了一起严重危害中共中央的重大事件，即中央特科领导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供出了党中央在上海的机密情况。正当反动派即将要把中共中央领导人一网打尽的紧急关头，中共打入国民党中央的机要秘书钱壮飞同志，火速把情报告知中央。周恩来当机立断，下达了隐蔽党中央领导人的命令，在陈云、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彭干臣等的协助下，迅速切断顾顺章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和联系渠道，立刻转移顾顺章熟悉的中央负责人和其他干部，当夜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机关全部搬了家，从而避免了一场极端严重的大破坏。

两个月后的6月24日，总书记向忠发也被捕叛变，供出周恩来在小沙渡路的住处。由于周恩来有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当敌人前来搜捕时，他和邓颖超已经提前转移。从此，党中央停止了在上海的活动。12月底周恩来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彭干臣秘密离开上海的时间要晚于周恩来。1932年1月，彭干臣恋恋不舍地告别了爱妻和不懂事的女儿伟生、儿子伟光，奉命奔赴赣东北苏区，前任红十军团

参谋长，后任彭（湃）杨（殷）军校教育长、校长。从1932年到1934年，彭杨军校为红军输送了700多名中下级军官。因为校址设在江西省横峰县葛源镇，有歌谣唱道：“小小葛源镇，大大军干校。”幸存下的几位老同志，每当忆起彭杨军校的往事，交口称赞彭干臣的才华出众，有儒将风度，足见彭干臣办学成效之卓著。后来，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党内“肃反”扩大化，彭干臣遭到囚禁和迫害，所幸，1934年11月方志敏奉中共中央指示，组织抗日先遣队出师北上，彭干臣得到重新起用，协助方志敏率军北进。短时间内，队伍沿皖赣边出击，连获胜利，重振军威。1935年1月，队伍抵达赣东北怀玉山一带，遭敌重围，彭干臣壮烈牺牲，年仅36岁。

当年，彭干臣离开上海赴赣东北苏区后，江鲜云曾经收到他的一封盖有“民国二十二年（1933）上饶”邮戳的书信。彭干臣用暗语说：“生活艰苦，生意做得不错。”从此，再也没有音讯。

江鲜云的义父李次山，觉得她母子三人在白色恐怖的上海难以立足，便将江鲜云她（他）们送回老家英山。中共英山县委书记魏新民（即魏文伯）、县长杨必声将其母子三人转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后来，随部队转战苏北、山东。全国解放后，江鲜云留在山东工作，女儿彭伟生在部队当了医生，儿子彭伟光后来报考了北京外贸学院。邓颖超对彭伟光说：“你是幸福的一代。正因为你的童年、少年经历了艰难战争岁月，受到了战火的熏陶。要比解放后生长的孩子懂得幸福来之不易。我们今天的幸福，是由像你爸爸那样的成千上万烈士的鲜血换来的，只有懂得幸福来之不易，才会珍惜解放后的幸福。”

（责任编辑 卢弘）

东方「神仙」西方「显灵」记

一对中国夫妇在美国的传奇故事

○胡智锋

引子

当我们的视线沿着地球东方那颗耀眼的巨星——中国古都北京，跨越那辽阔的腹地，到达一水之隔的台湾，然后从那里穿洋过海，你可以看到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有一条著名的依傍着浩瀚的大西洋东岸南北铺展开来的内华达山脉。如果我们驻足在内华达山脉北加州的那个小山头，也许用几十倍几百倍的望远镜可以发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萨斯塔(MT·SHASTA)山。我们这个故事的女主角目前就寓居在此山中的萨斯塔城。

萨斯塔城全城只有三千五百个居民，与他们朝夕相伴的是浓密的森林，林中汨汨流出的河水以及偶尔出没其间梅花鹿、野兔和各种家犬。在这与大自然浑然一体的小城中，不久前迎来一对来自中国的新主人——许胜、赵晖夫妇。他们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更象一支清纯的东方旋律，从萨斯塔山中悠悠飘出，摇荡着不同肤色朋友们的心弦。

爱

一九八九年七月，一架客机从旧金山腾空而起，机舱里坐着一位身材不高、皮肤黝黑的中年人。他看起来沉默寡言，但心海里却翻腾着难以扼制的波浪。他是一位美籍华人，名叫许胜，降生在台湾，日思夜想的却是寻根、漫游大陆，直到三十三岁时才如愿以偿。他相信这是“命运”。他对大陆的憧憬与亲近，此前只能寄托在对中华文化——尤其是对中国的艺术、医学和哲学的炽热的爱恋之上。在漫游祖先故土的畅想中，他梦想有一位弹着中国古筝的姑娘步入他的生活。

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八日晚。建国饭店。大陆梦尚未做醒的许胜，

身着短衫短裤信步来到中餐厅。借着柔和的光线，他似乎找着了丢失已久的爱物，一把绛紫略带古铜色的古筝。他不由自主地伸出双手，情不自禁地弹拨了几下。恰在这时，旁边走出一位姑娘，大概是这把古筝的主人，平静地看了看他。许胜这才感觉到自己的冒失。刚刚退回听众席，那位姑娘已经款款来到古筝前，她那一身标准的中国古装旗袍，裹着她秀美流畅的身材，泛溢出一派大家闺秀与现代知识女性自然融合的风范。曲子从她那修长的玉指间滑动出来……许胜神思恍惚，此情此景与“梦境”竟然那么相似！到底是真还是梦？一曲终了，许胜已完全“入境”。她演奏时的举止、神态，恰恰是自己梦寐以求的那个姑娘！许胜不由自主地对身旁朋友说：“如果这个姑娘同意，我要娶她作我的新娘。”朋友以为他在开玩笑。他却主动地给这个还不知姓名谁的弹古筝的姑娘，写上以下的文字：“我今年35岁，是个中医，河北人(祖籍)，热爱体育运动，热爱自然，爱好艺术、哲学、音乐，没有怪癖，但就是喜欢吃。是个美国人，不富有，但是够吃的。位在北加州，离天堂不远，那地方在一座漂亮的山上，环境优美。很希望你交个朋友。”趁赵晖离场时，许胜把这封短信顺手交给了她。第二天许胜便匆匆返回了美国。

一周之后，赵晖给许胜写了信，她很奇怪这个华人在美国住了那么久，中文竟然如此出色，尤其使她钦佩的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如此深深的挚爱和眷恋。许胜立即回信说：他们二人的见面是他一生中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许胜还在信中向姑娘介绍了他的家里人——父亲、兄弟姐妹的情况。

谁知，书信往来到十月初，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由赵晖突然中断。原来，家里人告诉赵晖，这是求爱信。她不知所措，拿不定主意。而信的突然中断，使许胜陷入极端痛

苦的情境之中。他懂得中国的一句老话：爱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东西。他怀着一颗极不宁静的心去了夏威夷，竭力想忘掉这个一见倾心的姑娘。可是日里夜里，魂牵梦绕的依然是赵晖那美丽可爱的面庞。

十月十七日旧金山地震后，情况有了转机。赵晖为许胜的安危挂心，电话询问他的近况。许胜好感动：七分钟的电话，要花掉她一个月的工资！她不仅美丽，还有一颗善良的心啊！许胜下决心要与赵晖姑娘缔结美好姻缘。

有情人终成眷属。从八九年底开始，许胜为办理一道手续，不知闯过了多少关卡，终于盼来举行婚礼的这一天——这年八月十三日。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十三日，赵晖远涉重洋，飞到许胜的身边。这一天，恰好是许胜从台湾飞抵美国十二周年纪念日。

一位炎黄子孙饱含对大陆、对中华文化深深的眷恋，终于如愿以偿地找到梦寐以求的弹中国古筝的姑娘。

情

赵晖是幸运的——她恐怕做梦也没有想到，她未来的情侣会在远隔万里的地方向她招手，又一往情深地理解她丰富的情感世界：追求、理想、愿望……

然而，赵晖的人生之路又是坎坷的。家庭屡遭变故，迫使年幼的赵晖过早体验到世态炎凉与人情冷暖。她强忍生活给她的重重压力，把难以对人倾诉的郁闷、悲伤与欢欣，全都寄托在那古筝琴弦之上。

她中学毕业后，在北京燕山文工团工作过一段时间。文工团解散后被分到图书馆，业余时间到中央民族歌舞团帮忙。在一九八二年中国民族器乐大赛上，她荣获一等奖，被中国歌剧舞剧院看中，一年后才

被文化部以“尖子人才”的名义正式录用。当时社会上正刮着“文凭风”，她只好再去补上“中国社会音乐学院”，刻苦攻读五个寒暑才挣来一个大文凭。面对生活中众多枝蔓的干扰，赵晖始终没有忘情于她的古筝演奏事业，热情、无私地指导了不少有心学筝的孩子。只要能让孩子们象她一样去探求古筝琴弦间流动着的东方艺术的神韵与情致，她可以不收分文。在她看来，没有什么比人们共同钟情于古筝、钟情于古老的东方艺术，更让她感到欣慰与愉悦的了。她想方设法、尽最大努力推广宣传古筝艺术。在广播电台、电视台，她多次录制过自己的演奏；在国宾馆、大使馆和各大饭店，她多次为外国朋友献上纯熟的技艺，甚至还举办过古筝演奏会。

也许正是因为赵晖对古筝的一往情深，才使她对同样挚爱着古筝的许胜由感激发展到心心相印。对古筝的深情成就了她与许胜刻骨铭心的爱情。

然而，要作出与许胜到美国去生活的决定，并非轻而易举。不管她生活中曾经历过多少磨难与曲折，这片故土毕竟让她难舍难分。她忘不了这片故土给予她无尽的灵感，她忘不了父老乡亲给予她的荣誉和鼓励，她忘不了她的父母、亲人对她的养育，她忘不了她的老师、友人对她的关切和帮助。她是一个重感情的女性，她心里永远盛着这偿不完的情！

赵晖最后终于决定随许胜到美国去。她清楚：许胜的爱情会帮助她克服语言、习俗乃至文化上的困难，走上新的生活之路；许胜的爱情还会帮助她将古老的东方艺术传播得更为久远，这不正是对祖国、师长、亲友最好的报答吗？

到达萨斯塔城后，赵晖凭着她苦练古筝的那股韧性和劲头，硬是迅速过了语言关，很快便能自如地与异邦朋友展开交流了。当《萨斯塔

山先驱报》记者前来采访时，她望着丈夫，满怀深情地说：“我喜欢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人，和这里的一切。”

赵晖渴望有一天这个国度的人们，会象喜欢爵士乐一样喜欢东方的古筝曲。许胜最理解她，在自己诊所内外，总是千方百计地向病人向朋友介绍自己的新娘和她带来的风格独特的艺术。功夫不负苦心人。一缕清新淡雅的东方旋律，从萨斯塔山脚下袅袅升起，满载着男主人的挚爱和女主人的深情，在萨斯塔城人的心中弥漫着，荡漾着，在山谷间，在溪水旁飘飘洒洒，余音不尽……

合唱

这对夫妇的爱情合唱一开始就定在了一个共同的基调——中国文化之上。

许胜之所以选择了萨斯塔城作为自己的家，是因为这里远离喧闹的城市，有最纯最美的山水，有最静最雅的环境，与中国道教和中国艺术中崇尚的“自然”境界最为接近。他在小城开了一个小小的诊所。起初，人们并不熟悉中医，登门求医者寥寥无几。后来，许胜靠着神奇的针灸技艺，治愈了一个个被西医判了不治之症的病人，从而名声大振。美国当代著名歌星波拉·阿布杜尔患有严重关节炎和腰痛，久治不愈，使她舞台演出的动作质量受到很大影响。她为此非常痛苦。许胜轻轻地在她腿上插了几根针，二十分钟之后站起来，将针拔掉，慢慢走了几步，接着跑动起来，到后来竟能自如地欢跳了！波拉·阿布杜尔兴奋极了，盛情邀请许胜跟随她到世界各地演出。许胜想的是尽力帮助别人，主动承担了阿布杜尔十几个人员的保健。可是，在为阿布杜尔举办的欢迎宴会上，却从来找不着许胜。每当这

那个时候，他总是退避三舍。许胜认为，他的价值就是为患者解除病痛，而不是体现在那些宴会、晚会之上。

赵晖来到萨斯塔城之前，这里几乎无人听到过中国音乐。开始，一个信服许胜的病人推荐赵晖为一些好奇者演奏，引起异国朋友浓厚的兴趣，很快便象许胜针灸一样，招徕了一批批前来邀请演出的朋友。他们非常热情、好客，有的甚至亲自去联系剧场、自费包租场地，代付演出费用，使赵晖向世界传播东方艺术的愿望逐步变成现实。

美国听众中不光有好奇者，还有不少人东方艺术颇有鉴赏力。一九九一年七月一八月号《萨斯塔城艺术协会新闻公报》上，有这样一段评论赵晖演奏的文字：“她的手轻快地滑动，象鸟儿精巧的翅膀掠过琴弦，时而那么优雅，那么柔润，时而又是那样坚实、有力，在听众脑海里似映现出瀑布、鲜花和温柔的蝴蝶的翅膀，坚硬的磐石、高耸的山脉、爱、生活和永恒。那里面有鲜明的东方风格，然而西方人听起来却一样的非常自然——因为赵晖弹奏的音乐道出了每个人的心声：不管他的祖先是谁，从旋律、节奏、调式中流露出欢乐、忧伤和轻快，坚定的情调牵动着每一个观众的心。”

这篇题为《赵晖首次在美国音乐会上的演出》的报道，最后这样记述记者的总体印象：“这位身穿中国

传统旗袍的艺术家，用她那高超的艺术，灵巧与优雅，把观众带到了那个遥远的被遗忘了的世界——在那里，皇帝曾经是统治者，哲学家们体现出了人类高度的智慧。”

这位记者的目光仿佛已经通过赵晖和她的古筝，飞越千山万水，看到了遥远的东方；仿佛已随着赵晖手下弹奏出的优美旋律，领悟到漫漫数千年间在那几乎与世隔绝的天地里创造出的充满神秘和幻想情绪的独特文化气韵。

带着对先辈们创造的辉煌文化的骄傲，许胜、赵晖开始了他们各自的又是共同的跋涉。许胜的足迹几乎踏遍全美，还多次随同有关团体或演出队到世界各地一展他高超的针灸技艺。他感到中华五千年文化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不仅属于中国，也应当为人类所共享！赵晖举办了一系列演奏会后，又应邀与美国“古老的未来”爵士乐队联手合作（古老的未来：“Antiant Future”）。这个爵士乐队在美国颇有名气，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特邀赵晖加盟，想不到这个“中西合璧”的乐团在旧金山、在伯克利大学轰动一时。当笔者问及演出何以成功时，赵晖兴奋地说：我是沾了祖宗的光。开始，我担心古筝与爵士乐无法协调，试图按照他们的音乐习惯来改变自己。后来，我干脆按中国的乐思来展开，这反而产生了相辅相成、互相补偿的效应。

我以为，任何艺术一定要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民族个性，不怕别人弄不懂。到最后，恰恰就因为我执着地表现我们中国艺术独有的气韵，反而使乐队倒过来以我的招牌去招徕听众。赵晖坚信：如果我们东方古老的民族艺术有机会更多地走向世界，一定会大放异彩！

许胜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情上一点也不比赵晖逊色。有一个美国病人提着酒瓶进了诊所，许胜不客气地让他把酒瓶扔出门去，说这是中医的规矩。当然病还是给看的。这个病人称其已让西医医过背，治过肠，还被心理医生治疗过，都未奏效。许胜只静静地给他身上插了几根银针，针了一次灸，竟然完全康复！患者看着许胜和他手中那神奇无比的银针，惊诧不已。在许多病人的眼里，许胜简直是一个从遥远的东方飘过来的活神仙！

去年春节，许胜、赵晖夫妇双双回大陆探亲，笔者有幸与他们作了长时间交谈。他们并不满足已经取得的成功，又在酝酿着一个个新的计划——去好莱坞？去欧洲？去……让我们衷心地为他们祝福，既然第一段美妙而辉煌的东方旋律已经从萨斯塔山中袅袅飘出，那么，谁能说第二段、第三段……不会在五大洲、四大洋上空飘飞、回荡呢？！

（责任编辑 陈贻林）

近来报章上以“拜金主义”为名对若干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批评,所举事例为两地“大款”或“大腕”(均为不规范的汉语,一时流行的称呼,此处暂随俗)斗富,饕餮一席,挥金数万,乃至几十万。有的文章还指出“拜金主义”是一种“对人的思想和社会风气有极大腐蚀作用的意识形态”,已“不能不使人深感忧虑”。

查《辞海》1979年版本,并无“拜金主义”条目,仅有“拜金艺术”词条,大意是,“拜金艺术是英文Mammon art(财神艺术)的意译,指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化的艺术”。近来报刊批评“拜金主义”的文章都对拜金主义的危害作了很详尽的说明,如“导致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恶性膨胀,可以泯灭人性,把人变为金钱的奴隶;可以使人丧尽天良,干伤天害理的事”。但可惜,“拜金主义”的定义和内涵并没有说清楚,哪些行为属于“拜金主义”也没有界定,其实,还是有什么事就说什么事,少谈点“主义”,多谈点问题为好。

对饕餮一席挥金数万等现象,应该有一些深入的思考:第一,改革开放十余年来,生产确实是发展了,如果仍以“阶级斗争为纲”,或继续“高举三面红旗”,不仅产生不了“大款”,斗不了富,恐怕餐桌上佳肴也多不了。第二,确实有一些人富了,可惜的是富起来的人的群落中,相当一部分人的文化知识层次不高,换句话说,社会上最有知识的那部分人中的大多数并没有富起来,因此出现了种种不合理的、不均衡。第三,部分先富起来的“大款”们,或由

于富得过于容易,或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过的“按权力分配”时期中产生过的受压抑心理而诱发的逆反心态,或对于来之过于容易的财富

得了世界五百家大企业;斗富的“大款”,几十万元一桌的宴席,大概也只能“偶尔露峥嵘”地潇洒一两回。

应该批评不良风气和总结教训,但更应该引导好社会财富分配的流向,让社会上有知识,并用知识为社会创造财富的人能尽快富裕起来,财政支出的投向向教育倾斜。使社会真正尊重知识和人才,而非不实的空谈。在生产发展以后,社会财富分配流向的不合理(注意,

不是提倡平均主义,而是提倡有知识者先富)现象得不到解决,社会风气是无从根本改善的。

从“大款”斗富说起

肖晓

的不稳定感,往往会做出一些迹近荒唐,但并未明显有悖于现行法律的事情,现在报章抨击的种种,均属此类。

那么,对挥金如土的“大款”的行为究竟如何评价呢?我看,几万乃至几十万一桌的宴席,“大款”们尽管吃去,因为这并不违反一般社会公正的原则;即“任何人的发展不应该损害另一个人的发展为前提”。只要“大款”们的收入是在申报所得税后的合法(暂不言是否合理)收入,尽管吃去!但是,任何人都有权对这种消费提出批评和规劝,因为“大款”们的这种消费有悖于社会整体均衡的信念;在相当一部分教师工资都发不出来时,“大款”们的挥霍,必然会使一些人心理失衡;知识无用!

报章上批评的种种不良风气,以及大量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面,拖欠教师工资,及农村中有钱大办丧事而无钱求医等“怪”事,都是属于一种文化现象,或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生产发展一定阶段的产物。我们国家这几年经济上确实开始起步,但绝非富裕,中国目前还“无金可拜”。中国的大企业没有几家进

欢迎订阅

本刊1—9期合订本

为满足读者需要,《炎黄春秋》总1—9期(1991年7月创刊至1992年全年)合订本开始发售。每本定价30.20元,邮费3.50元。

订购合订本联系地址如下:北京西城区南草厂街22号炎黄春秋杂志社读者服务部 联系人:许少英 邮政编码:100035



中华几多

「黄帝陵」？

○兰草

编者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文化艺术兴盛发达和政治生活生动活泼的重要标志。本刊曾经发表关于中共党史上若干问题的争鸣综述和关于康生、蒋纬国和许世友等历史人物史实上的不同意见，特别是徐向前元帅的肺腑之言，都引起了读者和研究者的注意。本期再发表兰草、党军同志二文，他们分别对“黄帝陵”和“庐山会议”有关文章，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尽管他们的意见以及本刊所发表的文章，并不都代表编者的观点，但是只要是言之有理，论出有据，并且持平等探讨的积极态度，我们都表示欢迎，争取发表，力求为广大读者和后人留下更真实、丰富和正确的史实资料。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和陕西省整修黄帝陵工作领导小组，于1992年10月29日联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黄帝陵基金会成立大会。李鹏总理为此题词：“发扬中华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黄帝陵基金会名誉会长李瑞环发来贺电；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薄一波、执行会长萧克等出席大会并讲了话。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介和首都各报，当即向海内外作了报道。时隔十余天，北京某报却于头版位置发表了“专家学者实地考察确认：‘平谷轩辕陵是黄帝陵’的报道”。文中称“日前，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与平谷县文化文物局组织中国社科院、历史博物馆、北京历史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到平谷县山东村实地考察这个村西的轩辕陵，并确认这座轩辕陵是中华民族始祖黄帝之陵”。报道最后说：“届时，海内外炎黄子孙可在京郊凭吊中华民族的黄帝始祖了。”

我们对此报道不以为然。众所周知，中华民族只有人们公认的一个始祖——轩辕黄帝。“天下第一陵”，就是位于陕西黄陵县桥山的黄帝陵。两千年前，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开宗名义第一篇“五帝本纪”中就庄严宣告：“黄帝崩，葬桥山”。司马迁还写到“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可见，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对黄帝不雅驯的种种胡说八道，统统予以排除。确认后，才写进了《史记》，为后人著书立说留下可靠依据。早在春秋战国时代，黄帝的祭祀活动就开始了，从孔子和他的学生对话语录中，已经得到证实。秦统一六国后，规定“墓设陵园”。据现存石碑和《黄陵县志》载：汉代就在黄陵桥山西麓建了轩辕庙。唐初朝廷指令在桥山种植柏树。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在长安东宫显德殿即位时，亲口讲道：“黄帝之王十三战，商汤之二十七征，功盖造化，今桥山古柏已荫，业致升平……。”可见，贞观年间桥山的古柏已经成林。唐代宗大历五年又重修了轩辕庙。宋开宝二年（公元972年），因沮河连年侵蚀，宋太祖降旨将轩辕庙由桥山西麓移址桥山东麓（即黄帝手植柏处），就是现在的轩辕庙。流传在当地的民谣：“汉代立庙唐代建，到了宋朝把庙迁，不论谁来坐皇帝，登基都不忘祖先”。

公元前元封元年十月，汉武帝刘彻率十八万大军，巡视朔方，威震匈奴，返回长安时，途经黄帝陵，停止行军，备礼致祭，修筑祈仙台。也给后人留下了“汉武仙台”“挂甲柏”文物古迹，供今人攀登怀古。这就是千百年来人们经常所说的“十万大军祭黄陵”。

北宋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宋仁宗赵祯降旨，在黄帝陵桥山种植柏树1415株，并抽调乡间三户黎民百姓，免其一切差役，专门守陵看护桥山古柏。

元朝泰定二年（公元1352年）

泰定帝也孙铁木耳，颁发了保护黄帝陵的森严法令，至今仍然完整无缺存放在黄帝庙碑廊里。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洪武四年委派身边仕宦管勾甘，身带他亲笔写的“祭文”前来祭黄陵。这是保存最完整、也是最早的一份祭文。

从清朝执政的二百年间，先后祭黄帝陵21次，重修修整黄帝陵5次。康熙皇帝亲笔用满文写的祭文碑石至今存放在轩辕庙的碑廊里。可见不论蒙古族坐皇帝的元朝，满族人执政的清朝，还是汉族人当皇帝的明朝，金人执政的南宋朝，都一致肯定中华民族这一伟大祖先及其陵寝。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当年清明节，委派了由15人组成祭黄帝代表团，并亲笔写了“世界文明，唯有我先”气

壮山河的祭词。1937年国共两党为了共同抗日，清明节两党共同前来祭黄陵。当时的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写了祭文。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敬题了“黄帝陵”三字，至今仍存放在黄帝庙的碑亭里。1944年7月17日民国政府内政部，核准陕西省主席邵力子报告：将中部县改名“黄陵县”。近代历史学家郭沫若于1958年也题写了“黄帝陵”三个大字，刻碑屹立在黄帝陵前。国民党元老、爱国人士于右任先生于1935年专程回陕西祭黄帝，留诗两首，又同友人写出了《黄帝功德记》，曾几度再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给毛主席上书建议加强黄帝陵修葺的，是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他于1955年4月16日写信给毛主席说：“陕西黄帝陵，山陵荒芜，庙宇残



陕西省黄陵县黄帝陵

炎黄春秋杂志社首届理事会成员简介

理事：蔡道峰 广东潮州市振园运通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振园运通食品有限公司系中外合作、广东省先进企业。董事长、总经理蔡道峰是“九制凉果”的正宗传人，他在祖传技术的基础上进行革新创造，所制“九制”金桔、话梅、相思梅、金榄、蜜榄、芒果条、蜜李、甘草梅等20多种产品畅销国内外，年产值5000多万元。公司产品曾先后获得广东省及农业部优质产品奖，第三、四届中国新技术新产品博览会金奖和优秀奖以及国家“绿色食品”等17项荣誉称号。

理事：白亚南 北京同力制冷设备公司总经理

该公司具有多年经营冷冻空调产品的经验，以高质量的产品和良好的服务，赢得了国内外厂商和广大用户的信赖。同力公司现已成为“谷轮”、“顿汉—布会”等半封闭、全封闭和全封螺杆压缩机在国内的业务联系代理，直接负责上述产品的技术咨询和服务。如今，公司已拥有1200多平方米的展销厅和四个工厂，成为具有设计、制造、销售、安装、调试及维修等综合能力的经济实体。主要产品有：风冷式分体式空调机、风冷、水冷压缩冷机组、冷库用吊顶冷风机、小型风冷冷水机组、大型水冷冷水机组，空调用风机盘管、柜式空调、新风机组等。

理事：林春露 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工会主席

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是一个集水利、水电、火电工程、房地产实业、贸易于一体的大型企业。注册资金8929万元，固定资产净值9649万元，施工设备达2000多台(套)，总功率6000多马力，各类专业技术人员503名，下设工程、基础、机电、房地产、机械维修、金属结构制造、综合经营等十三个公司(厂)，并联办了水泥厂、模板厂及砼供应站。在广州、深圳等地建立了占地400多亩的生产生活基地。

该局经营范围是：水利、水电、火电厂、核电站常规岛屿辅助生产建筑工程、砼管道的制安工程，其他建设项目的机械施工、房地产经营、建筑材料、普通机械、电器机械及器材、钢材、木材、铝材日用杂品。

该局92年完成总产值24758万元，实现税利816.34万元。

破，无人看管，有损祖恩……”毛主席看后在陈先生信上批道：“我看陈先生的建议是有道理的。”并把原信批给周总理请其责成有关部门作出处理。在毛泽东、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陕西省文物局具体指导，于1963年，历经两年时间，将黄帝陵庙整修一新，并设立了陵园管理所。

1972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黄帝四经》又一次证实：黄帝是人，不是神。轩辕黄帝是历史人物，而不是传说人物。“黄帝崩，葬桥山”被历史学家公认，受亿万炎黄子孙共仰，不仅有史可证并且事实俱在。所以，国务院公布黄帝陵为全国古墓葬第一号是正确的。

然而，北京某报却“据专家介绍”凭《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长安客话》、《光绪顺天府志》以及《平谷县志》等少量明清两代史料，由当地文物部门和部分专家、学

者确认“平谷轩辕陵是黄帝陵”，并匆忙发表独家报道。

我认为这是一个学术问题，可以商榷研究。如果仅出于经济目的为了吸引游客，说这里才是黄帝陵所在地，可就有失严肃了。近年来，国内有的报刊发表文章说“黄帝是女人”，甚至“黄帝、黄帝陵都不存在，没有整修的必要”，并提出“不搞祭祀活动。”又说“桥山黄帝陵在子长”，或说：“黄帝是汉族人的祖先”。这些文章在海内外华人中已造成不良影响，不利于维护民族团结、振兴民族精神。以致有个别日本人参观黄帝陵时，对我们的讲解员说：“你们中国至今还弄不清自己的祖先是男还是女……我们日本人才是真正的黄帝子孙……”。海内外华人问中国到底有几个轩辕黄帝？有多少个黄帝陵？哪些是假的？因此，黄帝与黄帝陵确认不仅仅是学术、经济问

题，而且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

据有关史料和文物记载：黄帝历经征战，才统一了各大部落，建立起第一个有共主的国家，中华文明从此开始。后人因此尊称轩辕黄帝为“人文初祖”、“文明元祖”、“无愧始祖”。由于他行迹遍及全国很多地方，各地难免留下一些遗迹或传说，如甘肃天水、河南新郑与灵宝、山东曲阜和湖南、湖北等地都有黄帝遗迹之说。但是，这都不是黄帝出生地和陵墓所在地的依据。为了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我认为应力避出现各种错误报道(学术争鸣论文例外)，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有责任提出为黄帝·黄帝陵正名。

(本文作者系黄陵县轩辕黄帝研究会及炎黄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

关于庐山会议的“庐山真面目”

——与权延赤同志就《彭德怀落难与林彪得势真相》商榷

○党 军

“历史最终会把一切都纳入正轨。”(恩格斯)古今中外历史上任何重大事件和权威人物,在无情的历史面前最终都会露出“庐山真面目”!

震惊中外的1959年庐山会议三十四年来,国内外已有不少评论,一些禁区被逐渐解除,人们思想获得解放,弥漫在庐山上的迷雾被冲破,那场“左”祸内幕终被披露。1979年12月25日邓小平同志在为彭德怀同志平反昭雪的追悼会上,代表中央对彭总伟大一生,作了高度评价;1981年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评述毛泽东同志伟大历史功绩的同时,对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错误,作出了公正的论述:

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

因此,近年来一些参与当年庐山会议的老同志,本着为党和人民负责的精神,痛心反思,写出了富有历史意义的回忆、评论文章:彭程、王芳《庐山1959》,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伍修权《往事沧桑——庐山风云》……

等等。无不对会议作了实事求是的记叙和公正的评价。已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今后史学界探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炎黄春秋》1993年4月号权延赤同志写的《彭德怀落难与林彪得势真相》一文,则从另一角度对庐山会议过程作了一些评述,特别是对彭德怀“呈上意见书”以及毛泽东为什么批判彭德怀问题上,说法与众不同,可谓标新立异了!

权文谈的是“真相”。那么彭德怀“落难”与林彪“得势”真相究竟是什么?

权文说“彭德怀抡着胳膊跳出来。他这一‘鼓咙胡’,便成了流芳千古的人民英雄。”但他接着又说:“毛泽东所处位置,思考决不能象彭德怀那么简单,他所肩负的责任,也不允许他象彭德怀那么简单。”

所谓彭德怀“简单”,无非是指彭总写的那封信,前面已经说明:“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发言,对‘三面红旗’提出批评,并且呈上‘意见书’。”

一、彭德怀给毛泽东写的信不是用“意见书”的名义

众多参与会议老同志的回忆文章,都否认了这一点,例如彭程、王

芳《庐山1959》一书记叙:“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同志中间提出‘评论这封信的性质’。”“彭德怀对毛泽东的这一决心感到十分突然,这是给主席个人的信,并没有要求大家讨论,可是为什么要印发大家讨论呢?而且冠之以这样一个标题?自己是谈了一些个人的看法,也可以是自己的意见,可也不能叫‘意见书’呀?主席这样做,是出于一种什么考虑呢?”又根据1988年发表的《彭德怀珍贵日记一篇》记载彭在庐山会议受到批判后于7月23日写的日记剖白说:“……至如(于)我写这封信,是在西北小组会议上,一些不便讲的问题,要点式写给主席参考的,希望主席考虑信中的一些问题。主席把问题提到如此十分严重,如此十分尖锐……”

事实说明“意见书”三字是毛泽东自己加上的印发大家作为“评论这封信的性质”的证据,而不是如权文所说“呈上意见书”。

有读者可能认为反正彭写的信也是意见,加不加“意见书”三字问题不大,但这完全是两回事。一个政治局委员给党的主席写封信,本是极平常的事,党章上明确规定党员有对党的工作提出建议以及批评的权利。即使建议批评有错误,也不为过,何况那还仅限两人之间的事情。毛泽东把彭德怀给他个人的信公之于众,明显是要彭德怀涉嫌散布“反党言论”,以便将他的“罪行”示众,便于整治。毛泽东看来是出于这种

“考虑”，彭德怀也可能“简单”了点，不知其中的奥妙！

二、彭德怀写这封信的目的是什么？

会议前半个月，大多数与会者指出了“大跃进”运动的错误，从不同程度总结了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会议的主持者毛泽东，也对“大跃进”的错误较前有了一些认识，会议开始采取一些纠正“左”倾错误的措施。但毛泽东也决不允许对他亲自树立的“三面红旗”的错误作出超过“一个指头”的估计，这就注定了庐山会议不可能深刻认识“大跃进”的根本错误，因而不会对其进行较为彻底的纠正。

彭德怀虽然主持军队工作，但他注意群众疾苦，忧国忧民，因而对工农业生产等情况一直比较关心。1958年12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彭德怀视察了湖南、甘肃、安徽等省一些地方，了解到大炼钢铁造成的损失以及农业方面的虚报浮夸等情况。他在湖南家乡视察时，亲眼看到农民生活的困难情景，亲耳听到了人民群众的呼声，了解到许多真实的情况。在湖南湘潭、平江调查时，广大农民社员通过各种方式，躲过了一些干部的干扰和阻挠，将当时农村的情况，如实告诉彭总，要彭总回去为他们反映。平江县有一位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残伤老战士，暗中递给彭总一张流行很广的著名诗条：“……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呼！”

彭德怀出于对党和人民事业的负责精神，“敢疑误国旗三面，拼诉忧民愤一腔。”他在会议前期西北组讨论会上先后作了七次发言和插话，尖锐地指出了“大跃进”以来的一些问题，较为深刻地总结了出现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

至于为什么要给毛泽东写信？

他的动机是为了什么？是否不利于大局？《彭德怀自述》说道：

我当时对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我认为当时那些问题如果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迎头赶不上去，势必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我想，这些问题如果由我在会议上提出来，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是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些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

我七月十四日给主席写信的目的，就是为了尽早地纠正当时存在的那些问题，并没有什么“阴谋篡党”、“反对毛泽东同志”的目的。那封信，只概括地提出了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并没有论述那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同时我也论述不出许多的原因。我想，横直是写给主席自己作参考的信，他会斟酌的。

彭德怀写这封信的目的动机，非常明显，正是着眼于“有利大局”。

可权文说：“同样一句真话，10年以后讲也许是对的，10年以前也许‘错’了，错在不利于大局。”

一句真话怎么还有时间差的限制，十年前后会不一样呢？对此我不敢苟同。

三、所谓错在“不利于大局”是怎么造成的？

如上所述，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的目的，是希望得到他的理解和支持，以利于会议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纠正“左”的措施。信中在肯定1958年成绩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大跃进以来工作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及其原因。他认为当时突出的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他指出这方面的原因，一是浮夸风和片面性，“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二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还

提到纠“左”一般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彻底克服“左”的思想，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

彭德怀的信反映了当时客观实际情况和群众要求，并且首先肯定成绩才提出缺点，也没有把责任推在毛泽东一个人身上。写信的动机上没有丝毫个人私利，并未“谋图篡党”，而是不怕“冒犯”，不计个人得失！与当时怕丢乌纱帽说违心话的人，特别是那种阿谀奉迎，踏在别人头上往上爬的林彪、康生之流是不可比拟的。

毛泽东同志如真有“雅量”，听得进反面意见，作为个人信件，参考默认也就算了，人不知，鬼不晓，何以“不利于大局”；即使公之于众，让大家参考参考，对“小资产阶级狂热”和“骂娘”等难听话，批判一下，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就行了！

可毛泽东认为，彭德怀实际上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表示怀疑和反对，是向他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战书”，认为彭德怀是“右派海瑞”，是“存心不良”，又和同意他意见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结成了所谓“军事俱乐部”。当时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等极“左”搞法，已在国内引起强烈不满，党和政府的威望受到极大影响，国外舆论更是议论纷纷，国际威望下降。毛泽东把各种批评意见，统统认为是对党的攻击，又把庐山会议上领导层的内部争论与此联系起来，把彭德怀、张闻天等同国际上对中国的攻击和赫鲁晓夫等联系起来。说“我们正处在内外夹攻下”，“面对反华大合唱”。“庐山是一场阶级斗争”。这样，问题越来越激化！毛泽东在7月23日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公开表明了他对彭德怀等人的愤怒。他为了使与会的人“紧跟”他批斗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他警告说，有些人在关键时刻是动摇的，在历史大风浪中不坚决，在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

线和现在大跃进总路线就是站不稳,扭秧歌的。现在,这些人又表现了资产阶级的泄气性、悲观性,……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他甚至把党过去针对蒋介石等人的讲话用语,也在会上讲,“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说“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故7月23日的讲话,成为会议的转折点,会议气氛立即发生了重大变化,持“左”观点的明显占了上风,彭德怀等人则成了他们批判和围攻的对象。诚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庐山会议“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

伍修权同志回忆庐山会议时沉痛地说:“庐山会议以后,一种‘左’的错误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它不仅在政治上使党内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在经济上给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也影响到党的对外关系……”。开始“天下从此多事矣。”

按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观点,庐山会议最后产生的那么真正“不利于大局”的一场悲剧,是因彭德怀的那封信造成的?还是因为“意见书”“不利于大局”,必须发动一场残酷斗争才造成的呢?这就不难回答了。

四、彭德怀“里通外国”的真相

权文说:“毛泽东在承认彭德怀是讲了真话的同时,敏感地联想到赫鲁晓夫1958年在北京当面嘲讽中国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彭德怀在‘意见书’里也用上这个观点。……”

文章还说,会议印发了彭德怀的意见书的文件,7月18日,周小舟发言支持彭德怀,“同时,赫鲁晓

夫也在波兰发表了批判和反对中国人民公社‘大跃进’的讲话。”

又说:“7月20日,张闻天发言支持彭德怀,第二天,苏联和波兰通过新闻媒介公开批判反对‘人民公社’‘大跃进’开始了中苏之间意识形态的论争。……”

对权文上述论点,至少在史料运用上两点保留:一、毛泽东讲彭德怀一封信“真话”是在庐山会议时讲的,还是在几年以后讲的?他在庐山会议当时怎么能联系到后来所谓的帝、修、反大合唱。《彭德怀自述》中提到1965年9月23日毛泽东动员彭总去西南三线工作时,讲过“也许真理在你那边”一句话。可是不到三个月时间,毛泽东就在12月初杭州谈话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彭德怀是海瑞,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从此掀起十年动乱,彭德怀被残酷斗争致死……这是后话。

当时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是对中国三面红旗持批评攻击态度,在当时《参考资料》和港、台、澳等报刊上有反映。但是否就如权文所说“第二天”就配合得那么紧呢?难道庐山会议情报当天就泄露了吗?

再说中苏论争公开化也不是在庐山会议期间开始的,当时表面上还维持着“友好”关系,这是事实。把六十年代初开始的中苏矛盾激化,提前到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时,这太勉强了。

庐山会议给彭德怀罗织的各种罪名中,有一条是“里通外国”。据说彭总为此气得大哭,就这一条“罪状”在当时就可以置人以死地,彭德怀一再予以驳斥。据奉命参加会议的伍修权同志回忆:

“会议开始后,专案人员声色俱厉地要彭老总交代他怎样与赫鲁晓夫相互勾结的罪行。……他自己曾生气地说,他不会说外国话,同外国打交道都要通过翻译,真要搞什么‘里通外国’的事,翻译可以揭发,他自己实在‘交代’不出来什么问题。”

从当年为彭作翻译的孙立忠在《彭总在国外》中说:

“组织上多次向我了解……所谓彭德怀‘里通外国’,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说1957年彭德怀访苏时同机会主义头子王明有联系;二是1959年5月底、6月初访问阿尔巴尼亚期间,恰逢赫鲁晓夫也正在阿……访问,因此怀疑彭德怀同赫鲁晓夫在阿尔巴尼亚有秘密联系和秘密谈话。

“……外调人员声称有人揭发,1957年11月,彭德怀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访问时,在我们下榻的列宁格勒饭店,曾有一个华侨到列宁格勒饭店来找彭德怀和肖向荣。说这位华侨是王明派去的代表,彭德怀和肖向荣见了,并谈了话,要我证实。……”

“我如实回答说:‘我没有见到派代表来,……只看见林伯渠的女儿林琳来看望她的妹妹……。’

“关于第二个问题……赫鲁晓夫同彭德怀见过三次面,都是在宴会和群众大会上……稍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会明白,在这么大的宴会和群众集会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彭德怀怎么能同赫鲁晓夫搞阴谋,怎么能密谈呢?况且,彭总一句俄文都不懂,不通过翻译怎么能同赫鲁晓夫直接交谈呢?别有用心的说,赫鲁晓夫这次是用他带来的懂中文的翻译同彭总交谈的。可我没有见到这样的苏联翻译。彭总和我们代表团同志都住在一起,朝夕相见,没有一个人看到彭总单独出去同赫鲁晓夫密谈……”

五、林彪“得势”于何时何地?

不可否认,林彪在历史上为党和人民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陈云、黄克诚等同志曾经为林彪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指挥才能作过实事求是

的评价。

林彪长期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并为毛泽东所赏识,在江西红军时期那种特殊情况下,晋升很快。在1958年5月25日的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增选他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正是从这时开始,他步入了中共最高决策圈,高出于彭德怀和除朱德之外的其他元帅之上,这是毛泽东对林彪特殊赏识,为选他为接班人迈出的第一步。因此说林彪“得势”应当从这时开始。

林彪在1959年9月取代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后,他深知

只有迎合与颂扬毛泽东是他唯一的出路。他揣摩毛泽东的心意,百般奉迎,搞出“活学活用”和“突出政治”等等,“大树特树”毛泽东个人。“文革”更是坚决“紧跟”,连传阅文件也是“主席画圈我画圈,主席同意我同意”,不断肉麻地吹捧毛泽东。于是“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九大“党章”,成为国际共运史上一次贻笑大方的“创举”。

至于林彪在辽沈战役中的“奇功”也应实事求是地分析评价,既不能完全否定,也不能一味颂扬。事实上林彪在东北不是完全正确的。

纪实作品贵在真实可信,它不同于写小说和剧本,可以任意虚构发挥,更不能改变和歪曲事实。这就要求作者应该更加严肃认真地运用史料和记述史实,做到更加公正客观地再现和评价历史人物及其事件。

权延赤同志是从事纪实文学写作的,他的作品已经很有影响,由于我们也注意并常读他的作品,才对他的文章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以求共同提高认识,并对历史负责。拙文不妥之处,欢迎权延赤同志批评指正。

(责任编辑 卢弘)

编读窗

编后随侃

报载:某饭馆某菜忽然火爆,每日顾客盈门,且多为回头客。后查出其老板在菜中加了鸦片,不仅刺激了吃者胃口,又使人吃了还想来吃。此老板图财缺德,已受公众谴责和法律制裁。

纵观今日报刊摊点,加了“鸦片”的“菜”似乎不少。本刊这家“饭馆”,当然不能如此下作。但在商潮冲击下,是否做过类似吊人“胃口”稍加“刺激”的事呢?作为“厨师”,未免有点脸红。有读者(有的还是学者)批评我们也追随“歪风”,热衷于“揭秘”、“曝光”,加入“明星”轶事和官司的起哄啦啦队,甚至封面也大登靓女照片等等,因而以为本刊“转向”或改变方针了。对此,我们感到惭愧和遗憾;不过,也得表明,我们是被迫的!

本刊不属“官办”,毫无拨款,全靠自筹自销自负盈亏,所以不得不受文化市场的控制,有的封面、标题甚至内容,最后得听发行商的,所以才出现上述“转向”迹象。但是我们一直不甘如此,总想在刊山报海中,坚持自己的方针品位和风格特色,力求向读者献出不仅“色香味”俱全,而且“营养丰富”的“美味佳肴”来。而这,单靠几个编者就不行了。所以,我们在此向大家坦心交底并求援,只有依靠广大读者特别是作者的关心支持与批评监督,我们的刊物才不会变质变味,也才会无愧于炎黄子孙,称得上春秋之笔。

令人欣慰的是,本刊不仅拥有大批热心的读者,更有一支高层次高水平的作者队伍,其中有不少是著名作家、学者和老革命家,例如一向关心支持和指导我们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著名的红军儒将萧克同志。本期本刊已经选发了他近著中的一篇:《1930·毛泽东为何批林彪?》日内又拿出刚刚写出的《南昌起义亲历记》,这原是萧老正写的长篇回忆录中的一章,有着很高的史料价值,又写得具体生动。尽管本期刊物即将付印,由于她正好是八一起义纪念期间出版,我们临时决定加进,并排在首篇,以供读者先睹为快。本期发表的张玉凤同志的《我给毛主席当秘书》,真切感人地写出了人们早想知道的往事史实。关于《毛主席语录》编发全程的纪实报道,是“本刊独家披露”的“军报内部消息”,读者将从中了解现代中国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大事、奇事和怪事……

得,不能“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了。到底“味道”如何,还得由我们的“主顾”——亲爱的读者们品尝评定。顺便提一下,本刊总16期封三所载读者意见调查表,敬请早日填好寄来。

谢谢大家。

本刊编者

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 “华龄杯”青少年书画大奖赛

一、大奖赛的组织机构

(一)主办单位: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 中宣部文艺局
华龄出版社 中国现代硬笔书法研究会
中国书画联谊会 内蒙包头铁路分局

(二)协作单位:

中国艺术研究院 中国妇女报
中国曲艺研究会 炎黄春秋杂志社
文化艺术出版社 中国老年杂志社
中国社会报 祝你幸福杂志社
中国体育报 北京华龄经济咨询公司

(三)顾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传斌、王建根、王首道、王照华、朱长龄、李希凡、闫明复、迟浩田、伍修权、曲琪玉、李德生、邢雁、张文庄、陈丕显、杜导正、张亚群、杨静仁、项怀诚、贾才、高昌礼、康世恩、蒋冠庄、程思远。

(四)艺术评审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克、王文芳、邓锡良、孙其峰、冯其庸、孙泳新、刘炳森、刘福芳、佟韦、张重梅、杨萱庭、洪炉、赵家熹、韩绍玉、爱新觉罗·恒懿、崔子范、董寿平。

(五)组织委员会:

名誉主任:毛岸青(毛泽东之子)

主任:姜昆(著名相声艺术家)

副主任:曹全夫(毛泽民的女婿)

李讷(毛泽东之女)

王景清(李讷爱人)

李银桥(毛泽东卫士长)

张玉凤(毛泽东机要秘书)

李 准(中宣部文艺局局长)

丁洪章(华龄出版社社长)

张振亭(中国体育报总编)

许廷钧(文化艺术出版社社长)

王秀琳(中国妇女报总编)

于国厚(中国社会报总编)

赵艳(中国老年杂志社社长)

高洪德(祝你幸福杂志社总编)

秘书长:丁洪章(兼)

副秘书长:朱天红、杨铁源、顾兰英

办公室主任:朱天红(兼)

二、征稿公告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宣传毛泽东思想,让二十一世纪的主人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特举办“华龄杯”青少年书画大奖赛。

(一)征稿内容:分必选和自选两部分。必选书画为毛泽东的诗词、名言,或绘画其意境。自选书画内容要格调高雅,清新活泼。如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热爱体育,争办奥运,尊老爱幼,妇女儿童……

(二)作品要求:毛笔书法及国画作品不超过4尺宣,硬笔书法作品8—16开白纸。每位参赛者不超过两件作品。

参赛分两个年龄组,14岁(含)以下为少年组,15岁至35岁(含)为青年组。两组分别进行评选。

投稿作品注明通讯地址、邮编、姓名、年龄、性别、辅导老师(或辅导家长)。另寄贴足邮资、写明投稿作者地址、邮编的信封两个,以便联系。

作品书写内容注明出处,草篆书注明释文。

每位参赛者交5元参赛费。参赛费和稿子寄至:北京西城区小乘巷21号大奖赛办公室:王华、闫丽。邮编:100035

来稿不退,截止日期:1993年10月20日,以邮戳为准。

(三)评审、奖励办法:

主办单位有关负责人及国内著名艺术家组成评审委员会,负责对作品进行评审,确定奖励等次。

两个组国画、毛笔书法、硬笔书法各三种系列共评选出特等奖3人(每人奖金3000元)、一等奖6人(每人奖金2000元)、2等奖12人(每人奖金1000元)、3等奖24人(每人奖金500元)。优秀奖300人、佳作奖1000人、辅导员奖45人。

所有获奖者均发给“年龄杯”奖品和荣誉证书。邀请获高奖者参加大奖赛开幕式和发奖大会,优秀作品将公开出版发行。

(四)开幕式和发奖仪式,在北京召开,届时请中央领导同志和老一辈革命家及电视、新闻界和各方面代表参加,并通过新闻、电视进行宣传。

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
“华龄杯”青少年书画大奖赛组委会

1993年7月1日



寿堂妇科万应膏

主治痛经除烦恼

——“四病克星”用药反馈选登——

“来生”我还做女人

湖南省通道县公安局 张彩梅

天啦，做女人可真要命！

每个月都有“耶稣受难日”，痛经使得我“痛不欲生”。为这，也不知吃了多少红糖甜酒蛋，多少“妇科千金片”之类的药片、丸、浆、膏，还有用根根草熬成的汤汤水水，然后又到中医院进行一个疗程又一个疗程的治疗，但都对付不了这个顽症。

而我偏偏又干的是警察这个行当，下乡办案，审讯调查时，苦不堪言！

远在京城的表姐早知我的“顽症”，便寄来石家庄新华制药厂生产的“寿堂妇科万应膏”，说是：“效果好极了！”抱着“有病乱投医”的心里一试，嘿，真神！连用几次后不光痛经，就连经期的腹胀、腰疼、腿酸等症状都消失了。这一来，我的工作更出色了，被单位评为“优秀侦察员”。我心里真是乐开了花！

有了“万应膏”，当女人还是合算的。有科学证明，女性比男性长寿，女性夜间视力较男性强，女性有两个X染色体，生理优于男性……哇，有了“寿堂妇科万应膏”，“来生”我还做女人！

实践让我信服了

我女儿现年17岁，每次经期疼痛难忍，必服中药及止痛类药物方能勉强对付。每次看见她痛苦的样子，我们心如刀绞（只有独女一个），束手无策。贵厂生产的“寿常妇科万应膏”早在报刊杂志上所闻，但总认为那是广告，怕上当受骗。近期她同学送了一袋，用后效果极佳，实践让我信服了。为此，特向贵厂求购，请代邮10袋或告知该产品价格，我再先款后货。

四川广元医药站 张某某

过去痛苦难言 现在一身轻松

四川雅安市航空航天工业部

川西机器厂供应处 王某

我患了“子宫内膜分泌机能不足”症已五六年了，这个病把我折磨得痛苦难言，我八方求医，四处问药，但收效不大，每月月经淋漓不止，腰酸背痛，小腹坠胀，一拖就是十五、六天，这样使我极度贫血，血小板减少，凝血机制不足，人面黄肌瘦。

从报上看到石家庄新华制药厂生产的寿堂妇科万应膏，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向厂家邮购了五包。收到当天就马上试用，出乎意料，当月月经三天即干干净净，一身轻松，我好高兴。爱人更高兴，我厂医生也为我高兴。我把剩下的药送给朋友姐妹们，大家一用，都觉疗效神奇。后来我又多次为同志们代购，解决了不少同志的妇科痛苦，这种药使用方便，无副作用。

寿堂妇科万应膏介绍

妇女痛经、白带过多、经期紊乱、经量过多或闭经、小腹或腰部疼痛，都是妇科的常见疾患，多为各类盆腔炎症引起。特别是痛经，苦不堪言，病程长，可用西药少，而长年煎服中药，也很不便。本厂在老中医的指导和协助下，研制了主治痛经的新型含药橡皮膏——寿堂妇科万应膏，该药由十几味名贵的中药经提炼加工精制而成，外用穴位贴敷，治疗各类盆腔炎症，具有调经理血、消炎止痛和内病外治的卓越效果，使用携带方便，深受妇科病患者的欢迎和好评，曾连续荣获省优秀新产品二等奖、首届全国“百病克星”大赛铜奖、石家庄市优质产品奖和中国妇女儿童用品四十年博览会铜奖。

[规格]每贴7×10cm，每盒10贴。

[用法]外用穴位贴敷，一天更换一次，连续用药2~3周。痛经患者可以在经前一周开始使用，经期可连续使用。请参照使用说明书附图，分别或同时使用有关穴位。

敬告读者

海豚牌“四病克星”（指高血压克星——资寿尼群地平片；牙痛克星——寿堂牙痛安胶囊；感冒克星——寿堂效灵感冒胶囊；痛经克星——寿堂妇科万应膏）全国销售，如在当地买不到，请与石家庄市新华制药厂联系邮购，资料备索。邮政编码：050091

双 黄 春 秋



一个诗人的欢歌与恋曲

庐山会议的『庐山真面目』

惨遭谋杀的报业巨子史量才

文革小品：『四类分子』生活记趣

张玉凤：我给毛主席当秘书

